再版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871218 7

六四二〇



陳潤芝

四筆象



作者簡介

陳潤芝

新聞工作者。
浸會傳理系畢業。
歷任無線、港台、亞視、加拿大四十七台、現職有線電視直播新聞台。
六四二十年，不能不寫，就用私人時間私己錢，零八年底，赴美國西岸採訪了一批流亡民運人士，寫成《六四二0》。
希望只有一個：一個人、一組寡頭説了算的血腥錯誤，永遠不再在人類歷史發生。

四筆象

四筆象

六四二一〇

陳潤芝

978-962-7420-39-2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敬贈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文化食糧 • 閱讀快感

四筆象 036

六四二〇

作者／陳潤芝

電郵／ ichanho@gmail.com

出版者／四筆象出版社

地址／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電話／ 2780 5625

印刷／次文化堂

總經銷／田園書屋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 56 號 2 樓

出版日期／ 2009 年 6 月 4 日（再版）

ISBN ／ 978-962-7420-39-2

定價／ $60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序

「嘩！好犀利呀，你睇呢邊嗰幢，成條街咁濶！」

「唔係呀，你睇呢邊先啦，呢幢仲誇張，簡直係凱旋門嘅十倍！」

「弊啦，我哋個政府總部拍埋去，都唔知去咗邊？」

「喂，前面唔該叫司機開慢啲啦，嗰邊嗰幢仲得人驚呀！我影唔切啦！」

叫嚷着的是香港一班資深新聞工作者，場景是北京長安街，天安門一帶，時值歲末，整個廣場範圍和天安門城樓都圍了彩燈，亮麗繽紛如同白晝。

年前參加北京大學國情研習班，嗅足了未名湖的氣息，過了一周愉快的北大人生活，結業禮晚宴之後，校方安排了一架大旅遊巴，載我們這批高齡學生在北京市面走了一圈。

大家都被眼前巨廈感動得目瞪口呆，設計之新穎、佔地之廣袤，都不是我們這些「港燦」所能想像的。車上分貝最高的，就是當中最資深的新聞工作者，有些是採訪過八九民運的「老餅」、有些是財經版、外電版的編輯、有些是慣見大場面的老總級人物，越是高級，越是

少上前線，少上北京，越是被眼前景物所感染，整車人加起來，少說也有一百年新聞工作經驗，大家就像劉姥姥入大觀園般，左顧右盼，應接不暇，在連遍「嘩！好犀利呀！」之聲中，結束了這場繁華遊。

鏡頭一轉，八九年的六月三日深夜，天氣鬱悶，每個毛孔冒着的不知是熱汗還是冷汗。在北京飯店剛送別了上廣場採訪的十多位勇敢男同事，他們唯一的裝備，就是沾了水的毛巾，準備迎接人生中最濃烈一次催淚彈洗禮。

「風蕭蕭兮易水寒」，這樣過時的悲歌竟然有機會在二十世紀的首都唱出，份外難過。

前一晚兩三點已經被同事吵醒，親睹娃娃兵解放軍摸黑進城，還未到廣場，就遠遠的在北京飯店樓下，我們的眼前，兩下遭北京市民圍堵。整個上午採訪隊苦拼，把娃娃兵被堵得灰頭土臉的情節送回香港。下午加送遭十多公安拍門強闖房間警告，立即停機不准再在露台拍攝。

跟李少媚兩個人已累得不成樣子，擔着巨大的擔憂和惶恐，爬回在北京飯店十二樓房間，大家都知道今夜一定出事，但做夢也沒想過劇本會是這樣的。

踏出露台，長安街上原來已萬頭攢動，像是沸騰熱

鍋上狂跳的泡沫，長安街上五條寬濶行車線竟全擠滿憤怒的人羣。沒過幾分鐘，就看到一輛裝甲車挾着如雷機械聲，從天安門廣場，沿長安街往東我們樓下的方向瘋狂疾衝，生平第一次見到裝甲車，才知道速度可以如此驚人，疾衝的方向，正是擠得緊緊的人羣，人羣絲毫沒有避開的打算，十秒、九秒、八秒，差不多在裝甲車衝抵的最後一秒，才往兩邊挪開。但極目遠望都是人，後面的怎來得及挪開？太殘忍了。

李少媚和我都嚇傻了眼，馬上打電話通知廣場同伴，逃生要緊。

怎知廣場同事，包括當晚用電話報道，感動了無數觀眾的謝志峰，堅決不走。

「我哋呢邊仲可以，可以做多一陣。」

「唔係呀，你信我啦，我哋喺高位睇得好清楚，架裝甲車發癲咁衝埋啲人度，好危險呀，你哋快啲返嚟啦！」

一邊講，心裏也明白勸他們回來有困難，在手機並不流行的年代，拖磨下去，只會消耗廣場同事救命必需的寶貴電源。唯有打電話回香港求助，老大包雲龍已經人在廣場，唯有找香港最老的——總編輯伍國任。

「唔好再用佢哋嘅報道啦，會死人㗎，叫佢哋返嚟

啦！」

我們尊稱博士的伍國任，平日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當晚聲調明顯異乎尋常，只能故作鎮定的安撫兩個快要嚇昏的女記者：「佢哋話而家行返嚟仲危險過留喺廣場，佢哋會小心，放心啦。」

大家都知道，怎能放心？怎會沒事？但繼續抓着電話拖下去，也改變不了他們的決定，徒然影響同事工作，唯有睜大眼睛，無助地等待世紀慘劇，一幕幕在首都舞台上演。心裏在點算着，王丹在哪？柴玲在哪？吾爾開希在哪？

槍聲一開始，就整夜沒停頓，從高處觀察，城東、城西、城南、城北，酒店前面、後面，都是槍聲，時而急速連續，時而零散，或近或遠，每一響都像插進心臟。

很快伴隨而來的是四方八面救傷車悽厲哀鳴，很多救傷車由廣場方向駛過來，都被市民截下開門檢查，確保沒有軍人才讓放行，更多傷者被放在北京市民常用的板車，飛奔送院。有些傷者，我們高處看到，明顯已毫無氣息。

槍聲就此響過一夜，廣場燈關了又開，裏面的人呢？

極度疲累的情況下，昏睡了大概一小時，醒來天亮，馬上又到露台察看。

一列坦克，沿長安街往廣場疾駛，一輛、兩輛、三輛，總共三十多輛。就在我們眼下駛過。

「好多架坦克駛緊去天安門廣場呀，廿幾三十架呀！」

「吓！唔係嘛，坦克？」香港的資深採訪主任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

「係呀，真㗎，三十幾架呀！」心裏默願，你們千萬別向廣場發炮呀。

白日來臨，槍聲稍歇。

軍人很快就在廣場外圍，長安街上横排列陣，早前消失的市民又陸續回來了，他們騎單車，駛近軍人列陣前繞圈，每隔廿來三十分鐘，不規則的時距，軍人就會開槍，李少媚和我為免誤中流彈，就馬上躲回房間暫避，槍聲過後，每次踏出露台，都會看到軍人前面，長安街上，多了很多黑點，十個黑點、廿個黑點，都是本來在單車上的人。整個上午都是如此，十個黑點、廿個黑點，直至我們不忍再數……。

早上稍好的消息，是香港的同事，早已藏身安全地點，但仍記掛着沒東西吃會犯胃痛的老闆包先生，記掛

着香港學聯的同學。終於學聯同學平安返回酒店，馬上把其中一位請來房間接受電話採訪，讓他跟港人報個平安，讓媽媽聽到乖兒子的聲音。

「我無事，尋晚我主要係去擋坦克……。」我差點又昏了過去。

下午大部分人退往背向長安街較安全的房間，集合香港的同業開會，商討有何應對保命之策，幾個秀才說來說去，也不外是把大家的姓名、護照資料整理好交英國大使館，但槍林彈雨下，誰帶去，帶了去，誰能幫得上忙？

偶爾聽到勇敢的同業，獨自往醫院採訪，訪尋死傷者的消息，就為他們的安危，極度擔心，因為在資訊不透明情況下，謠言滿天飛，一會傳軍隊會搜醫院清場，一會傳軍隊會搜酒店房間、清查菲林錄影帶，一會傳軍隊已經在廣場燒屍，恐懼佔據了我們每顆細胞……

轉眼廿年，為甚麼要舊事重提呢？中國不是發展得很好嗎？要不是被老美金融海嘯席捲，祖國經濟只能往更好的方向發展，香港人只能繼續在百貨公司，暗自感謝同胞大包小包海量式消費。當你在巴黎老佛爺、LV店，看到碧眼金髮俊男，用普通話細語溫柔向祖國同胞介紹今年最新款式，也只能輕嘆：「中國人終於站起來了！」

但回頭看看，令我們這班劉姥姥記者大驚小怪的同一片土地上，同樣發生着很多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為上海東八塊拆遷戶討公道的五十九歲律師鄭恩寵，因為協助拆遷戶、向上級政府告發上海高層貪污，當中涉及港人熟悉的「上海首富」周正毅、黃菊、陳良宇，零三年十月被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判有期徒刑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判刑之日，上海主要媒體《新民晚報》、《解放日報》和《文匯報》，還發表了「『桂冠』背後的真相——鄭恩寵其人其事」文章，指鄭「在大庭廣眾面前，以一正人君子的模樣招搖撞騙……」

零六年六月鄭恩寵出獄後仍遭長期監視，女兒不堪騷擾，在一名港人資助下，赴美留學。

三十五歲維權人士胡佳，從事愛滋病者及拆遷戶維權工作，在網路發表五篇文章及兩次接受外國記者採訪，就被控顛覆國家罪，零八年四月在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被判監三年半。剛生下來的女兒和妻子被軟禁。

起訴書指：「本院認為，被告人胡佳目無國法，以造謠、誹謗等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罪行重大……」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反問：「如果說胡

佳僅僅因為寫了五篇文章，做了兩次採訪就要被判刑三年六個月再加上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的話，我倒要問問世界各地的人，問問中國的人，問問制定憲法的人，中國人到底有沒有言論自由？」

較近的有令全球受影響，國內最少六名嬰幼兒死亡，無數嬰兒患腎結石的三鹿奶粉事件。據《中國青年報》詳細報道，其實集團早在零七年底就陸續聽聞奶粉出問題，部分嬰幼兒食用後尿液中出現紅色沉澱物症狀。集團知道有問題但找不出原因，拖到零八年六月才把零七年底前生產的產品回收，卻沒上報。七月，集團作了一個重要決定——就是用錢堵住傳媒的嘴，在湖北、湖南地區，通過給媒體廣告費，封鎖消息，控制媒體。

七月下旬，集團終於找到了奶粉問題所在，查找的辦法是：將十六批由集團生產，但假稱是由市場打假收回的產品送檢，結果十五批驗出含三聚氰胺，但集團仍無意對外公布。

董事長田文華報告石家莊市政府，要求市政府出面，速辦投放三聚氰胺的不法奶戶和奶站，並請示產品召回。市政府又作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就是反對，還提出要以「人盯人的方法，安撫家屬，拿錢堵嘴，並專

門強調注意保密，防止出現消費者上訪的情況，同時要盡力避免媒體炒作。」

八月底，集團再次要求石家莊政府逐級上報，河北省政府要遲至九月八日才收到報告。

即是說，由零七年底至零八年九月，足足九個月，二百多天，無數在家中被六個八個人爭着寵愛的可憐寶寶，就這樣飲下了大量三聚氰胺奶。

過程中三鹿集團、傳媒和市政府，有數不盡的機會回收、改善、報道、公開，但為了一個錢字，就白白把人家孩子的生命葬送掉。

二十年前，北京一批大學生，以悼念胡耀邦為觸發點的活動，演化為民運。學生、知識分子和新聞界，要求民主改革、反貪腐、反官倒、要求讓新聞界說真話。運動的結局，大家都很清楚了，但二十年前學生、老、中、青知識分子，以生命追求的變革，今天有沒有實現呢？今天的祖國，有沒有比廿年前更開放、民主、廉潔？傳媒自由度，有沒有比廿年前多了，還是少了？

零八年底趁休假期間在美國訪問了一批流亡海外的學生、學者、以及一位仍然身在國內的前學運領袖，還有在香港的前黃雀行動執行人。

廿年，他們際遇各異，有人繼續努力對中國國情研

究，有人成為了銀行僱員、維權律師、傳道人。他們的故事，有血腥、暴力、悲情、浪漫，有些很恩雨之聲、有些很國產淩淩漆。

對廿年前的運動，是否不夠「策略」、不夠妥協，以致流血收場，各人有不同看法，但有兩點相同的：一、他們都仍熱愛祖國、心懷祖國。二、很巧合地，大家都認為，開槍的結果令聰明的中國人更專心一意努力向錢看，為了錢甚麼道德都可以不顧，至於政治改革、為民請命這些摩登玩意，就更別談了。

今年（零九年）也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當年反封建反帝國主義運動，北京精英倡導以德先生、賽先生救國。德先生追了九十年還未追到，賽先生呢？追到了，我們已成功用三聚氰胺虛假提升蛋白質含量。

那法先生呢？從事新聞工作就會特別對一些事情受不了，每當聽到看到，那裏又因為徵地，民警操棍棒甚至開槍來鎮壓人民，就會有疑問：又來了，這是我們要的開放改革嗎？法治今天休假嗎？

短時間內做的訪談，不可能是概括的，只希望透過他們的故事和心聲，重看影響近代中國歷史一次重要事件，分享他們對祖國的檢視和期望。

希望這次血的教訓，能讓祖國明天會更好。

目　　錄

序

鮑　彤 3

吳仁華 39

程　真 55

陳達鉦 95

陳一諮 107

王軍濤 137

浦志強 179

遠志明 201

附錄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人民日報》社論) 227

趙紫陽會見「亞銀」代表談話 230

絕食宣言 234

我的聲明和態度(章詒和) 235

我沒有了退路(章詒和) 238

事態的變化和我不變的立場(章詒和) 241

行政起訴狀 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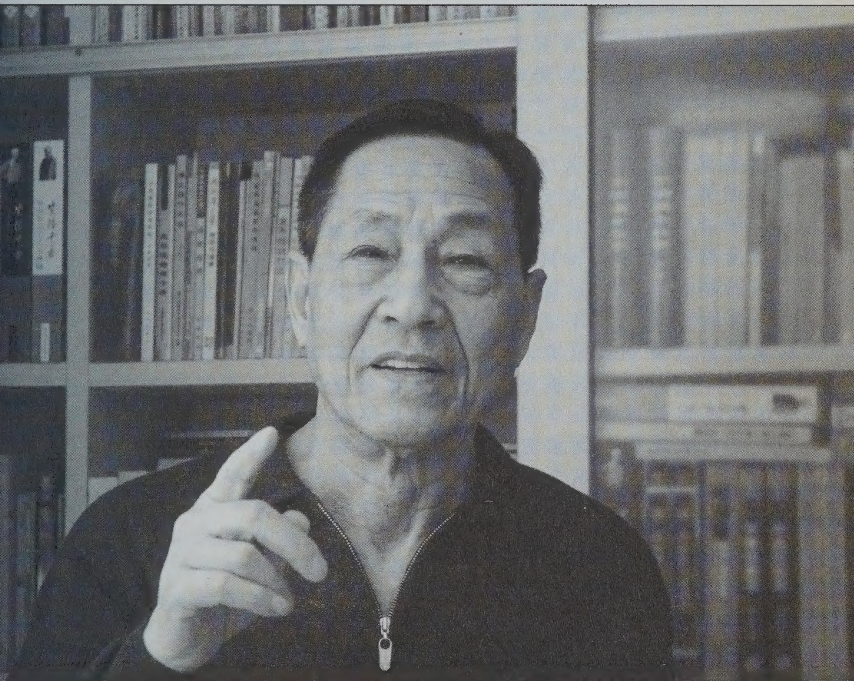
舊金山共識 251

零八憲章 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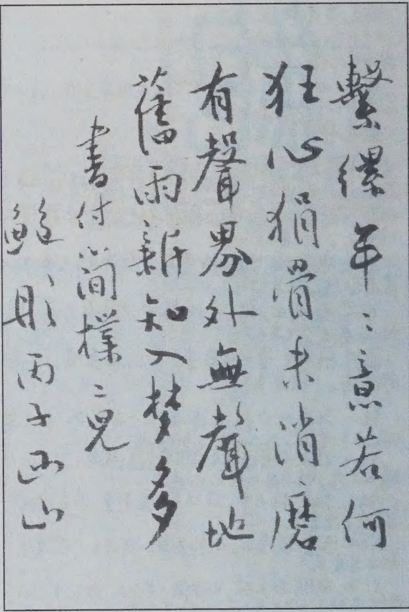
六四日誌 265

六四二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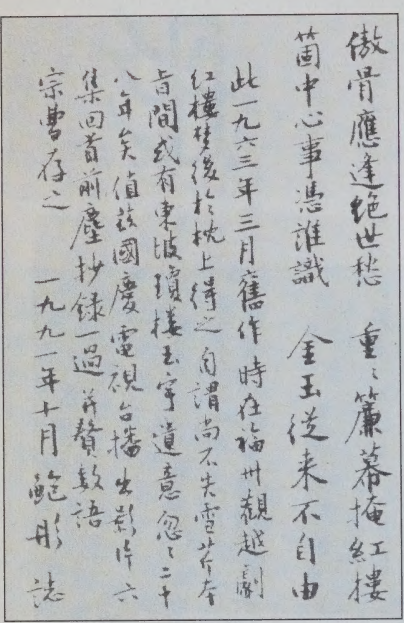
鮑　彤



我不是這種一黨專制制度下，冤假錯案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後一個。



繫縲年年意若何
狂心猶未消磨
有聲畧外無聲地
舊雨新知入夢多
書付澗樸二兄
鮀彤 丙子西山



傲骨應逢絕世愁　重重簾幕掩紅樓
箇中心事憑誰識　金玉從來不自由
此一九六三年三月舊作　時在福州觀越劇
紅樓夢後於枕上得之　自謂尚不失雪芹本
旨聞或有東坡瓊樓玉宇遺意　忽忽二十
八年矣　值茲國慶電視台播出影片　六
集回首前塵抄錄一過　并贅數語
宗曹存之　一九九一年十月　鮀彤誌

浙江海寧是個人傑地靈的地方，位近錢塘江，漁農物產富庶，又盛產鹽，清末有八成賦稅來自江浙一帶。由於條件好，海寧讀書風氣特別盛，盛產大官文人，最著名的一位鄉里叫查良鏞。往上數有不帶走一片雲彩的徐志摩，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齊名的國學大師王國維。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敗局已成，新中國尚未建立，一個對社會主義抱滿懷希望的十七歲海寧少年，千方百計加入了共產黨，當時他在上海著名南洋中學讀中五還未畢業，加入共產黨後幾個月，新中國成立，他就乾脆停學當起幹部來，上山下鄉在所不惜，一心努力救國。四十年後，八九年的五月，他被捕關進秦城。有人形容，他是代老上司坐牢，要黨總書記坐牢的確太難看了一點，就關在家裏吧，關在家裏的叫趙紫陽，關在秦城的叫鮑彤。

一九三二年出生的鮑彤，已經七十七歲了，多次遭受失去自由的滋味，多番折騰，身體時好時壞。第一次失去自由，是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時期，文革十年初期，被困牛棚不准回家，家人不准探望，愛兒出生一刻，他正忙於捱鬥。

七七年，鄧小平剛復出，全國科技大會正要舉行，鮑彤獲指派起草文稿，由於思路與鄧小平脗合，獲得鄧小平一字不改引用，之後一直受到重用。

八零年趙紫陽第一次到北京出任總理，鮑彤獲推薦出任趙紫陽秘書，開展了十年合作關係，極受趙紫陽信任，後又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副主任等職。

八七年中共十三大，總書記趙紫陽提出黨政分家理念，鮑彤身為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組組長，為趙紫陽準備「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並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兼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八九年五月廿八日，天安門廣場風起雲湧之際，鮑家收到中央辦公廳一個電話，說要接鮑彤往開會，接走後就沒有再回來，讓他成為了八九民運中最早被捕，也是被捕最高級別的官員。

最後鮑彤因「洩露國家機密罪」和「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項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九六年五月獲釋，馬上就被押到北京西山軟禁一年，到今天，他仍未獲真正自由。

「先生，你小心，有壞人在監視你！」銀行職員「遞紙

仔」警告眼前這位年老顧客。

「沒關係，他們不過是監視我的安全人員吧了，我們挺熟的。」鮑彤說。

出獄後至今仍被監視，鮑彤就試過在銀行被職員「遮紙仔」警告的哭笑不得場面。長期遭受監視，開始時心情自然極不愉快，但磨合多年大家都習慣了，有時他拿重東西，監視人員還會幫忙提東西。鮑彤可說是現時中國其中一個最安全的人，遭受廿四小時三班制監視，每次出外，監視的人起碼五個，因為通常一輛小汽車，剛好就夠坐五個人，但如果附近交通有可能出狀況，為防小汽車被堵，就得有摩托車輔助，監視規格就會多增一人，達到六個。如果鮑彤和兒子外出，監視的人就會加倍，可以想像場面有多「壯觀」。

現在幾點鐘呀？

一九四九年，十七歲的鮑彤對時局深深不滿，多番努力仍未找到門路加入共產黨，最後悄悄跟一位同學說：「我們一起去找吧，你找到你告訴我，我找到我告訴你。」過不多久，那位同學帶來好消息，他找到了。

「他教我：『明天你到一個公園去，貝當公園，就是現在的衡山公園，你手裏拿一份《大公報》，有人會來問你：現在幾點鐘呀？你要說我沒有錶，不知道幾點鐘，大概七點鐘吧，他就會說：你要找的人就是我。』」

鮑彤依足去做，就入了黨，之後才知道學校已經有很多黨員，其中有四個人比他低年級，鮑彤班級高、成績好，就成了四個人的支部委員。學校總共有廿八個黨員，鮑彤加入後增至廿九個，共六個支部，但支部之間互不公開身分，支部委員開會，他才知道替他找門路入黨的同學，其實老早已是支部委員。

入黨後負責組織工作，他就能看見學校黨員的全貌，了解整個黨員名單，到解放時，學校已增至三十六個黨員，共七個支部。

解放後鮑彤沒畢業就開始工作，年少的他相信開展抱負的機會來了，很希望能跟鄧小平到西南，踏遍祖國

河山。

「到四川、到雲南、到貴州，我心裏想，走得越遠越好，我可以了解中國，我願意到農村去，看看我們這個國家到底是個怎樣的國家，我只知道南方、東方，不知道西方。」

但這個願望遭拒絕，黨讓他留在上海，他就跑去考記者，原本要考兩天的，但考了半天，區委就來找他，派他到華東組織部工作。派下來的是一份令他很失望的差事，做最枯燥乏味的工作——整理幹部檔案，包括黨員個人資料、工作及表現紀錄，以便將來任用。後來才知道，是因為他的黨員登記表格寫得很仔細，字寫得很工整，黨就看中了他的細心。四九到五四年在華東組織部六年，除了剛開始整理檔案之外，就是做幹部統計、政策研究。

五四年初調到北京中央組織部，部長是鄧小平，但實際工作由副部長安子文去做，安子文深受劉少奇信任，對鮑彤影響也很大。由五四到六六文革爆發，鮑彤十二年在中央組織部，開始時是單位內最年青、黨齡最淺、級別最低、工資最低的。五七年反右派，鮑彤被指有右傾思想，五八年下鄉勞動，勞動期間寫了封信給安

子文：「現在的大躍進放衛星，高產，是假的。我這個地方放了一顆衛星，在《人民日報》登了第一版，說是一畝地，就是十六分一公頃地，可以打五千斤糧食，這是假的。這種事情不好，破壞了大躍進的名譽，破壞了共產黨的名譽，對生產不好，老百姓非常討厭。」

安子文知道了有鮑彤這個人。五九年出差到東北就帶鮑彤前往。從六零年開始，中央組織部的文件都由鮑彤起草。六三年開始，安子文自己的文件、文章、向中央的報告，都由鮑彤起草。後還當上了研究室副主任，算是相當高級別的了。也因為要起草文件，安子文有事都要找他談，介紹背景，否則文章寫不出來，鮑彤因而對中央一些情況有所了解。

鬥完了告訴我，你老婆在醫院生孩子

「但是一九六六年文革來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還在天安門向人民招手，背後還跟着一個人，叫安子文。八月十九日毛主席就宣布安子文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幫，因為毛澤東心裏很清楚安子文是劉少奇的人。當時劉少奇還未被移除，還是常委，但已經不是副主席了，林彪變成唯一的副主席，連朱德、周恩

來、陳雲都不是副主席了。劉少奇表面上還在上面，但是他主要的人都下來了，當時有彭羅陸楊：彭真，是劉少奇最好的朋友，還有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毛澤東把他們一個一個的動了，現在要去掉安子文，再過幾個月就要去掉劉少奇了。當去掉劉少奇的時候，我也變成黑幫了，變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也捱鬥了。從六六到七六年十年當中，我一直當反革命，不准住在家裏，要住進牛棚，每個機關都有牛棚，就是隨便找個地方，說這是牛棚，你就來住，你家裏人不能來看你，你也不能回家，幹甚麼呢？就是開會檢討，叫你出來批判你，鬥爭，就這樣子。」

鮑彤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兒子就是在捱鬥時出生的。



零二年鮑彤和太太蔣宗曹合照。

「鬥完了告訴我，你老婆在醫院生孩子，我從機關跑到醫院，公車已經沒有了，要走很遠，到了已經是半夜兩點鐘，醫院已經關門了不能看，第二天再看。捱鬥時不痛苦，很多人認為很痛苦，我是看到家人時痛苦，自己的痛苦都可以忍受，受得了，但是我當時還有父親、母親，年紀很老了，他們跟着我到農村去，孩子很小，女兒還未上小學，兒子剛生出來，我為了他們就很痛苦。但當時不光是我一家人，全國幾千萬人都是這樣子，現在很多人都忘了，認為共產黨對他好得不得了。」

十七歲入黨，對共產主義、對黨忠心耿耿，史太林死時還痛哭流涕。

有的縣三分之二餓死

一九五三年在華東組織部，鮑彤收到浙江省電報，當時有一個選舉，很多土改的幹部落選了，鮑彤起草了一份文件，表示選舉中有人落選是很正常的，應檢討缺點，讓錯誤不再重複，文件交給華東局。

「華東局把它改掉，改成：『落選的幹部都是我們的積極分子，我們要千方百計讓他選舉上來。』我懂嗎？

我不懂，千方百計怎能令老百姓選舉不要的人呢？用甚麼千方用甚麼百計呢？但是我想，大概我水平太低，經歷太少。所以開始時是真正相信，後來有點懷疑，真正懷疑是由於有餓死人，而且是大批餓死。五八年底五九年初，河南的信陽地區，有的縣三分之二餓死，我知道了是因為有一天很偶然的，安子文聽一個報告，叫我去做紀錄。知道後那天晚上一晚睡不着覺，怎麼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會餓死這麼多人？一個縣三分之二的人餓死，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我沒法睡覺，但是我還想：下面的人在胡鬧，大概毛主席不知道的，後來我知道他是知道的。

「當天與會的都是大幹部、部長，安子文非常生氣，下令停會，馬上出去打電話給周恩來。回來說：『我打了電話給周恩來，要求中央討論，開黨代表大會我要跟河南省委書記辯論，他怎麼對得起人民？』所以我非常佩服安子文。既然他向周恩來報告，我相信周恩來和毛澤東是不知道的。」

毛澤東是偽君子

「到了文革，我才想起來為甚麼要搞文革呢，毛澤

東自己對名記者斯諾說，六二年就想搞掉劉少奇，六二年甚麼事，就是七千人大會，全黨七千個負責幹部到北京開會，開會時毛主席說形勢一片大好，底下的幹部接受不來，劉少奇出來講話說：『我們的工作有成績有缺點，成績要講夠，缺點要講透，不要隱瞞。有人說我們是七分成績，三分缺點，我看不一定，有的地方是七分成績，三分缺點，有的地方可能倒過來，三分成績，七分缺點，有人說這是天災，有人說這是人禍，有人說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但是我去過一個地方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主要是人做成。』劉少奇講這話，講到我心裏，非常對。既然如此，為甚麼到了六六年，四年後毛澤東說劉少奇弄權呢？因為劉少奇講了真話，毛有意識的不准人講真話，後來接二連三的事，毛澤東都在講假話，甚麼劉少奇是人民公敵、彭德懷裏通外國、大躍進不就死了幾個人，他還說這話：『不就死了幾個人』，好像死了幾個人是雞毛蒜皮的事。一個人為了人民革命，然後說死了幾個人是小事，我覺得這個人一定不是為人民革命，一定是為權力革命，到這時我覺得他是個偽君子，我認為不是我一個人的感覺，和我一起的人講話的時候，大家都不說，大家背後都有一句話：毛

澤東是偽君子。」

安子文結果被關進秦城，後來又被弄到安徽去，七九年從安徽回北京，他第一句就問鮑彤：「共產黨員要監督，誰來監督黨主席？」鮑彤就知道，他心裏想、不敢問的問題，其實跟早他三十年入黨的人，是一模一樣的。

「我過去老是覺得自己思想沒改造好，看問題跟毛主席不一致，我現在知道了，我是個誠實的人，他是個偽君子，所以看問題總是不一樣。不是他不了解情況，而是他不准人講真話。我能夠這樣講是因為九二年共產黨開除了我黨籍，否則我不會說毛澤東是個偽君子，共產黨是為了權力，因為黨的紀律對我沒有約束力了。他不能管我了，我可以用我的心來說我自己的話，一開除我就解放了。」

毛主席去世時鮑彤在南京，他是被康生趕出北京的，七五到七七年在南京一個建設工地工作。七六年發生了很多大事，毛澤東死了，他死以前周恩來死了，鄧小平被說成是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後台，四月被撤職，九月毛澤東也死了。七七年全國要開科學大會，鮑彤被調回北京起草文件。

「我在南京上了火車，可能是晚上六、七點吧，高音喇叭在播新聞：『中共中央決定，恢復鄧小平同志的工作。』我很高興，鄧小平是我們中央組織部的部長，但我不認識他，他從來不到中央組織部來，我對他的印象一般得很，要講真的話，劉少奇的水平比他高得多，但既然毛澤東說他是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黑後台，那麼他就是個好人。」

跪着造反

火車上鮑彤就決定，為科學大會起草的文件要講兩句話，一是知識分子是甚麼？二是科學是甚麼？文革剛結束，所有人文價值百廢待興，倒霉了十年的鮑彤甚麼都沒幹成，已經四十五歲了，唯一資產是政治練歷，他很聰明地採取了「跪着造反」策略。

「甚麼叫跪着造反呢？我說知識分子好，沒有用，因為大家都知道工人階級好，因此我先跪下，第一句講：工人階級好，第二：知識分子是工人的一分子，那麼知識分子也就好了嗎？你接受了，我跪着造反就成功了。第二句話，你說科學好，人家說革命好，我怎辦呢？我就跪下來說，革命好，科學實驗也是革命，科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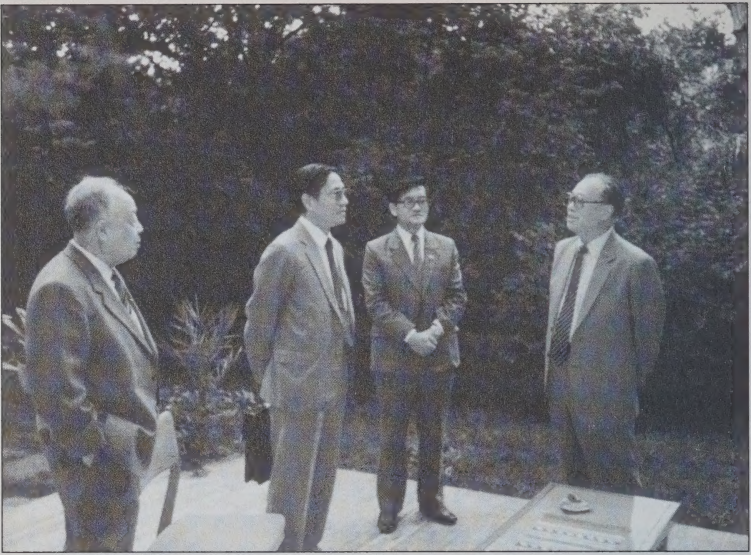
實驗也是革命誰說的？毛澤東說的，一九六三還是六四年，親手寫的文件，說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科學實驗，是三個偉大的革命運動，那麼我從毛澤東的話來，先給大家叩個頭，說革命是好東西，科學實驗也是好東西，那誰能反對我？我在火車想通了，文件只要能寫這兩句話，知識分子會很高興，大家都能做科學，中國就有希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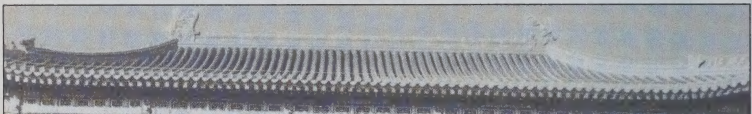
聽說過這個名字，來吧

結果文稿被鄧小平一字不動引用，科學大會後，七八年成立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鮑彤留下當辦公廳副主任兼研究室副主任。

八零年四月，中央決定讓政治局常委、副總理趙紫陽當代理總理，代理華國鋒職務。華仍是總理，但不用管事情，由趙紫陽來管，趙紫陽四月到北京，廿多日抵京後向中央組織部要幹部，中央組織部說：「有個鮑彤你要不要？」趙紫陽說：「聽說過這個名字，來吧。」

五月一日鮑彤接獲通知，欣然接受，五月二日往探病重的老上司安子文，坐過文革牢的安子文當時癌症擴散，說話艱難，已經在倒數之中，聽到鮑彤被安排替趙


一九八六年和趙紫陽工作照。


一九八七年和政改辦同仁合照，背景中南海紫光閣，自明朝已有，清代時是皇帝辦公的地方，新中國成立後成為領導人辦公室。前排右二是嚴家祺，六四後出逃，現居紐約。

紫陽工作，撐着病軀跟他說：「去吧，趙紫陽第一敏銳，第二寬厚，去了以後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我就去了。我相信安子文當了幾十年組織部長，看人有他的經驗。」

兩個月後老上司就去世了，當然鮑彤怎也沒料到，這個安排影響了他的下半生。

跟趙紫陽一工作就是十年，一九八零年五月到八九年五月廿八日被捕下獄，剛好十年，一個月也沒多沒少。期間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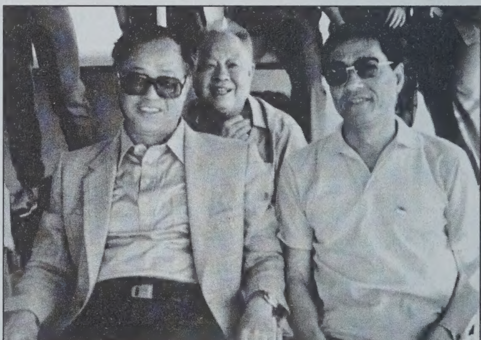
凡是毛澤東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東西通通改掉，這就叫改革

「很多人把改革分為經濟改革、政治改革，我也跟着大家這樣分，其實是不對的，改革就是改革，沒有甚麼經濟改革、政治改革，不能這樣分的，為甚麼？首先要看改革的對象是甚麼，我認為就是把毛澤東跟共產黨加在人民身上的東西改掉，凡是他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東西通通改掉，這就叫改革。你改經濟能不改政治嗎？你改經濟、政治，能不改思想嗎？能不改文化嗎？能不改這個社會嗎？不可能的。當然做起事情來是要分開

的，毛澤東死了，改革就可以開始了，但是有個過程，真正的改革是由平反冤假錯案開始的，平反冤假錯案的功勞屬於胡耀邦，所以我非常尊敬胡耀邦，他平反冤假錯案，就等於說，毛澤東思想錯、政策錯、體制錯。平反了幾十年這麼多冤假錯案，就使人腦子不敢想的東西，現在敢想了，不敢說的東西敢說了，這個時候是改革的開始。但仍然只是想改革，真正做改革的，是由把人民公社解散開始，經濟改革、農村改革，這工作誰做的？趙紫陽做的。」

螞蟻比大象

改革一開始就出現了兩個差別，第一個是製造了多勞多得，會經營的多得，鼓勵人民努力勞動，盡量動腦筋，發財，只要做正道就有可能收入比人家好。但是第二個差別就出了大問題，最終導致八九民運發生。


八六年鮑彤和趙紫陽合照。

「但是差別包含了不好的東西，我是某某人兒子、弟弟，我跑到那個地方去佔點便宜，這個就叫做官倒。有兩種價錢，同樣是蓋房子的鋼筋，國家的價格，比方說兩元一斤，拿到市場，五元一斤，一斤就賺了三塊錢，誰能幹這個事，必須有權力的人才能幹這個事。我是冶金部長的兒子，我是水利部長的朋友，我就能買得到，我就能佔這個便宜，這個老百姓就叫倒賣、官倒。老百姓不滿意，因此有差別是改革的成果，把政治、權利因素引進到差別裏面，這是不好的。對第一個差別老百姓是滿意的，對第二個差別老百姓是不滿意的。要解決第二個差別靠甚麼？靠政治改革，靠民主、靠監督。最重要的不是靠選舉，當然選舉非常重要，但第一要靠輿論、靠媒體、靠記者。所以經濟改革如果沒有政治改革，它可以產生差別，但不能令差別在合理程度以內，要走到邪道去，這就發生問題了。所以八七、八八發生這問題，羣眾不滿，我認為正常的，要解決怎辦呢？政治改革，羣眾對這個不滿，也就是對不搞政治改革不滿，因此應該理解羣眾，不要罵羣眾你要搞自由化，你要造反，你要反對黨的領導，你要揭發我們的陰暗面，如果這樣壓制羣眾，那就完全錯，應該搞政治改

革，民主、透明化、輿論監督、言論自由，對當時面對的問題要分析。」

鮑彤更形容，當時的所謂差別，和現在相比，根本是螞蟻跟大象比。

「當時我知道的腐敗是甚麼？我送你一條中華煙，你替我家裏安電話，就這麼個事情。現在的問題呢，我給你兩幢別墅，我給你兒子女兒出國，你給我一個合同，這個合同是個壟斷的合同，一賺就是幾億、幾十億，這兩個東西根本不能比。性質規模都不一樣。而且當時老百姓可以說話，報章可以登，中央開會非解決不成。現在我看，叫做『虱子多了就不癢了』。身上全是咬人的虱子，也不知抓哪裏，反腐敗當時很小一個問題都要拿出來討論，這個問題怎辦？那個問題怎辦？現在到處都是這問題，也不知該怎辦。現在中國還有死刑，但是陳良宇都可以不判死刑，那你這個死刑對誰呢？難道對鮑彤嗎？」

共產黨保留，一黨統治去掉

鮑彤認為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要全面改革。

「經濟改革不叫改革、政治改革不叫改革、思想改

革不叫改革、文化改革不叫改革，所有東西加起來，就是叫社會改革，社會要改革。

「現在中國的所有問題就是一個黨，一個黨的絕對領導，一個黨的絕對權力。很多人問我是不是要把共產黨打倒，我說不要，我反對打倒共產黨，因為共產黨不光是一個黨，裏面有中國最好最能幹的人，也有中國最壞的人，你如果把它打倒，等於把最好最有能力的人打倒。十三億人裏有七千萬，如果把中國最有能力的人都打倒，那中國還有甚麼希望？但不應如現在掌管全國權力，因為它只是一個黨，十三億人的事應由十三億人管，不應由七千萬人管，更不應由七千萬人中抓住權力這些壞人來管。怎辦呢？把共產黨和一黨統治分開，共產黨保留，一黨統治去掉，這樣一個共產黨是我可以接受的，它能做好事，只有共產黨沒有一黨專制，它就一定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壞事。它如果做壞事，不單老百姓不滿，黨內的黨員也會向自己的領導提出抗議，黨自己就有免疫能力，要是共產黨加上了一黨專政呢？那就得了愛滋病，沒有免疫能力，病毒細菌來侵襲，它不可能把自己的病毒細菌殺死，那就必死無疑，必須把一黨專政這個癌症割掉。總之，去掉了一黨專政，共產黨好

極了，前途無量，可以像美國的共和黨、民主黨一樣，成為老百姓所願見到的政黨。如果它不把一黨專政去掉，很可怕，就像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德國。」

和平請願説明羣眾對共產黨有很大希望

鮑彤説，八九民運一開始並不是大規模的羣眾抗議活動，是步步升溫。開始是悼念胡耀邦，胡耀邦去世大家很悲痛，悼念胡耀邦意味着對他的敬仰同情、理解支持，和對鄧小平的不滿，因為沒有一個中國人不知道，胡耀邦是被鄧小平搞下去的，所以悼念胡耀邦令鄧小平不快，就是給鄧小平很難看。悼念的人越來越多，學生以外，市民也來了，北京以外，外地也來了，最後羣眾的口號集中到兩點：一點叫反對腐敗、一點叫要求民主，這個時候就不是悼念胡耀邦了，叫和平請願。這個時候鄧小平說：「這是動亂。」就激怒了羣眾，就由和平請願演化為和平示威抗議。

「如果悼念胡耀邦，第一步領導説：『對，我們大家一起來悼念吧。』羣眾就很高興，覺得領導理解他們的心，就肯定會合作，不會發展到和平請願，已經發展到和平請願，就説明羣眾對共產黨不滿意。第二説明羣眾

對共產黨有希望，有很大的希望，沒有絕望，所以才請願，要不我打倒你就完了，還請願幹啥？這個時候如果鄧小平能抓住這點，說好，我們大家一起來反腐敗，一起來搞民主，羣眾就會叫好，不會一邊說這是動亂，一邊抗議。所以這個三步本來是可以很好解決的，本來是可以成為推動中國進步的動力、轉折點，使中國向好的地方轉彎，領導上鄧小平沒有理解羣眾的心，結果運動一步步的發展成為不可收拾的局勢。」

鮑彤認為「八九」是場了不起的運動，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死亡，到六月三日，五十多天，日夜由幾萬到幾十萬個學生、市民，在天安門廣場等着，是股巨大的力量和信念，本身的規律就是對共產黨不滿意但抱有希望，要說罪魁禍首，就是激怒羣眾的鄧小平。

「當時連小偷都感動了，說我們現在不能偷東西了，全國都在關心這問題我們還能偷東西嗎？所以公安局都沒有人來說我家掉了甚麼東西，沒這個事情。秩序好極了，甚麼叫動亂、暴亂，這不對的。共產黨搞了多少年羣眾運動，但實際上不理解羣眾的心，所以就變成這樣。」

身為高官，鮑彤到過廣場一帶視察，認同羣眾所想

解決的民主問題，就是他想解決的問題。羣眾反對的腐敗，他也反對。

難道胡耀邦當時被謀殺的嗎？

「共產黨歷來認為歷史是它自己寫的，但劉少奇說：『歷史是人民寫的。』我也認為歷史是人民寫的，不是官方寫的，譬如官方指責說這是動亂，我說不是，假如真是動亂，也是被鄧小平迫出來的。第二如果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但他明明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不滿意又抱有很大希望，否則他向你請願幹甚麼？我想在現代社會，擁護一個黨有自由，反對一個黨也有自由，擁護社會主義有自由，反對社會主義也有自由，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應構成甚麼罪行。至於說有計劃，已經十九年了（註：訪問於零八年進行），請你把他們的計劃拿出來看看吧，當時就是胡說八道，現在也拿不出甚麼計劃出來。有組織的，我請問，是誰組織的，是趙紫陽組織的你拿出證據來，拿不出來。說有預謀的，更可笑，難道胡耀邦當時被謀殺的嗎？胡耀邦死以前就有預謀的嗎？我說荒唐！這種中共中央的結論，小孩子都騙不了，歷史是人民寫的，我相信結論應該由人民來做，特別是將

來能自由講話的人民來做。再過五年十年，越來越清楚了，老百姓不會遺忘的，全世界也不會把它忘掉。」

難道要靠無法無天來解決問題嗎？

趙紫陽在八九年五月四日，亞銀年會上講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得到很高的評價，當時香港很多人都為此鬆一口氣，認為政府轉向寬鬆開明處理學運，但事後國內有人說他的講話未經政治局討論，因此是不合法的。執筆人鮑彤為此辯護。

「在任何一個共和國提出來都是合法的，如果不在民主軌道上解決問題，難道在獨裁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嗎？如果不在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難道要靠無法無天來解決問題嗎？所以按照民主法制的原則來解決問題，是不需要討論的。如果真有反對在民主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我認為就應該拿到政治局討論，這個東西到底符不符合共產黨的性質跟社會主義的本質，符合不符合國家的憲法。」

一人推翻政治局決定

「這個問題其實只差一步就實現，當趙紫陽五月四

日提出這個問題時，我記得很清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共五個人，趙紫陽一個，他是提出這個問題，李鵬一個，趙紫陽講了以後，我當時就在邊上，李鵬就說：『紫陽同志你說得好。』李鵬是贊成的，喬石是贊成的，說：『紫陽同志講得非常好。』胡啟立是贊成的，說：『紫陽同志你講得好。』有一個人沒說話，他是姚依林，他沒說好，但也沒說壞，五個常委四個贊成，不就能實現嗎？

「五月八日開完政治局常委會議，贊成紫陽的方案，還要政治局通過，五月十日開政治局會議，十幾個委員，包括江澤民從上海跑來開會，也同意紫陽的方案，五月十四日，趙紫陽跟鄧小平談了，鄧小平說了三個字：『都同意。』當時國家主席楊尚昆在邊上，鄧小平都同意了，一步之遙就能實現了。人大委員長會議也同意了，五月十日，人大委員長萬里請所有的副委員長來開會，傳達了趙紫陽在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上的意見，會議同意，馬上決定在五月二十日開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所以只要人大常委一開，趙紫陽的意見就在全國實現。

「問題在於五月十七日鄧小平開了一次會，會上把

常委會議決議推翻，把政治局會議決議推翻，把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自己說的『都同意』收回，把人大副委員長會議同意要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推翻，因此這個問題就無法在民主跟法制的軌道上解決，一個人就有這樣的本事，可以在十一億人的國家作出一個這樣的決定，這是驚人，只差一步。

「五月十六日我還很有希望，五月十七日我就手腳冰冷。」

八七年黨十三大政治局常委會議通過，任鮑彤為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書，但鮑彤沒獲准參加五月十七日那次重要的政治局常委會議。可悲的是原來連黨總書記趙紫陽也不知道要開這次會議。

我的看法是根據無法無天

「趙紫陽打電話給鄧小平秘書，問小平最近身體怎樣？『我明天想要向他匯報一些重要的事情，可以不可以？』後來回話：『來吧。』趙紫陽第二天去了，趙紫陽以為他約了鄧小平兩個人談，跑到那邊去，所有的常委都在，李鵬在、姚依林在、喬石在、胡啟立在、楊尚昆也在，楊尚昆不是常委，這時鄧小平告訴趙紫陽，今天

開常委會。按照黨章規定，常委會由總書記召開，那麼現在呢，常委會由鄧小平開，趙紫陽也不知道來開會，也沒有通知政治局常委秘書鮑彤參加，但我可以負責任的告訴你，會議上有三件事，第一：姚依林批評趙紫陽，五月四日在亞銀講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問題』那篇講話，把全國人的思想搞亂了。第二：鄧小平提出不能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應該靠部隊戒嚴來解決問題。第三：趙紫陽不同意，說：『這樣的決策我沒法接受。』後來沒有表決，李鵬、姚依林贊成鄧小平的意見戒嚴，喬石跟胡啟立的意見，大概是含糊，說：『那黨怎麼決定怎麼辦吧。』楊尚昆是沒有表決權的，楊尚昆會前同意趙紫陽意見，在會上可能改了，變成同意鄧小平意見，不管怎樣，楊尚昆是沒有表決權的。在這個情況下，五個人，趙紫陽反對，兩個人贊成，兩個人不說話，一個人沒表決權，據說就在這個情況下鄧小平說這是常委意見，多數意見，就這樣決定。我只能說，解決一個十幾億人口大國這麼重要一個問題，決定用軍隊來對付結集在天安門廣場，幾十萬上百萬的羣眾，就這麼決定，叫做常委多數，我說這叫兒戲，不是一個負責任政黨開一次負責任的會議的正常狀

況，我只能這樣說。我講這三點，跟我的判斷，由我負責，真實性由我負責。我根據後來所有事情的發展，我作出這樣的判斷我有信心是事實。根據何規何法嘛？要問鄧小平要問江澤民，我的看法是根據無法無天，他們如果有甚麼規甚麼法，那麼請他們提出。」

他把人民的權利看得比共產黨的權利更重要

鮑彤認為趙紫陽是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一心一意希望令共產黨成為一個文明理性的政黨，嚴守紀律，共產黨員應該懷念他。

「趙紫陽有兩大特點，是其他共產黨領導人所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的：一、他把人民的呼聲看得比共產黨的意識型態更重要。二、他把人民的權利看得比共產黨的權利更重要。為了堅持這兩個原則，他甚麼都不可惜，他可以不當總書記，可以被軟禁，但是他要發表自己的意見，他也不後悔，他也不檢討，他心裏有人民，因此在所有共產黨領導人中，這兩個特點是非常突出鮮明的，我想人民應該懷念他，他是人民的好朋友。他於心無愧，不向權力低頭，這點我想人民在很長時間以後都會懷念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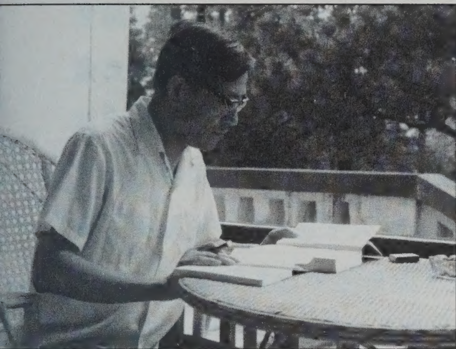
為香港前途《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趙紫陽，其實跟香港早有淵源，一九六零年，四十一歲，任中共廣東省常務書記，六二年初赴北京參加鮑彤所提及，著名的中央七千人大會，同年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六五年初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廣州軍區政委。

長期靠近香港，令他對資本主義是甚麼一回事，有一定印象，不過倒是跟香港商人的交往，才讓他開竅，八零年代初，趙紫陽和霍英東一次打高球之後午飯，趙紫陽抱怨，廣東地很多，但沒錢開發，霍英東說：「你有地還愁沒錢？」趙紫陽才恍然大悟，由於國家政策的原因，原來自己一直在坐着金蛋發愁。

五一七政治局常委會議後，趙紫陽因無法同意鎮壓決定而辭職，六四後被軟禁，至零五年一月十七日逝世，足足失去自由十六年。女兒王雁南嘆道：「他終於自由了。」

我不是這種一黨專制制度下冤假錯案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後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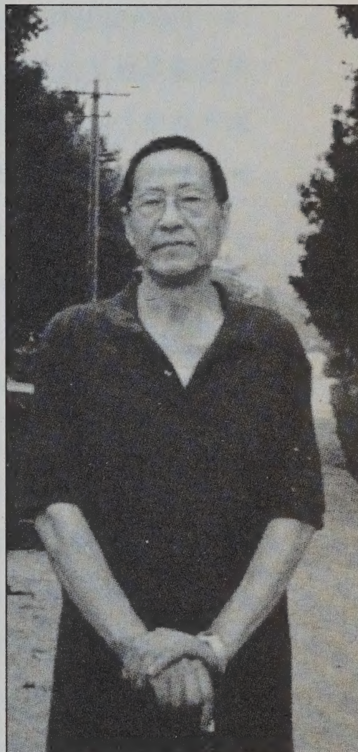
另外，涉及鮑彤有一個說法，是鄧小平指他是壞人，一句話就決定了他下半生沒自由的命運。



一九八四年的工作照。



一九八七年在辦公室。



甫出牢獄又被押到北京西山郊區軟禁一年，那裏專供負有特別職務的公務人員居住，例如讓高考出題員居住，沒有電話，基本上與世隔絕，鮑彤明顯消瘦。

「我不能證明，當時負責我這個案子的領導人跟工作人員，如果認為我無罪，我向他們表示感謝，因為他們主持了公道，如果他們後來屈服於某一個人的壓力，最後判我有罪，那麼我理解他，他們也只能這樣做。二、鄧小平有沒有說鮑彤是壞人？是不是我這個案子由他決定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從中國共產黨的體制來說，這種可能性幾乎百分之九十九不能排除，可能性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九。三、如果是鄧小平作出這樣的決定，我也能理解他，因為我知道，鄧小平也不過是一黨專政的產物，他自己就是在一黨專政當中生長出來的一個東西，他作出這樣的判斷我能理解他，我對他沒有個人恩怨。但是我要強調的問題，我不是這種一黨專制制度下冤假錯案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後一個，也不是最痛苦的一個，比我更痛苦的、更慘的人，有的是。在我以前有的是，在我以後直到今天，仍然，仍然出現這樣的事，我對這種事情不能理解。我可以理解過去，我不能理解現在。我希望在和諧社會中，如果十七大的和諧社會是真話不是假話，少出一點這樣的悲劇。如果這悲劇今天會出在我的頭上，那麼明天這悲劇會出在別人頭上，甚至出現在現在的領導人頭上，就像過去出現在趙

紫陽頭上，為甚麼領導人頭上就不能出現冤假錯案？劉少奇冤假錯案、彭德懷冤假錯案、鄧小平不也遭過冤假錯案嗎？鄧小平自己給毛澤東冤假錯了以後，他還要冤假錯胡耀邦，還要冤假錯趙紫陽，我希望這種事少一點，不要了。

「我認為我自己無罪，我的良心是平衡的，我沒有做對不起人民的事，也沒有做傷害共產黨的事，當我做這些事的時候，我希望共產黨得到新的生命，真正的生命，而不是腐敗的結果。」

它還可能重演，就像它本身是文化大革命的重演

對於六四，他的結論是一個國家如果由一個人來獨裁，或者由一個政黨來專制，或者由少數寡頭來統治，國家也不可能是負責任的國家。特別是武器科技越來越現代化情況下，政治經濟軍事人口大國，尤其不能由一個人、一個黨、一個寡頭集團來主宰國家命運。

「兩點教訓，天安門事件是大規模社會矛盾的爆發，趙紫陽已總結了，我同意他，處理這樣的問題應堅持民主法治原則，不能遵從非法獨裁的原則。二、處理

這麼大的社會矛盾，必須通過和平對話，不應該通過對抗，特別不應該訴諸武力，離開這些原則國家就陷入災難，不管你解決的問題是窮人跟富人的矛盾、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矛盾，還是這個民族跟那個民族的矛盾，還是這個宗教跟那個宗教的矛盾，都應根據民主法治和平對話原則處理，否則不可能和諧，只能得到分裂對抗、兩敗俱傷、同歸於盡。我認為這個教訓到今天仍未過時。

「六四事件是個大悲劇，可歌可泣，我想就像我們講千年前的故事一樣，一千年以後還會有人研究、探討它的經驗教訓。它是中國人民在追求民主道路上遇重大挫折的真實事件。這樣大規模的事，連續了五十多天，捲進了幾百萬羣眾，最後用幾十萬軍隊來解決問題，這種經驗是世上少有的。我希望以後再沒有，我也希望人們能研究它的經驗，避免犯大的錯誤，忘掉了這點，悲劇就會重演。如果不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並不是一去不復返的，它還可能重演，就像它本身是文化大革命的重演一樣。」

飽受十年文革之苦，坐過七年六四的牢，至今上銀行還要遭職員「遞紙仔」，但鮑彤仍對中國前途感到樂

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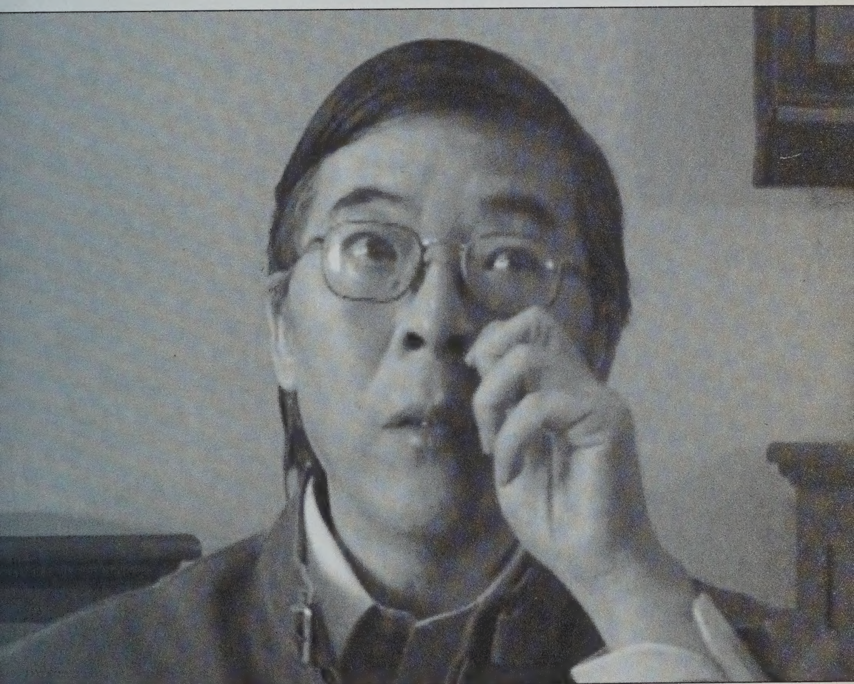
「並不是因為我這個人樂觀，中國是個多元社會，有富人有窮人、有大款小款也有窮得一塌糊塗的、有不同種族，中國不光是大陸，還有台灣、香港、澳門，如果解決得好，台灣將來能在一個共同體上。處理多元社會只有兩個辦法，一是靠互相理解、互相讓步、互相寬容。還有一個辦法：靠拳頭，就只能兩敗俱傷同歸於盡，中國就一定沒有民主。互相理解、互相同情、互相讓步，最後就達到和睦和諧。要找到當中的遊戲規則，一定是民主、共和、代議制。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甚麼？你聽過一個共和國是沒有民主選舉、沒有言論、新聞自由、用拳頭軍隊對付異見人士、對反對一個黨反對一種主義當作罪行的嗎？如果有這樣一個共和國，一定是假共和國。如果是真共和國一定要互相討論、互相研究、互相商量，要有秩序。趙紫陽說：『要冷靜的克制的理性有秩序的解決問題。』這個秩序就是民主。所以我認為一個多元社會如果不想自殺，要生存，它一定要找到一種規則，這個規則一定是民主，只要中國不是個一元化社會，它總要走上民主的路，所以我對中國民主的前途充滿信心，我相信我們

這個多元化國家不會自殺，是要在互相理解中建立秩序，這個時候就是中國的希望，時間可長可短，取決於我們自己的努力，中國人來維護憲法的權利，自覺堅決長期的，那麼現在這個假共和國，一定會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共和國。這就是中國的前途，我對它充滿希望。」

為紀念六四二十周年，美國三個關注中國基金會合作攝製大型五集紀錄片，《歷史的震撼——天安門事件實錄》，總製片人是前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

由於鮑彤先生長年被監視，訪問難以進行，本文根據陳一諮先生籌組的訪問，及其他訪談寫成。感謝陳一諮先生和協助我完成工作的人。

吳 仁 華



讀古書一直說，忠孝不能兩全，我跟我母親說，你原諒我這個不孝子。

「要不是為了朋友，要把真相讓海外的人知道，你現在再給我一百萬美元我都沒有勇氣跳下去，七度的溫度、黑夜中風雨交加、滔天巨浪，實在是九死一生。」

吳仁華，五十三歲，浙江溫州人，六四時是政法大學，中國古文獻專業講師，是四月十七日，首批發起遊行往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的北京知識分子。為這場震撼中外的民運，揭開序幕。

在此之前，吳仁華剛在北大碩士畢業，按規定要駐校任助教兩年，才可以升任講師，但獲政法大學校長破格取錄任講師，學術康莊大道等待着他開拓，閒來最愛和王軍濤等知識青年在宿舍聚會，議論時政，過着相對優裕的生活。

一場運動下來，吳仁華為要營救朋友，帶出歷史真相，跟年老寡母不辭而別，由珠海投奔怒海，偷渡到澳門後再經香港到美國，寫下《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現在是《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

國內大好事業、大好家庭，都沒有了。

八十五歲寡母，已經二十年沒見，「也許這輩子我見不到她了！」

小吳，你們就這麼散啦？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

四月十七日，時任政法大學講師的吳仁華，和幾個朋友動手自製大花圈，準備遊行送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校方見勢頭不對，請纓派車接送，吳仁華心想，那怎能算得上是遊行？

「不用客氣，謝謝你了。」下午一時校門打開，二、三百個師生推出一個三米高大花圈，打着校旗往天安門進發，一場震驚中外的民運，由此展開。

到了廣場，吳仁華和學生繞廣場一周，然後步向人民紀念碑獻花，加入行列的已增加至二、三千人。

獻完花，師生正準備散去，大學共青團團委書記走過來輕聲問吳仁華：「小吳，你們就這麼散啦？」原來很多人嘴裏沒説，心裏在想，應親自前往胡耀邦家，明確表達悼念之情。結果就去了一批人。

十七日晚上十一時以後，中國民主發源地——北京大學的校門打開，包括王丹在內的代表，走上同一條路，帶領同學往天安門廣場悼念。

六四後，吳仁華和王丹，再次踏上同一道路——逃

亡之路。

六月三日深夜，吳仁華正好擔任特別糾察隊隊長，坐在紀念碑最高一層，視野比較遠，六月四日凌晨四時三十分左右，軍人衝上來時，他就坐在紀念碑最高一層帶頭唱國際歌，學生三千多人，大家非常激動，凌晨四時，開始熄燈，軍人衝上來，整個天安門廣場一片漆黑。

「是整個清場行動最恐怖的時候，大家都知道就是最後的時刻來了，所以我就帶頭唱國際歌，三千多學生一起唱，唱得非常悲壯，我一輩子忘不了那個場面。」

軍人也有在廣場開槍，有打死打傷人

吳仁華的後面就是侯德健、劉曉波的絕食棚，凌晨四時三十分燈重新亮時，就看見軍人已經衝上來了，穿着迷彩服端着槍，後來他看了很多官方的資料才知道，其中有人揹着機槍。

「衝上來一邊開槍，當時有三個士兵對空鳴槍，打那兩組喇叭，打得非常準，幾下就把喇叭打掉，接着紀念碑南面學生指揮部所在地響起了槍聲，當時我還為柴玲他們擔心，後來知道他們只是把指揮部機器打掉，柴

玲已經撤到學生隊伍去了。」

六月四日凌晨五時二十分到三十分左右，師生開始從紀念碑底座東南角撤離，被軍人用棍棒槍托一直驅趕，吳仁華在紀念碑，腰也捱了槍托打，眾人都被打下來，打下來再坐上去，然後打下來又坐上去，來來回回幾次，最後終於都被打下來。

「從東南角走的時候我有看到一些離開學生隊伍，往中國歷史博物館方向跑的個別學生，是有被槍打中倒下去的。在這之前跟之後，軍人也有在廣場開槍，有打死打傷人，在這之前就有五個學生，其中三個是有時間和地點的，一個是中國人民大學東歐蘇聯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叫程仁興，他是六月四日凌晨兩點左右，在廣場北面，現在每天升旗的地方中槍的，腹部中了一槍，送北京醫院途中已經死亡，是最早一個為外界所知，在天安門廣場死亡，有名有姓的學生，湊巧他的班主任是我讀北大碩士研究生的好朋友，叫范琦勇，是讀歷史的，他還逐個醫院尋找自己學生的屍體，終於找到了。

「他跟我談，我勸他寫出來，可是在九十年代初寫出來是要付很大代價的，我說你可以用個筆名，可是他用真名寫了出來，發表在我的《新聞自由導報》，不愧是

學歷史的，非常有擔當。

「所以說在廣場沒有開過槍是謊言，也不僅僅是打喇叭或對空鳴槍，有打死打傷了一些學生。

「當然在我個人來講廣場內或廣場外殺人沒有區別，沒有必要爭論廣場有沒有死人。」

吳仁華指出，清場時間，也不是共產黨說的，八九六四的四時三十分到五時三十分中間的一個小時。實際上清場的時間，是六月四日凌晨一時半開始，到凌晨五時半，持續四個小時。因為戒嚴部隊從北從南各方向抵達廣場的時間，是六月四日凌晨一時半左右，就開始了清場行動，為了把外圍學生市民驅散，最後能包圍學生隊伍，事實上已開槍殺了人，包括他講的五個學生也是在那個時候被殺的。

我們後面稍晚的隊伍就給坦克壓了，當時死了十一個人

「然後學生撤離後，從天安門廣場東南角出來，沿着前門西大街往西走，從六部口拐上西長安街，和平的準備撤回學校，因為學校都在海淀區，我也在隊伍裏頭，靠着路邊走，因為長安街是中國最寬的一條大道，

大概有七、八十米，而且是雙行路，每個方向都分快車路、慢車路、自行車路跟行人路，當時我們是靠邊走，可是那三輛坦克，就是緊追學生隊伍壓過來，它不走快車路、慢車路，走自行車路壓過來，學生根本閃躲不及，因為自行車路跟行人路中間有一個鐵欄杆，大概有一米二高，而且頭是尖的，男生的話還可以翻過去，女生根本翻不過去，我很幸運的翻過去了，就躲到行人路上，躲過了一劫，可是那在我們後面稍晚的隊伍就給坦克壓了，當時死了十一個人。有五具遺體放在我們政法大學教師樓的前面，放在課桌上。

「六月四日上午十點左右，我一進校門，就看見學生屍體，就帶着學生跪地痛哭。

「六部口事件太殘酷了，坦克就是朝着學生隊伍來，有些是從背後追上來，學生根本沒有暴力的行為，而且沒有喊甚麼口號，是完全靠着路邊撤，打着旗子，完全有秩序的，大概有兩三千個學生，那三輛坦克，我們就記住它的編號，一路喊着，大家要記着。」

記：「幾號？」

吳：「我記得是一零六，現在我已經查清楚，這個部隊帶頭的還是個北京人，非常可惜，還一路扔毒性非

常強的軍用瓦斯彈，很多同學吸入就暈倒了，現場瀰漫着淡黃色的煙霧。我的一個同事，青年教師，就吸入了軍用瓦斯彈，要送到醫院急救。

「十一個死亡的學生，有一個女的，姓龔，十九歲，就是因為過量吸入了軍用瓦斯彈，肺部破爛死亡，唯一一個不是被坦克壓死的。當時坦克還一邊開槍，所以那個女生也中了一槍，但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瓦斯彈。」

其中一具屍體被車把從後面插進去，從前胸透出來，沒法分離

「其中一輛坦克還故意掉頭，把行人路跟自行車路中間的鐵欄杆擠倒，有些人就擠死在那裏，有兩個學生壓在行人路大量的自行車上，所以五具被抬到政法大學的遇難者屍體，其中一具被車把從後面插進去，從前胸透出來，沒法分離，連着自行車抬上車。我從來沒見過這樣血腥的場面，我是讀中國文獻學的，從最早的古書到清朝的古書，我都不知讀了多少，書上自古以來的血腥場面，沒有這次我自己親眼看到那樣震撼，我是非常憤怒的，就跟學生一路呼喊：『記住一零六坦克，記住一零六坦克！』」

王軍濤、陳子明，可能會判刑很重，甚至可能判死刑

事件後吳仁華並沒有被列入通緝，但最後決定逃出。

「我逃亡不是為了個人安危，那時我已躲過了六四的鋒頭，校長讓我把情況說清楚就可以了，後來是因為打聽到逮捕了大批人，一些不為外人所知的所謂黑手，包括王軍濤、陳子明，可能會判刑很重，甚至可能判死刑，更加危險，外界可能不知道，所以北京高校的朋友說必須有一個人到海外，把六四後大逮捕情況，告訴外界，把他們的資料寫出來，交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聲援這些更危險的所謂黑手。

「另外就是一定要把親眼目睹的屠殺場面，告訴外界，如果不告訴外界我就不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何況我還是一個學中國文獻學，受過專業訓練的學者，如果不把這些東西寫下來我良心不安。

「於是我就自告奮勇偷渡出去，我是溫州人，以往偷渡出去的人很多，我透過同學的關係找到偷渡集團，但當時形勢非常緊張，因為國內還在搜捕所謂動亂分子，懂廣東話的他們還願意帶，不懂講的多少錢都不願


為救軍濤我蹈海。

意帶，一查到的話蛇頭也會被判刑。費了很大工夫，最後透過一些富正義感、在廣州做生意的溫州商人，付了好高的擔保費，才勉強有人答應帶我出來，從溫州到福建、福建到廣東，拿着假邊防通行證件到珠海邊境區。

「九零年三月初，在一個三更半夜，刮風下雨的氣候，沒有救生器材，大概只得七度，我就跳下海，由珠海游去澳門，當時風雨交加，大浪滔天，我也覺得是九死一生，但怎麼樣我也得游過去，如果游不過去，那是天註定的，如果游得過去，我一定到海外告訴海外的人。幸運地我用了四個小時游了過去，差點就凍死了，最後是被人拖上岸。」

憑着腦子裏幾個朋友的電話，打了一個往美國的電

話，香港支聯會的人找到黃雀行動的人。他們派人到澳門核實身分後，黃雀行動的七哥就親自前往營救。

「我當時身上都是被蠔殼割的傷疤，因為當時太冷游不動了，近岸有一段是海泥，不快爬就會沉下去，沉下去就有貝殼和蠔，很鋒利，七哥看到我就掉眼淚了。我當時也掉眼淚了。他就安排一艘漁船把我送到香港，一上岸，六哥就接我去他們的地方。」

母親從來不在電話裏說想我

放棄了大陸大好的前程，但事業付出的代價，遠不及失去親人的代價，至今他仍對家人感內疚。

「我也對不起家人，包括我的母親，因為我母親早年守寡，很辛苦把我們五個孩子拉扯大，我算是其中一個最有出息的，讀最好的學校，當時就是政法大學研究室的主任，從北大要走了兩個人，一個是我，一個是陳小平，兩個都是破格使用的，如果不鬧事，八九年底就是副教授了。

「但最感內疚的是我母親，她也以我為傲，但我為了這兩個目的出逃，連招呼都沒有打，就突然消失了，後來還是公安局到我們家，她才知道。可是我母親很

好，這麼多年來，從來不在電話裏說想我，但我知道她內心跟我一樣，不説，因為一說的話，雙方都會有很大壓力，本身就很痛苦，一説就增加對方壓力，又見不了面，我母親脾氣很硬，我真很敬佩她。我寫這本書對歷史有交代，對母親有交代，我讀古書，所謂忠孝兩難全，所以我對母親説，你原諒我這個不孝子。她今年八十四了，也許這輩子我見不到她了，如果這輩子見不到我母親，我也死不瞑目。」説着説着，五十多歲的大男人就哭了。

我不後悔，只希望六四有個公正評價，特別是對那些死難者

剛到美國時吳仁華有兩個工作選擇，一個是《新聞自由導報》總編，工資很低，每月只有約八百元，在美國算是很低的了，一個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有個項目叫「中國檔案」，幾乎是為他度身訂造似的，因為中國大陸讀古文獻的人才很少，本科生一年沒收多少個，碩士的更少，哥大很歡迎他去，支票也寄到了，待遇很好，檔案做完了就可以上哥大唸書，等於是進入主流社會的大直路，但吳仁華選擇了《新聞自由導報》的工作，

希望在這平台報道國內獄中難友情況。

如果不站在吳仁華身處過的場景，也就無法明白，他為何作出一個如此異常的選擇。

「生活也很艱難，但是我不去想這些事情，這是我的選擇，有人問我後不後悔，當年跟你的青年教師，他們絕食請願我都是負責人，現在他們都已經是教授、博士生導師，一年賺幾百萬，我說我不後悔，我說只希望六四有個公正評價，特別是那些死難者。

「我書也寫了，八九天安門屠殺事件犧牲最重的不是學生，更不是知識界，而是北京的市民跟工人，我的確對北京的市民跟工人充滿了尊敬，他們不知名但作出的犧牲是最大最大的，人們都從很高的高度看八九民運，談民主自由人權，我倒是覺得從我傳統古文獻學者角度，八九民運留給中國人後世最大的精神財富，是當時北京市民捨生取義的精神，很多男女老少為了保護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冒着槍林彈雨，一批批的倒下，甚至有孕婦站在路中央去擋戒嚴部隊，為了一種理念，捨生取義。現在的中國人完全是為了利益，為了錢，物慾橫流，跟八九年北京市民精神狀況完全不一樣。」

香港人一定會流芳百世

由香港人協助逃出，九零年留港期間又參加過六四一周年集會，他對香港人也有很高的評價。

「在香港停留了三個月，等待去美國期間，有幸參加了六四一周年維園燭光悼念晚會，非常激動，民運歌曲、國際歌，我都是淚流滿面一字不漏的從頭唱到尾，我當時很年青，旁邊的香港人問我是不是北京學生，我只能說是。其他就不能多說了。

「我非常感動，香港的市民那麼支持北京的學運，之後還持續的召開那麼有規模的悼念大會。

「在香港三個月期間接觸了香港支聯會的一些人，包括華叔、長毛、朱耀明牧師，他和師母又介紹我認識了一批基督徒，他們一直為我禱告，可能剛經歷過六四屠殺、清場、六部口坦克事件，心情比較沉重，心裏脆弱，當時感到特別特別溫暖，經常很多時基督徒聚會為我禱告，我都控制不住要掉眼淚。所以這麼多年來我一直說，香港市民太了不起了，回歸以後還能每年堅持那麼盛大的燭光悼念晚會，非常非常大的歷史紀錄，一定會流芳百世的。」

我越來越悲觀了

對海外民運，吳仁華認為只能扮演支援角色，他希望中國政治體制轉型，能在越少動盪的情況下越好。因為中國歷史上每次動盪，付代價最大的都是老百姓，但他越來越悲觀了。

「這不全取決於反對派或我們所講的民運人士，同時要取決於執政當局，他們越來越不理性，不分青紅皂白，封殺所有民間力量，不管是激進、溫和、理性，一律封殺，社會人士只能像楊佳事件，殺公安渲泄不滿，當所有道路被堵塞，矛盾爆發，就會有很大的動盪。」

以劉曉波發起的《零八憲章》為例，在劉曉波被捕後，簽名並沒有停頓，數以千計的人登入網頁，留下姓名、地址表態。

「《零八憲章》的意義在於，首批簽名三百零三人當中，階層廣泛，大學講師、劇作家、律師、草根的拆遷戶、上訪人士都有。」

到零九年初，簽名的人數已增至逾八千。

「有這麼多人願以真實姓名簽名，表明他們突破了恐懼，專制政權就遇到很大壓力。因為『八九』令人留下的恐懼，的確很大。如果共產黨還不放棄對待民間力量的手法，我只能感到悲觀。」

程　　　　真



論文寫得再好也改變不了社會。」只差幾個月就從北師大中文系畢業的程真，決定投身民運。

「我姓程，民主進程的程，真，新聞要說真話的真。」總理李鵬聽了，氣得黑臉就走。

八九年五月十八日，李鵬和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談判，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首次電視播出總理和學生對話，全球華人目睹了，學運領袖吾爾開希穿着條子睡衣，倦眼惺忪和李鵬對話片段，李鵬先來了段很長的家長式訓示，跟着說：「共產黨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是我今天不說。」

雙方的對話都很強硬，李鵬還說：「如果發生甚麼事，責任在你們這些領袖身上。」後來說話還是被吾爾開希打斷了，李鵬十分氣憤。見面不歡而散。

離開時學運領袖王丹跟程真開玩笑：「一切的錯是由你這番話引起的。」

半個月後，只差一個月就畢業的程真，倉惶逃離北京，輾轉坐漁船經香港到美國。自此廿年沒回過祖國，弟死不得見。

程真離開前是北師大中文系五年級學生，是發起廣場絕食的八名學生之一，絕食宣言也由她來公開宣讀。

程真本來有志當記者、編輯，抵美後英文隻字不懂，白天打工，晚上讀書，入大學再讀會計。

到今天，她已由當年代表學生和總理「講數」的學運領袖，變身為美資銀行代表，向商業按揭客戶「追數」的女強人。

八九年第一次見她，程真是廣場知名漂亮學運領袖。還記得我們一大班記者，在不同地點勞累採訪一天後，聚在一起晚飯，程真來了參加，她話不多，有點黑，有點瘦，而且表現得極累，參與民運採訪較久的謝志峰說：「他們都太累了，不想多談。」反正飯局一場，我就沒有再打擾。

一別十年，九九年再見程真時她已落腳美國洛杉磯定居。一場民運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還讓她成為了港人家嫂，參加教會廣東話聚會，在電話交談根本沒法聽得出，她原來是東北遼寧姑娘。今次見她，程真告訴我，十年來她剛好享受了美國經濟興盛的成果，事業有了很好的發展，當然，一場金融海嘯，讓她成為了繁忙「追數人」。

女兒九歲了，遺傳了父親的「圓」，和媽媽的美貌。

「看照片，就知道我們有多『圓滿』了。」程真笑說。

政治結構不改革的話，那麼中國像我們這些學文的人，終究是好像在一個籠子裏面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早上七時五十三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醫院病逝。

程真正忙於準備畢業論文，七月份就應該畢業，很快要走向社會了。

「那時我讀中文系，我想讀文科的人，當時的社會環境當中，我們看到這個國家是有希望的，因為從改革開放，政治上開始開了一道縫，門開了一部分之後讓我們看到一線光，所以對外面世界充滿期待，對國家更是覺得有希望，但是我自己又馬上要畢業了，看到經濟改革初步有成效，但是政治改革還完全未打開，想到自己畢業，要走入社會，免不了為自己的前途擔憂，如果政治形態、意識形態、政治結構不改革的話，那麼中國像我們這些學文的人，終究是好像在一個籠子裏面，思想跟言論都沒有自由的權利。」

最早當師大有些學生要往悼念胡耀邦，跟警察發生衝突時，程真並沒有參加，但過了幾天，她目睹一些住在同一宿舍的學弟學妹，回來之後都受了傷。

「發現他們被警察用皮帶、用皮鞋毆打。有一些學生自發在新華門前請願，當時我有聽說王丹、吾爾開希這樣的人的名字。也有一些低年級的同學，同屆的學生也不一定，他們也有自發的去紀念胡耀邦，也有提出一些口號，當時就跟在新華門前的武警有衝突，那麼衝突呢，新聞報道出來當然是學生衝擊警察，完全是一面倒的，事實上我看到學弟學妹回到學校嘴被打腫了，鞋子都不見了，有些女生甚至被警察用車拉到很遠的地方然後自己走回來。我覺得新聞的報道跟事實我所看到的有很大距離，說明中國媒體、新聞業跟有自由差太遠了，我學中文的會想到如果我今天畢業了，走入社會，很可能會成為一個記者或編輯人員，那我的前途在哪裏？我不能說我要說的話，我只能做這個黨、國家的喉舌，我覺得心裏有種悲哀，那個時候開始決定要參加學生的遊行隊伍。」

雖然畢業在即，但程真心想，花再大的心力，寫再好的論文，也無法改變社會，實在沒有意思。

「希望在這個時候，雖然要畢業了，希望在此之前如果能改變這個社會、這個國家一點點的話，就參與進去了。」

剛開始時和北師大很多學生走在一起，當時中文系高年級的同學，要做一些橫幅，要寫口號，中文系的學生被認為是力量型寫手，所以包括程真在內的中文系幾個女生寫了之後，就拉住橫幅走在最前。

參加了幾次遊行之後就認識了學校高自聯的同學吾爾開希、梁二，相知相熟，過沒多久就參與了北師大高自聯日常活動。

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指學潮是「有計劃的陰謀、動亂」，學運自此進入了和政府十分對立的局面。

五月十三日，數千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要求肯定學生運動，否定四二六社論。

殺人是crime，是罪行

作為絕食八個發起學生之一，程真已不是第一次被問及，絕食行動是否過激，不懂妥協，導致流血收場。

「我覺得如果單從技術層面去反省八九學運的話，有很多東西可以討論，可以去講，但是無論在技術層面上、策略上我們怎去反省，我覺得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說，你在罪惡面前不應該有妥協的，如果學生在

過程當中，在策略上在技術上有失誤的話我當然承認，有些地方應該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做成這個屠殺是一個罪惡，這兩個不能相提並論的，殺人是crime，是罪行，學生犯的是技術上失誤，mistake，這個完全不能相提並論，所以首先要把這兩個分開。然後我們再來講，說學生在哪個方面有沒有妥協，或者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學生有沒有可能在『八九』做得更好？當然歷史沒有if，沒有如果，但是我們假設，還是，當然有機會做得更好的，但我認為在當時來說，學生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沒有預謀，沒有之前的組織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整個八九民運從四月中到最後被鎮壓，井井有條，在此期間除了政府的暴力鎮壓之外，老百姓跟學生中間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我覺得這已經是很偉大的，有這麼多人參與在裏面。」

她說剛開始學生就想到，如果運動要能比較理性和平進行下去，一定要把學生的要求，純潔性，用文字清清楚楚的表達出來。

此外，遊行時的行為、遊行時怎麼樣跟不是學生的人清楚分開，學生都想過了，馬上就有了糾察隊觀念，學生遊行時是井井有條的。

「學生隊伍跟遊行羣眾，有的時候我甚至覺得有點太着重於純潔化，把老百姓排除於遊行隊伍之外，但這個你可見當時學生想得還是蠻周到的。」


五一三絕食開始，程真疲態畢現。

終究是在社會主義環境長大的青年，顧及到組織的合理性跟合法性，學生很快就在各大學辦投票選舉。

「因為官方的學生組織是欽點的，一般是沒有選舉的，那麼既然我們要求政府在政治上要更開放、更民主、更自由，那學生自己本身的合法性在哪裏？馬上就想到了這一點，所以在師範大學還有很多其他大學，就很快用投票選舉的方法，選出了各個大學的高自聯，最後再由各大學的高自聯，選出他們當中的代表人物，成立了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在一個完全沒有民主，在這種政治文化背景中學生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想到這點，我覺得這也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再談關於學生妥協的問題，程真認為當時其實學生一步步也在讓步，最初要求跟政府對話，政府最初只跟學生的官方代表對話，遭學生拒絕，認為他們沒有合法

性，學生要求政府跟新成立的高自聯學生代表對話，官方又不承認高自聯，學生第一個妥協是成立對話團，它既不是一個正式官方組織，也不是像高自聯，被官方標籤為反政府的，對話團是各大學出來的聯絡人，就是中間人一樣，代表學生跟政府對話。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讓步。」

可是這個對話團畢竟還是學生選出來的，也不是官方欽定的，最後對話團始終沒能跟政府對上話。

學生對於被《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深感憤怒，認為對話要求被推遲，官方對學生表現冷漠，對話團又派不上用場，五月十三日，終於成立了絕食團，用自我犧牲的方式，跟政府權威挑戰。

「我覺得是妥協之後得不到回應的一個做法，一個合理做法，而且這個合理做法不是跟政府用武器、用利劍，而是用自我犧牲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國家前途的關心。所以我覺得有些人認為絕食是把政府迫到絕路上，實在是沒有辦法說得通，絕食真的是學生把血和淚、生命都擺上了，表示我們要效忠中國的前途和未來，如果這樣都要被政府來懲罰，而且說把政府推到絕路，實在是講不通。」不過回看廿年前的行動，程真也

同意，處理上有可商榷之處。

「譬如說政府已戒嚴了，你絕食也好，你提出的要求，哪怕要把自己的生命獻上，政府也漠不關心，你看到是個不理性政府的時候，我們那個時候的決策可以改變了，其實可說服帶領學生跟我們一起不再絕食、不再用佔據抗爭的方式，有所調整。」

讓她有了新看法，是因為來了美國之後，看過幾個和平抗爭典範。一個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和美國哲學家、文學家Henry Thoreau的例子。

「他說和平非暴力抗爭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所抗爭的對象，這個政府是一個理性的、可以說理的政府。他當時一個很典型例子，就是為表示和平非暴力抗爭，他就不交他一塊錢的稅，表示抗爭，但是他抗爭的是一個理性可以說理的政府，包括當時的印度，甘地面對的英國政府雖然是殖民地國家，但當時英國政府還是可以說理的。但是中國政府在八九年，六四發生之前，已經是一個不理性、不能正常對話的政府了，所以那個時候如果我們策略上稍為有點改變的話，我想犧牲的人也許沒那麼多。如果技術上要甚麼改變的話，那個時候可能有這樣一個機會。」

當時說甚至坦克車、機關槍都可能進場

十年前訪問程真，她就透露過，其實戒嚴後，鄧小平兒子鄧樸方，曾派人去說服學生早撤，因為軍方的確會動手，但現在看來，這個說客，倒真沒把話說清楚。

「他把我們幾個人包括吾爾開希、梁二、馬少方還有我自己，送到殘疾人協會，反正是戒嚴之後，具體日期我都忘了（按：經查證後是五月廿二日），我們也是滿懷希望去的，希望溝通，但去到之後並不是鄧小平的兒子跟我們見面，而是他辦公室下面的人，而且說話也是非常隱晦，我們並沒有從他那邊得到這樣的消息，只是言語之間透露出來，如果學生不撤，就會所謂大兵壓境。」

記：「他是準確用上這四個字嗎？」

程：「他倒沒有，他沒有這樣講。」

記：「你們感受到？」

程：「對，當時說甚至坦克車、機關槍都可能進場。」

記：「他有準確地這樣講？」

程：「對，他越是這樣講我們越覺得他嚇唬人而已，因為我們當時的確是太單純，沒有想到政府能用人民解放軍來對付自己的人民，而且當時我們學生做了最

壞最壞的打算，相信很多學生領袖，我不敢說每一個人，很多學生領袖都是說，他們要對付的是學生領袖，最多是談判不成功或秋後算帳的話，也是抓學生領袖。所以很多學生領袖包括我自己，已做好之後被他們懲罰的準備，但是完全沒有想到他們會用武裝力量，來大面積對付抗爭的學生跟市民。」

記：「你們談了多久呢？」

程：「不久，我們去到發現談的對象不是他們所說的，鄧小平的兒子，我們已經覺得被騙，之後再加上他講的話，我們覺得有點誇張，認為他只是要嚇唬嚇唬我們。但是雖然他講得很誇張，嚇唬我們讓我們把學生帶走，我們還是謹慎去處理這件事，本來去的是五個人，後來又分成我跟馬少方，去國務院辦公室，去另外一個政府機構希望可證實，吾爾開希、梁二，回到廣場。我們當時還是認真去處理，萬一是真怎麼辦？所以吾爾開希回到廣場之後，就把這件事告訴廣場的學生，還是希望說如果能撤，我們就不要做這個無辜的犧牲，我跟馬少方就去證實這件事情，但是辦公室的人員完全不能證實有還是沒有這件事情，是真還是假。等我們有機會打電話到廣場時，廣場已經是一團亂了，因為吾爾開希把

這消息講出來之後，他當時呼籲學生撤出廣場，撤到使館區，但當場被學生轟下去了。我們分開時是說，等我們證實了消息才做決定，但是他可能回去之後覺得很嚴重很焦急，就把這些事情說出來，我們聯絡到廣場時都已經不知吾爾開希在哪裏了。」

當天傍晚的時候，已經感覺到鎮壓已經是 anytime

六月三日晚，北京城已像一大鍋沸騰的水，誰經過都必遭濺傷，電視一直警告人不要往廣場，那晚程真在哪兒？

「我在廣場，到了六月三日白天，我們認為鎮壓，而且用軍警鎮壓的可能性越來越高了，因為如果大家記得的話，無論是直升機拋下來的傳單，還是便衣警察都忽然增多，軍人忽然增多，都引向一個事實——離鎮壓不遠了。反而在那個時候我自己決定要留下來了。本來在此之前我們還希望呼籲學生撤，可是到後來，很多人不願意撤的時候，我認為我不可以第一個先走掉，如果有人沒有撤，那我就應該留下來，跟他們在一起，跟最後撤出的同學一起走。

「我記得當天傍晚的時候，已經感覺到鎮壓已經是anytime，隨時可能發生，中共還放出消息描黑一些人，像吾爾開希，如何如何大吃大喝。」

她就拿着準備出國進修剩下的幾十元打點費，請一位學弟吃飯。

「他之前是肺部有事要住院的，聽說絕食還偷偷的跑到廣場絕食去了，幾次暈倒，我一直陪着他。那天晚上我就帶着他，說：『我們去吃最後一頓飯吧！』」

當時廣場附近飯店不多，能去的就只有北京飯店，飯店師傅知道他們是絕食學生，居然不收錢。

「吃到一半開始聽到槍聲。我們草草把東西放下就趕緊往外衝，跑去廣場，怕發生甚麼事，同學在廣場，我們在飯店就很內疚。」

到廣場已見到很多便衣警察，手拿三角鐵，本來是要衝進廣場對付學生，但被老百姓圍住進不去了。

程真趕緊回到廣場師大絕食的地方，遇到香港學聯赴京聲援的同學李蘭菊，還有其他幾位同學。沒多久就發現革命歷史博物館那邊突然多了很多軍人。

「我們幾個學生一起手拉手的，在革命歷史博物館前坐下來，對面就是一大堆人，幾百幾百這樣的軍人，

一邊喊口號，好像佔領了陣地這樣子，在歡呼。我們幾十個學生，手拉着手，不知他們甚麼時候會衝到廣場，如果衝的話，我們坐在這裏，他們應該不會從我們身上踩過去吧，當時還是有些比較幼稚的想法。」

「就在對峙情況下，有一個小高中男生，從外面衝進來，想要跟軍人拼命，他說我有一個雙胞胎的哥哥，在復興門那邊，在軍人開進京城時被軍人打死了，他要找這邊的軍人報仇，他要衝過去，被李蘭菊拉住了抱住了，沒有跟他們打起來。李蘭菊還跪在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前面，說求求你放過這些孩子，當然那個人也沒有甚麼反應。」

到了晚上將近一時，坦克車跟軍人已經從六部口那邊壓過來。

程真和香港學聯的同學馬上趕往六部口，呼籲市民不要去擋。到了六部口，軍人還未有到，但已經有很多老百姓和學生把欄杆、磚頭、垃圾筒擋在中間。

「我記得當時學聯一位同學國語講得非常不好，我是一半靠聽一半靠猜的，他非常氣憤，非常焦急說：『你們以為那些路障能攔住坦克嗎？那是很愚蠢的行為。』可是大家都在盡力，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想

起來就像小孩子在大人面前做的一些以為很了不起的事，我們盡了力希望能減少傷亡。」

跟學聯同學再次回到天安門廣場，回到共和國的旗杆下面時，坦克車已經到了。

他的下半身背部，一個大大的洞一直往外流血

「軍人都已端着槍走到天安門大街，我就看到一個學生，郭海峰，開巴士要擋住軍人，沒多久那邊就開始起火了。當時軍人已是，誰擋住他們就開槍，在我前面不遠的地方就有一個，我想他是糾察隊的，因為他頭上縛着布條很像，我看見他在地上拿起一個瓶子，他見軍人見人就殺，拿起一個瓶子就想扔過去，他自己的手還在上面時，就突然倒到地上，我離他很近，就十來米的地方，聽到槍響就看到他突然倒在地上，我們想他不知哪裏中槍，就跑過去把他抬起來，我抬他的頭，其他人抬他的腳，往廣場中心走，一邊走，我的身上、腿上、我的腳，就好像一直有血飄過來，我說不對不對，看他前面沒有血，趕緊叫停，大家停了之後把他身體翻過來，看到他的下半身背部，一個大大的洞一直往外流

血，他的背部，聽說子彈穿過就爆炸那種，所以後面比較大，前面沒有那麼大，好像馬上就有救護人員過來了，幫他包紮，堵住傷口，一轉過來，眼睛都已經翻白了，醫護人員就把他抬走。」

程真坐在那裏整個人傻了，完全不懂得反應，後來還是學聯的同學把她拖了一把，跟學生一起集中到紀念碑下面。

「這個學生一直在我逃亡，來到美國之後都不能把他忘記，我們簡單為他包紮後，醫護人員把他抬走，他是生是死，我不知道。後來我看到丁子霖女士編的六四死者名單裏面，就有一個人死在旗杆下，死亡的情況，遭遇的情況，和我看到那個年青人一模一樣，那我想他是已經死掉，而且很巧合的，他也姓程，當時是政法大學的研究生，一個父母用這麼多的心血、國家用這麼多的心血培養的人才，就這樣一聲不響的死掉！後來很多人說，很多學生領袖，他們自己先走了，如何的，我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人，但是我可以證明馬少方在廣場，梁二在廣場，柴玲在廣場，封從德在廣場，李祿在廣場，這些都是我看到的。還有學聯的幾位學生都在廣場，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方。」

老百姓的政治參與能力不是低，是沒有

離開祖國二十年，人回不去了，但父母都在東北，程真仍關心祖國，常靠網絡回家。

「我剛在網上看到《光明日報》一篇文章，講基層幹部對集體性事件的預防和處置，甚麼叫集體性事件？大家已經把國內一些民眾的反抗，淡化到集體性事件一個名詞。不是最近了，過去這些年當中，國內常有無論是民工也好，很多有羣眾參加的抗爭活動，有的是為了生存，有的是為了拆遷，有的是為了土地被霸佔等等，有的是為應有權利被剝奪，常會發生羣眾與官員或政府部門人員暴力衝突。」

這些暴力事件，包括雲南老百姓衝擊大樓，也有港人熟悉，殺死五名上海公安遭判死刑的楊佳。

「文章講那麼多集體性事件有五個原因，除了一個之外，方向全部錯的。

「第一、社會轉型引發的矛盾，是引發集體性事件的基礎根源，社會變遷引發的矛盾。第二、部分基層幹部作風不民主，甚至粗暴，是集體性事件的政治因素。第三、羣體政治意識加強，但政治參與能力相對較低，法治觀念淡薄，是集體性事件發生的文化因素。第四、

基層組織社會控制弱化，社會權威結構失衡，是集體性事件發生的體制性根源。第五、各種具體的利益衝突，是引發集體性事件的導火線。

「五個原因他倒是認真去找啦，但除了第五個是沒有對錯之外，講他的第一吧，講社會轉型引發的矛盾，是一個很泛泛的講法。第二，基層幹部作風不民主，不是說他不民主是錯的，而是他把這個歸類為集體性事件的原因是錯的，因為從一個民主國家來看，我們在美國生活了這麼長的時間有很具體體會，基層幹部最不需要民主的，他需要的是法規、規則，每一項明明白白寫在那邊，他只要照着做就不會有問題的，民主是應該在高層，上面一層層的選舉下來，是幹部形成過程中需要民主，但是他一旦選上之後，他就要按法律條文、國家制定的政策，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真正產生的原因不是基層幹部不民主，而是他產生的過程不民主。

「第三，羣體民主意識增強，但政治參與能力相對低，又是一個很荒謬的說法，前半部分沒講錯，老百姓民主的確在增強，但他的政治參與能力不是低，是沒有，根本沒有機會讓他參與，不斷壓制，沒有機會的時候他才會發生衝突。第四，基層組織控制弱化，權威結

構失衡，說明共產黨到現在為止，還是要靠權威、靠控制，來使國家穩定，本身也是一個錯誤。

「從八九年學生提出來，民主改革、政治改革，到現在國家的領導階層，共產黨本身，到現在還沒有進步，從《光明日報》尋找的幾點原因看來，它根本沒有進步。」

程真認為，老百姓的意識的確有開放，越來越多有法治觀念，但政府反而沒有法治觀念，沒有民主意識，官員在形成過程中不是民主產生，這才是矛盾的關鍵所在。

老百姓法治觀念在增強，民主意識在增強

「『八九』對中國的貢獻是對民眾意識的喚醒，從此之後老百姓一天一天在進步，你看到在八九年時，沒有多少人如要反映意見，或者是對政府不滿時，把一本法律的冊子拿出來，但今天老百姓要上訪，要對政府反映意見，第一件事，就是把中國自己的法律搬出來，哪怕這個法是不完整的，哪怕明知政府也沒有完整的執法，他們是依法來抗爭的，好像現在這些維權運動，也是通過法律解決問題。老百姓法治觀念在增強，民主意識在增

強，只有中國政府自己，官員沒有增強。」

她認為「八九」民運對中國的貢獻實在太大了，二十年一點一點在進步，今天中國老百姓知道要通過法律、要通過自己選舉出來的人，才是值得信任的，這樣的一個進步過程。

要珍惜自己的道德力量

「我最高興是看到這點。還有國內現在興起這個維權運動，為甚麼我覺得『八九』，包括絕食，能夠喚醒呼召那麼多的人來，為中國將來一起吶喊，其實它最大的力量在於它的道德力量，大家都看到中國將來是有希望的。今天國內維權運動的人士，我所盼望的就是我們除了對民主意識要增強，對法治的觀念要增強之外，千萬不能忽視道德的力量，哪怕在今天美國的金融風波裏面，其實最大的錯，都是在於道德淪喪，如果沒有道德力量，其他的技術，民主、法律意識再強，對民眾吶喊還是不夠。維權除了開始學西方對法治和權利的重視外，公認的合法途徑來做之外，更重要一點，維權人士裏邊，為民眾出來說話的人，要珍惜自己的道德力量，要知道有這種為民眾擺上的精神。技術的力量是很有限

的，當共產黨不跟你談時，你用甚麼方法它都不跟你談。」

就像《零八憲章》的起草人劉曉波，是程真的老師，被拘捕了。

「看過憲章的人都知道，裏面所提倡的、所呼籲的都是現在社會上、跟國際上公認的一些合理的理念，但劉曉波還是可以被抓，但是劉曉波先生也好，鮑彤先生也好，一起簽名起草的人也好，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不單單是他們表現出來的理念有多麼的合情合理，而是他們自己願意擺上這樣的精神，我覺得這個是中國將來走向民主法治憲政的最大力量，能夠付出，能夠獻身這樣一個力量。」

八九民運期間，看過電視、報紙的市民，大概都會有印象，當時學生很多都很髒。

「但是你看到那些人的眼睛裏有光，光就是對將來的希望，自己強烈願意付出的精神，在他們臉上看得到，今天如果再回到中國大陸，我自己二十年沒回過中國大陸，但是我在網上常常回家，常常看見國內的新聞之類，他們在物質上豐富了很多，無論是大學、高中生，衣着跟港台沒有甚麼分別，也包括他們的眼神也沒

有太大的區別了，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你在這些孩子的臉上看不出來了。可是『八九』，你去看看圖片裏那些學生，從臉上你看到他們的精神面貌是怎樣的。

「當然我不是一竹篙打整船人，國內還是有很多年青人在繼續『八九』精神，甚至還在超越，我真的盼望後繼有人，繼續這樣一個事業，中國一天沒有民主，一天繼續有這樣的人在，為此爭取。」

程真的逃亡過程，十年前聽過已覺得很精彩，可以拍一套電影，還是讓她自己說吧。

第一輛來的火車，它去哪兒，我們就去哪兒

「六月四日凌晨我從廣場回到學校，那時有很多傳言，其中一個就是大學很快會被軍管，像我這種跟李鵬總理對過話，上過電視，而且是代表絕食團的，如果要軍管的話，可能第一個就是要清理我們這樣的人。有些同學就勸我趕緊離開學校，說實話我離開學校能去哪裏？還真不知道。絕食時認識一個同學，他是家住北京的，還有當時學聯的同學當時還未回香港，我就跟學聯同學在王府飯店告別，住北京的同學就把我帶到家裏，因為他父母在，大人比較有主意，幫我想想到底可以去

哪裏，可是事實上所有的新聞所有的說法都不可信，都是靠傳言，新聞播的就更不能相信了，因為共產黨的新聞你把它反過來就差不多了。但是知道火車站不能去，因為一定有嚴管的，學校也不能呆了，那怎樣出京城呢？同學的父母就建議我們不如各人踩單車，到了郊外之後，再想辦法上火車，我回家也好，去哪裏也好，可是出到郊外能遇到怎樣的火車還真不知道。

「當時就想只要離開了北京，再想辦法。當時就跟同學踩着單車上路，到了郊外小火車站，我連這個小火車站的名字都不記得了。總之等着說，第一輛來的火車，它去哪兒，我們就去哪兒，結果真的有火車來，我們上到去才知道，它是去山西大同的，好吧，那就去吧，但是我們也記得來北京鎮壓的軍隊就是從山西調來的，哈，那不是虎穴嗎？可是沒辦法，已經上了火車，既來之則安之，就跟我同學坐着，一邊觀察周圍的人，一邊想到了山西大同該怎麼辦？坐在我對面有一個中年婦女，就是我現在的年紀，看着我說：『你是北師大的。』我說：『你怎知道？』她說：『你跟李鵬對過話，對不對？』我心裏真是跳了一下，我說：『你已經認出我來了。』她說：『是，不過沒關係，你跟我回我家。』原來

她是北師大一個低年級學生的媽媽，她因為在山西大同，聽說北京發生了暴亂，她兒子甚至還參與了暴亂，就非常的氣憤，說：『不行，我一定要把我兒子抓回家。』可是她一去到北京，親眼一看之後，她說：『這哪是暴亂，這是政府鎮壓學生的合理抗議。』結果她不但沒把兒子抓走，還參與了，至少非常支持兒子的抗議活動，可是鎮壓之後她不得不把兒子帶回家，覺得北京不安全。她看到我之後就問，你知不知你要去哪裏？我就說不知道，她說沒關係，你跟着我吧，但也怕出站時被檢查，她說，沒關係，你跟着我吧，原來那個媽媽在當地還是有點權威、權力的，所以可以在火車站的旁邊，繞過火車站的正門，就出去了，而且出去之後就有一輛小轎車在等着我們，是她先生駕來的，把我帶到她家裏。

「去到她家一看，原來她家不單只收留了我跟我同學，她在火車上一呼一嚕的，收留了將近二十個同學，都是北京出來不知道要去哪裏的孩子。她說其他的都很容易，只要出個火車票錢，讓他們回家就可以了，至於我，她還是問我：『你到底要去哪裏？』跟我一起出來的同學有親戚在南方，他說只要我們出了北京，去哪

裏都比較方便，我去投親戚好了，那位女士就幫我買火車票。」

他襯衣這裏下面有一把槍，原來他是便衣警察

「在火車上也有件很有趣的事，一次我們中午要吃飯，在餐車裏面，我跟我同學正在吃飯，同學跟我擠眼睛，叫我快點吃，吃完趕緊走，我說：『為甚麼？』他說：『你等下經過你旁邊，後面那個人時，你瞄一下他。』然後我真的趕緊吃完瞄了一下他，結果他對着我笑，他襯衣這裏下面有一把槍，原來他是便衣警察。我同學說他已看了我們很久了，只是我沒有注意到，可是他還向我笑，也沒做甚麼，我猜想他認出了我們，但是並沒有對我們做甚麼。我在想，那個時候，很多老百姓，甚至是政府部門的人，他們的心都是向着學生，迫不得已的話不會加害我們，這是另一件有驚無險的事。

「到了同學親戚的家，那天晚上正是公布通緝名單，他們當然不認識我，但是很好心，接待了我們，然後剛到家新聞就在播通緝名單，我知道那家人全部都是抿一下汗，他們很想幫我，但是如果我上了通緝名單，

就很難幫了。我們就從頭開始數，一個一個，到第二十個，二十一個，也沒有程真的名字，我發現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不知道為甚麼我並沒有在通緝名單上，我也非常慶幸，當然很不幸的是，在他們家沒住多少天，新聞就報道一個一個通緝名單上的同學，有的被抓，有的自首，真是有點為他們擔心，可是我就是沒有辦法忘記熊焱，他被抓戴上手扣，但是他挺着胸，一邊笑着衝着鏡頭走上被抓的車。我記得在我住的那家人裏，他們也在看那個新聞，一邊看一邊搖頭，說這個政府跟一個孩子比起來都不如，實在是……所以這家人一直就這樣幫我，我也沒有打算，其實是希望如果事件慢慢有變化的話，如果一個政府用機關槍用坦克對付老百姓的話，這個政府沒有理由存在，一定會有推翻這個政府的行為出現。可是這也是中國人的悲哀，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我就想，如果我住這裏，不知要住多久；第二，一直給這家人很大的精神心理壓力，有時一架簡單的救護車經過，大家就都很緊張，因為不知是來抓人的，還是光是一架救護車經過。

「有一次看新聞的時候，大家坐在這裏吃飯，電視機就在旁邊，然後剛好主人的同事來找，中國人都很客

氣，就請他坐下來吃飯，電視播的剛好就是我，在講一小撮人在鼓動暴亂，其中就有我在那裏指揮大家的鏡頭，女主人當時都傻了，她身子本來是側的，對着電視，就馬上轉過來，把身子擋住電視，說實話她同事有沒有看到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的存在給他們精神上很大的壓力，我就決定離開中國吧，但怎離開，我真的是沒有任何頭緒。我同學認識一個政法部門的人，他說可以幫我到廣州之後把我送出去，那就只能一試了，就跟這個人去了廣州，他來安排，當時我甚麼都沒有了，我只是憑記憶，記住學聯的一個同學電話，他就在打這個電話之後，跟當地出海的聯絡，把我送上走私船，其實我還不知是甚麼船，他只是告訴我到時上船，船上的人就會把我送到香港。」

我心裏非常的平安，我一點擔心都沒有

「其實船上的人把我吞了，把我扔到海上，也沒有人知道，可是那個時候我心裏非常平安，我從來沒有想到在這時候會有人加害於我，除了我的政府。包括那些走私的人，他們的心裏還有一些善良，沒有加害於我。就我一個人在茫茫大海，真是，他們把我怎麼樣都沒人

知道，因為這邊的人，跟香港的人，都不認識船上的人，他只是作一個中介，這邊人告訴他，你到了香港打電話，他們就會來接這個小姑娘，就這樣而已，他不打，永遠不會有人找到他們，但是他們還是幫助了我。當然當中也有香港的市民，當時有些捐獻，當中花了些錢救我們出去的，他們當然也有一些利益。

「後來我聽同伴說，從廣州到香港，如果坐快艇，可能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就能去到香港，但你知道我坐這個船坐了多久？十個小時。」

記：「為甚麼？」

程：「它沒有走內海，它是繞到公海，走了很大的一圈之後，從某一個角度來到了香港，我完全沒有意識。當然出到公海之前，還是在內海，還是怕有軍警，他們就把我安排到一個馬達旁，近引擎的上面，然後周圍是他們的貨，中間一個小天井我就睡在裏邊，如果貨掉下來我也會被砸到，但我在那個那麼響的馬達旁，這麼擁擠的地方，十個小時我想我睡了八個小時，心裏非常的平安，我一點擔心都沒有。」

記：「然後周圍是男人。」

程：「而且是走私犯。」

記：「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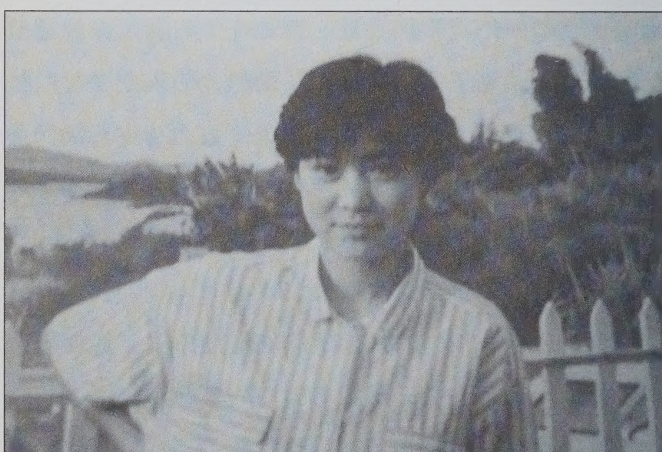
程：「倒沒有，他們臉上沒有寫着『我是賊』，哈哈，但是我知道他們是走私船。快到香港的時候，天亮五點多，他們把我叫醒，還讓我吃東西，坐在甲板上，說：『現在沒關係，現在是在公海。』哈，我都沒有這種概念，因為內地北方出生的人，沒有這個概念。然後他說：『沒關係，現在是可以在甲板吹吹風的時候。』吹了一陣子風，又讓我回到那裏，因為快到香港了。而且很amazing ，我是上船一分鐘就吐的人，我在這裏試過多少次，想要跟人出海釣魚，上船一分鐘就開始吐，直到上岸才停，可是那天我甚麼反應都沒有，很平安的十個小時走私船就把我帶到香港。我是晚上在廣州扮成是船上的人上船，到了香港也是假裝是船上的人上岸，然後跟學聯的人聯繫到的。」

我的所長向我propose，問我可以嫁給他不？

記：「然後就躲到安全的地方。」

程：「對，然後美國就給我庇護的身分。其實照顧我們的人，也不是預先組織好的，而是臨時為了救我們而形成的團體，也是義工，當時我並不知道，只知道有

一批好人要救我們，這些好人就把我們安排到一個家裏面，這個家沒有父母，只有一空房子，有一個是我們的所長，看守所的所長。我去的那天是個女士，她說她是臨時代工的，因為原來的所長要回家拿一些東西，第二天真正的所長才回來，我一看這個人怎麼圓嘟嘟的，看起來像個佛，好像很慈祥的樣子，後來每個新來的人他要interview一下，要知道一下我們的background，比較容易照顧我們，interview的時候並沒有甚麼的感覺，只是覺得這是一個好人。這個人就是我現在的先生，莫偉強，我不知道是不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對我有好感還是怎樣，就在香港居留期間，得到美國簽證前，幾個月的



藏身香港時照片，為免危險不讓外出，唯一娛樂是由「所長」帶上市場買菜，但條件是不讓講話，因為在「普通話人」並不多的年代，一開口就會暴露身分。

時間相處大家發現，很難得，他們這些香港人沒有任何利益可得，幫助這些窮學生、末路之人，真的對他們個人一點好處都沒有，但是他們願意放棄跟家人、親戚、朋友相處的時間，每天跟我們住在一起，然後又為我們的前途奔波，我是覺得這樣的人格很值得敬佩，也就是這樣，我們兩個，就在我要離開香港之前，我的所長向我propose，問我可以嫁給他不？我當時倒是太現實了，



我的所長向我求婚。

我雖然很尊重他這個人，也很愛慕這個人，可是我只認識了他四個月時間，如果我一個人去了美國，他一個人在香港，這四個月時間相處間的感情，以後能維持下去嗎，我現在答應他結婚他又不跟我走怎麼辦？所以我就跟他講：『我只有一個條件，就是你放棄你香港所有的一切，你跟我一起去美國，這樣我們這四個月的感情才可以繼續下去，有一個比較長遠的路可走。』沒想到我先生馬上就答應，後來就跟我一起來美國，當時在香港無論是朋友、社會關係等等都已經well established，很好的基礎都放棄了跟我一

起來到美國，是從零做起，這個零其實甚至不是零，是負數，因為我們沒有語言的基礎，如果我們懂英文的話，由零開始也比較容易，因為畢竟我們年青，只要肯努力都還好，可是語言這一關實在是太難了，尤其是剛來的時候非常辛苦，頭幾年當中，我非常感謝我先生，他放棄以前在香港建立的關係、connection、事業、朋友，跟我一起來美國渡過新移民的過程。」

記：「聽說他來之前連自己要去哪裏都不知道？」

程：「不只他，連我都不知道。」

記：「反正說你去哪裏我去哪裏？」

程：「對，當時在美國我們進關好像是在芝加哥。」

莫偉強：「不是，西雅圖。」

程：「對，sorry，西雅圖進關然後轉折來了洛杉磯，當時好像把我們轉到去鳳凰城還是聖地牙哥，可是來到這裏發現這裏的朋友實在很熱心，也很照顧我們，我們就決定留下來不再走了。我身上只有兩分錢，然後香港的朋友借了我一百塊錢美金，我記得一個星期之後我一分錢也沒有花，哈，不捨得花，所以是靠當地朋友的幫助，找一些慈善機構的空房子讓我們暫住那裏。」

「你是不是程真？」

我說：「是。」

她眼淚花花就流下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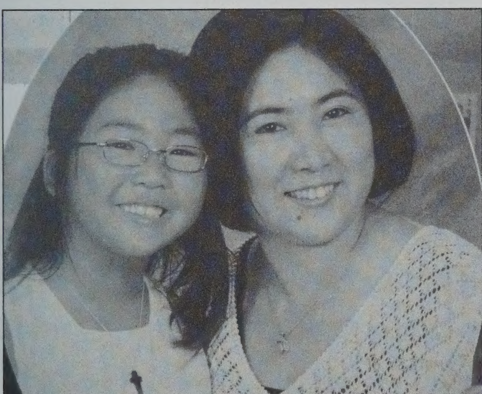
記：「然後上次你說一個教會的女士替你禱告。」

程：「兩個禮拜之後，羅省基督教會一些朋友，幫我們安排生活上一些事情，我們住在教會空房子，兩個禮拜之後剛好是那年的除夕，教會有個團契，恒輝團契請我們去參加，我對團契一點概念都沒有，但既是很多人的聚會我也想了解一下，跟我先生就一起去了。我去到，一打開門，有個女士就一直看着我，我坐下來她就坐在我旁邊，『八九』期間我沒有上很多電視，不是很多人知道我，來到洛杉磯也很低調，所以她一直看着我，我很奇怪，然後她問我：『你是不是程真？』我說：『是。』她眼淚花花就流下來了，她說她在半年前，就是六四之後，看到BBC的新聞，是學生跟李鵬對話的一個鏡頭，我記得絕食之後非常虛弱，跟李鵬對話時甚至睡着了，攝影師還給了我一個大特寫，甚麼自由女神很多人在我的衣服上寫了很多字，新聞就說我跟記者講，我決定要把屠殺的真相告訴全中國人。她看了之後就很為我擔心，因為當時，不要說像我這樣的學生，參與絕食、遊

行甚至跟李鵬對話，當時也是從我們大連來的一個人，他到北京旅遊看到屠殺之後回到家，跟記者講了看到甚麼，就已經被判十年徒刑。所以這個女士說，這個小女孩一定很危險，她說她作為一個基督徒，中國發生這個屠殺已令她非常絕望、傷心，她已經不知怎樣跟她的神禱告，她覺得如果我的上帝是公義的話，怎麼這樣的事在中國發生？可是她心裏還是放不下，就說她要為這女孩禱告，她也不知怎去禱告，就說：『神呀，我還是對祢有信心，神呀祢救她。』她說：『我只能簡單的說這一句。』每次閒下來，想起那個畫面，她就說神呀祢救她，直到那一年的年底，她說甚至她都不知那新的一年該如何開始，可是就在那一年的年底——我跟她見面了。她說這是上帝給我禱告最好的一個答覆，她說不單她的禱告祂有聆聽，而且把我帶到她的面前，明明白白的告訴她，你所禱告的那個人就在你的旁邊，這是我自己後來成為基督徒很大的一個轉捩點。因為自己之前對基督教沒有很大的了解，我甚至在逃亡過程，有偷聽所謂敵台，一聽到上帝是愛，我那個憤怒就起來了，因為跟我的經歷完全沒法擺在一起，就把它轉台。可是我經歷這件事情之後，我對基督教有了很大的改變，包括我

先生在幫我們的過程從來不講他是個基督徒，但我留意到，吃飯時我們幾個人一來就吃，他閉上眼一會才吃，然後他才告訴我他是基督徒，要先禱告才吃飯，我們不問他也不講，其實有很多這樣的人，我開始對這個宗教，跟他們宣稱的上帝有興趣了。後來我也成為基督徒了，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

記：「那六四這件事過了二十年，我今天來問，你現在有甚麼感受？」


看見我們的照片就知道我們有多「圓滿」。

程：「我在剛來的時候，有人問我，你是一個民運人士嗎？我會很自豪的講，是，我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已經不怎麼講了，到現在為止，就算有人問的話，我甚至也不講了，為甚麼有這麼大一個轉變呢？不是說我對那時做的事有甚麼後悔，或是覺得羞恥，我到現在為止還是認為作為八九學運一個參與者，我很自豪，也從來沒有後悔

過，可是在出來的學生中包括一些民運人士做的一些事情，讓我覺得，我們離了這個國家，物質越來越豐富，我們沒有了道德的力量，我們甚至因為讓自己的生活過得更好，其中一些人已經在界線以外，做的一些事我已經沒法認同了。我很自豪的説我到現在為止，從出來到現在為止，我一直靠自己的工作來養活我自己，雖然你也看到，一個很小的房子，沙發破了也沒有換，我寧可很簡樸的生活，但是靠自己的力量，如果我有經濟能力，幫助別人的話，無論是通過教會或是通過這類的團體，給六四的家屬一點心意，生活上或其他方面幫助他們，但是靠我自己的工作，這麼多年的努力，沒有伸手向任何人祈求過甚麼，這是我自己自豪的，但是我沒法苟同一些其他民運人士所做的。我現在是一個有職業的人，我關心中國的民主，我也希望中國能走上民主，我只能用這個説法來介紹我自己。」

我弟弟癌症去世，我都沒辦法在家陪伴我的父母

記：「其實那麼多年你不能回去見到爸媽會不會是件遺憾的事？」

程：「其實我爸媽能出來見到我，但遺憾的是，這麼多年沒有回去，家裏很多事，我的祖母、我的叔叔、弟弟都是在我離開中國之後一一去世的。我弟弟癌症去世，我都沒辦法在家陪伴我的父母，他們最難過的時候我都沒法在他們身邊，這是我最大最大的遺憾。有些人在我離開中國時沒想到是最後一面，可是現在他們都已經走了。

「我最自責的是在父母最困難的時候我連一句、一個安慰的姿勢都沒法做，就是因為我沒法回去。那時因為我父母知我沒法回國，沒有把我弟弟passed away這個消息告訴我，其實是他去世以後半年，我每次打電話都找不到我弟弟，都沒有辦法跟他談到話，我就問我媽媽，我媽媽忍不住哭了，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我先生去了幫朋友搬家，我就在租住的那個單位，那個廳走呀走呀，也不知走了多少個圈，我很怕停下來，不知該怎辦，後來累得攤了在沙發上，一直在哭，我先生回來看到也嚇着了。我一方面因弟弟的離去難過，一方面自責，還要讓父母承擔這樣痛苦的時候，我自己完全沒有辦法幫到他們。」

程真這類和親人傷別離的不愉快經歷，在其他多位

民運人士身上不斷出現，包括吳仁華、陳一諮、王軍濤、遠志明，還有今次沒有機會訪問的學運大姐王超華、當了牧師的張伯笠。有和父母分離，有和配偶分離，有和年幼子女分離，基本上是每個逃亡者的必然遭遇，也是每個逃亡者最不願觸及的傷痛。

由於行程緊湊，沒有多少個周末可用，訪問只能在程真下班，大家共進晚餐後進行，回家一坐下來就架好設備，開始苦拼，「所長」就幫忙哄女兒入睡、幫忙細心聆聽，提點太太遺忘細節、幫忙加熱茶。

傾談內容有血有淚也有笑。說到「我的所長向我propose，問我可以嫁給他不？」我們兩人都笑得人仰馬翻，忘記了其實大家在談中國歷史上，十分不好笑的一頁。

「你老公真好。」天地良心，這話可不是擦鞋的。

「噢，他實在是太wonderful了。」所長太太程真努力點頭認同。

家國大事沒找到出路，人生大事卻中了特大獎，倒真為她感到高興。

陳 達 鉦



「總之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右邊的是六哥陳達鉦，左邊的是由他救出的陳一諮，零八年底在洛杉磯合照。

「而家佢哋走咗咪仲好，佢哋喺國內，國際輿論日日媽你，而家出咗去就解決咗你哋嘅問題，實情你要多謝我至真。」陳達鉦說。

公安部高層聽了，只能苦笑。

八九年底，黃雀行動營救王軍濤、陳子明失手，兩名黃雀行動港方營救人員李龍慶、黎沛成，在湛江中了公安埋下的圈套被捕。雖然香港支持民運人士努力奔走，但半年仍無法取得任何結果，幕後執行人陳達鉦，被迫走到台前，九一年親赴北京，和公安部高層談判。

談判結果令兩個伙計半年後獲釋回港，但陳達鉦也要為黃雀行動劃上句號。

記者問：「你唔怕上去，連你都拉埋咩？」

陳達鉦：「……」

答案是，他們已有皇牌在手，陳達鉦明言，如果自己被捕，香港也得有人付上代價。

坐在他身旁的朋友更加很悠閒地透露，當時他們已掌握了溫哥華所有高幹子弟的位置：「如果海外有一個學生出事，我哋就……。」

再說下去，就真的很黑了，我聽了也嚇得只懂得說：「哦，咁咁咁……」

總之就是連串非常規、非一般手法，讓他們在八九六四後成功營救了一百三十三名民運人士。當中包括嚴家祺夫婦、陳一諮、蘇曉康、吾爾開希、王超華、李錄、程真、遠志明、吳仁華、項小吉、常勁……，幾乎所有能逃出來的，基本上都得他們相助。柴玲不是由他們救出，但送到香港傳媒手上的柴玲錄音帶，也是由黃雀行動安排兩名內地人士帶出，送帶人現在流亡法國。

「眨眼二十年，喺歷史長河裏頭，其實短到不得了。」陳達鉦感觸道。

記：「你覺得你喺歷史長河上有冇貢獻？」

陳：「冇，只不過歷史畀咗個機會我做咗少少嘢，而家有時睇到佢哋喺海外生活唔好，都唔知係幫咗佢哋，定係害咗佢哋，都唔知做得啱定唔啱。但我堅信兩樣嘢：第一、救人一定比殺人好。第二、六四總有平反的一天。」

可以調動的大飛有十隻

六十五歲的陳達鉦，江西人，家中兄弟眾多，排行第六，朋友都稱他六哥。

六哥自小在國內長大，江西中專唸輸變電畢業，中專學歷類似現在香港的高中，那個年代算是受過高等教育，同千萬中國人一樣，六哥文革期間捱鬥，廿八歲千辛萬苦偷渡來了香港。

初來時還曾經在黃大仙二座天台教過幾年地理和珠算。

「所以好多黑社會都係我學生。」

後來又曾替鍾士元和查家的工廠，做電科工程師。

八九時，四十五歲的電科工程師，已變身為一個生意人，「業務多元化」，他不諱言，業務範圍包括走私、骨場和麻雀館，各路朋友眾多。

「同兄弟一齊，可以調動嘅大飛有十隻，七千噸貨輪都有一隻。」

「佢借錢畀某某人，一借都借二千幾萬啦！」朋友在旁加了一句。

要將寶貴生命獻給人類最壯麗事業——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

但讓他一頭栽進最終導致四名伙計死亡的大規劃營救行動，更主要還是因為愛國基因發作，陳達鉦九歲戴紅領巾，十九歲入黨。

「共產主義的理想，刻骨銘心，根深蒂固，到今天都根本無辦法擺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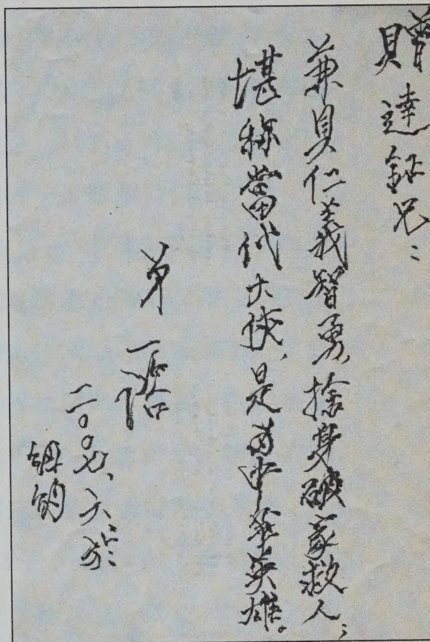
自小愛讀蘇聯文學，奧斯特洛夫斯基名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角説過的話，他隨時琅琅上口：「人的一生只有一次，不要庸庸碌碌無為渡過一生，要將寶貴生命獻給人類最壯麗事業——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

即使文革捱鬥，他仍堅信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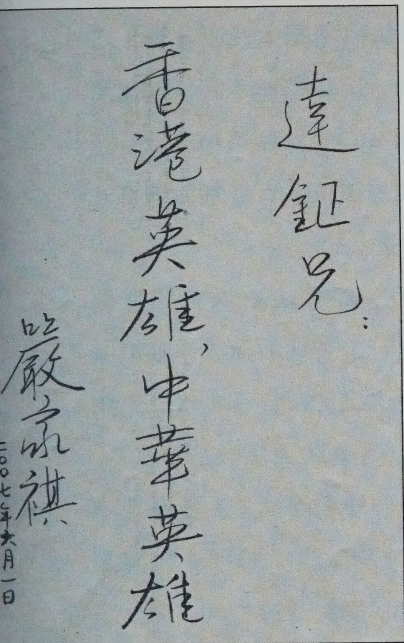
「近乎愚忠麻木，所以六四一開槍，我個心就碎咗，傷心到暈咗入院。出院第一件事，就係要果時七歲嘅仔剃頭悼念。

「我話，阿仔，爸爸要做生意出嚟見人，你要代老豆剃頭啦。」

所以當岑建勳找上門來，陳達鉦想也沒想就一口答應了。



贈達鉅兄：
兼具仁義智勇，捨身救人；
堪稱當代大俠，是中華英雄。
弟 一諮
二〇〇七、六、廿



達鉅兄：
香港英雄，中華英雄
嚴家祺
二〇〇七年六月一日

嚴家祺和陳一諮感謝題詞

「我當然義不容辭啦，最初都係諗住幫吓就算，之後就不可收拾，當你邁出第一步，就會好勇敢咁行第二、第三步。」

接下任務後陳達鉦一口氣寫下十七頁行動計劃書，全部引用毛澤東戰術。

「正確步驟來自正確決心，正確決心來自周密調查，和連續起來的思索，定出行之有效的辦法。戰術上重視敵人，戰略上蔑視敵人，永遠保持自己在暗，要救的人在明，保護自己。」

所以待救的人，有時在目標地點等候，會被要求手執一張報紙，有時要接得上一句暗語，過程一如間諜片。

他承認，過程中黨政軍都有人出手幫忙，部分人現在仍身處內地官場，幫的人並不一定為了錢。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六哥有一個雙胞胎弟弟七哥，長得和他一模一樣，六哥作為行動總策劃、總指揮，七哥就是行動組組長，包括前文所寫，政法大學講師吳仁華，就是由七哥親往澳門安排來港。

一次七哥協助七個學生出逃，由於汕頭風聲太緊，要臨時轉乘車到福州上船，七哥坐車頭，上車前囑咐學生，萬一遇事被捕，也有辦法，但千萬不能洩露七哥身分，否則就沒有人可以救他們了。

怎知在公路上果然遇到查車，一個軍人把車門打開，一看整車都是戴眼鏡、皮膚白淨的年青人，明顯是知識分子，七哥心想，「呢次玩完啦！」怎知軍人看了一眼就說：「哦，沒事了，走吧。」

「好多時啲人都係隻眼開，隻眼閉，大家唔認識，亦都唔在乎錢，基於良知放人。總之就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六哥感嘆道。

聽到六哥這段經歷，又令我想起程真在火車上，獲得配槍便衣，含笑放過一馬的故事，等於說，這種情況，當時在全國各地，在北在南，都有上演，也解釋了為何如此多人可以有驚無險逃出。

痛失四伙計

最令六哥痛心的是黃雀行動令他們失去了四名伙計，一次是大飛完成救人任務回航，濃霧中撞向水坭船，艇毀人亡；一次是快艇出海救人，遇中共軍方巡邏

艇，槍林彈雨中快艇高速行駛，馬達着火，兩名兄弟葬身大海，六哥付出了大筆撫恤金。

記：「你前前後後用咗幾多錢？」

六哥：「一千萬就冇，幾百萬一定有。」

上北京和公安部談判結果，讓他結束了黃雀行動，加上兒子開始長大，六哥為免影響下一代，就逐漸放棄了娛樂和走私生意，淡出江湖。

被斬昏迷七天

九六年十月三日一次厄運，更令他差點命喪通菜街。當晚他和朋友在一家海鮮酒家消夜，突然衝進一批手持開山刀及鐵棍大漢，追斬鄰桌食客，混亂中六哥被朋友拉着奪門逃生，怎知被守在門外的刀手誤認狂斬，左手和頭頂連中多刀，頭骨被劈開長達十五公分傷口，昏迷七天，出院後再往北京全國著名的康復研究中心治療一年，花了百多萬。至今六哥左手部分手指仍無法伸直，健康和經濟狀況都不如前。

事後斬人陣營知道出事，曾主動要求帶刀手親自請罪。

「我話我唔想見佢，你最好叫佢有咁遠走咁遠，如

果佢無錢我畀錢佢走遠啲。」六哥說來不慍不火，自認命中註定噩運一宗，追究無謂。

「但你而家身體都算幾好吖，可能必有後福呢！」我跟他開玩笑說。

「可能上天覺得我未捱夠，仲有排還，行咗咪一了百了囉。」

已退隱江湖的他，在油麻地的辦公室成為朋友聚腳地，文化人愛和他打交道，書架上放滿朋友送的中國政情書籍，心裏仍然記掛着祖國。談起毒奶粉事件，六哥講得比自己被斬還要「勞氣」。

「一個政權連自己嘅兒童都毒害，嗰啲人應該要槍斃。

「今年咁多個周年，會收緊，你睇《零八憲章》劉曉波俾人拉咗、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又喺人大工作報告話，唔搞三權分立，似係向極左妥協。」

我又想起他說過的一句話：「共產主義的理想，刻骨銘心，根深蒂固，到今天都根本無辦法擺脫。」

被朋友形容為千軍萬馬的辦公室，其實只有陳舊辦公桌兩大張，電話兩大個，但就具備為兄弟排解糾紛功能。不過六哥堅決否認自己是黑社會，只不過朋友眾多

而已。黃雀行動成功救出一百三十三人，包括廿一個通緝學生名單中的大部分人士，的確是中國歷史上一大奇事，有報道指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背後發功，六哥也否認有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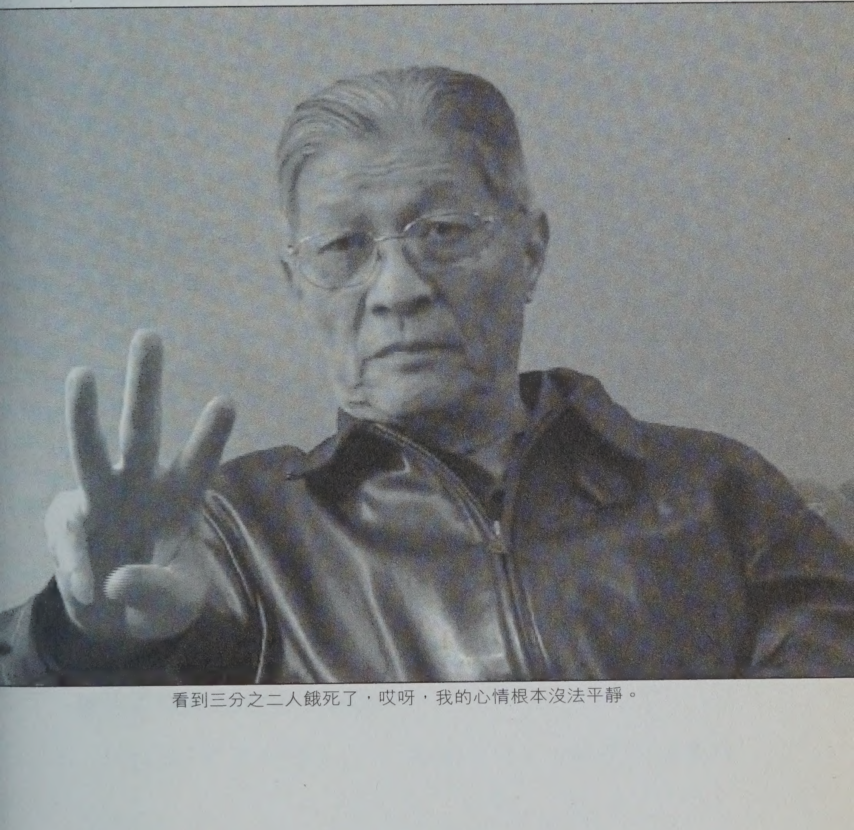
對廿年前往事，他不想多談：「我份人好心軟，永遠被動，朋友有事我點都幫到底，所以我而家好少交朋友，交個好嘅，多份牽掛，交個壞嘅，多份煩惱。總之係對歷史負責，對良心負責。」

每年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六哥都有參與。

「香港人有份情意結，隨時間過去，要等六四平反至能徹底解決。」

踏出六哥的辦公室，黃梅天濕悶環境下的旺角行人專區，熱鬧擠迫依然，有基督教團體在彈結他唱詩傳揚主愛、五步之遙有法輪功人士在請願尋求國際支持、有網絡銷售哥哥仔在截擊行人、有剛起牀的砵蘭街靚女擦身而過。香港就是一塊如此美麗多元的地方，也是這片土地孕育出了一位傳奇人物，二十年前他不顧一切，把瀕危的一批國內頂尖學者、學生救離險境，而他對我的唯一要求是：「唔好寫咁長，簡簡單單就好啦！」

陳 一 諮



看到三分之二人餓死了，哎呀，我的心情根本沒法平靜。

「鄧小平這個人在光榮的情況下可能讓步，在恥辱的情況下絕不妥協。搞不好這次又是個悲劇了！」

八九年四月十八日陳一諮已感不祥之兆，學運有可能悲劇收場。

陳一諮比新中國早九年出生，是六四後出逃最高級的中國官員。

他的祖父陳伯瀾曾協助康有為推行戊戌變法，結果要逃亡到廣東。父親陳之顓，九一八事件時在清華大學，率領學生到南京總統府絕食。陳一諮也繼承了家族以至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使命感。

五九年陳一諮考上北大物理系，六零年轉文學系，六五年，在北大唸四年級，文革烈焰一觸即發之際，他為保護同學，寫了一封題為「對黨和政府的若干意見」的三萬字長信給毛澤東，批評黨和國家生活不民主，結果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慘遭迫害，三次被打至差點命喪。憑家族世世行醫積累的中醫知識，把半死不活的身子調理過來，但已留下不能復修的損害，現時舉臂提筆、打電腦都有很大困難。

打成「反革命分子」，六九至七九，十年被下放農村

勞動，期間他對中國經濟、教育、農村問題做了大量調查。

七九年，胡耀邦把他調回北京，八零年陳一諮組織了「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吸引大批有志改革的知青，開始對農村改革研究，很快受到領導人如趙紫陽、胡耀邦、萬里的高度重視。

八四年，趙紫陽要求他組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並出任所長。

八六年，趙紫陽決定向政治改革攻關，成立「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討小組」。下設辦公室，負責人是鮑彤，秘書長是陳一諮。

就這樣，展開了趙紫陽、鮑彤兩位老人，下半生失去自由，陳一諮，最後要屈坐貨船五十三小時，經香港逃生的序幕。

「人生有很多選擇，或是因為良知、或是因為性格、或是因為情愛，我的一生有兩個重大選擇，一個是一九六五年我給毛澤東寫了三萬字的信，當了十五年反革命。第二次就是八九年，反對李鵬、鄧小平他們鎮壓學生，在海外流亡二十年。但是這兩個事情我都是心甘情願的。」

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就是往往因愛國犧牲自己

從小生活在中國傳統書香門第家庭，陳一諮族譜裏的始祖是陳摶，「太極圖」是他寫的，是道家一個學派很有名的創始人，宋代好多理學家都是陳摶的學生。歷代家裏從醫，篤信道教。

祖父陳伯瀾，跟梁啟超和康有為是好朋友，因為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後家被燒毀，要逃亡廣東，創立兩廣高等工業學校，于右任是他的學生。

父親陳之顓繼承愛國傳統，九一八時在清華大學，九一八事變發生，他帶着學生到南京總統府絕食抗議，絕食時間最長的三個人，父親就是其中之一。

陳家多少代都是書香門第，愛國，希望中國民富國強的知識分子。

陳一諮從小受教育的環境就是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家人的教育都是諸葛亮、岳飛、陳摶、孔子、儒佛道教化。父母又受很多西學影響，從小買很多西方名人傳記給他看，所以他又受了很多西方的影響。

「但是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就是往往因愛

國犧牲自己，中國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同思想理想，很容易跟共產主義，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自由的共產主義理想結合起來。」

因為自小成績優秀，文武全才，高中畢業，陳一諮就被校長動員入黨，成了北京市第一批入黨的中學生。

「那時真是覺得共產主義理想非常美好。」

考入北大之後的陳一諮，六四年以前紅得發紫，給毛澤東寫信後就黑得發臭，上書就當了反革命。

「當時中蘇關係破裂，我們就產生很多疑問，為甚麼列寧、史太林的黨變修了？中國解決甚麼問題才能不變修？中國解決沒解決這些問題？那時引起大家很多思索，特別遇到困難時期，很多從農村回來的人講農村死了很多人，大家吃不飽飯，各種各樣思想開始出來了。

「當時我們班裏有個福建人，他現時仍在廈門。當時他們組織了一個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認為要多強調馬克思的人道，不要搞那麼多鬥爭，認為中國搞計劃經濟不成熟，要搞市場經濟，我勸他不要搞，我說共產黨最怕別人搞組織，結果他們三個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團。我為他們辯護，後來更寫了三萬字，直接送到中南

海給毛澤東，結果文革中我被鬥百多場，三次差點被打死。

「但是在這個時期我還是未有懷疑社會主義，我只是覺得路線有問題。」

人生進入第三個階段，因為當了反革命，陳一諮到了農村勞動改造，這個時候才真正覺醒。

三分之二人餓死了，哎呀，我當時心情根本沒法平靜

「我覺得農民活得都不像人。我到了河南新蔡縣，一個村子一個村子死光，縣三分之一人餓死，當時是一九五八年，我很震驚，我就調查。旁邊安徽省臨泉縣三分之一人餓死了，新蔡縣北邊的上蔡縣，也三分之一人餓死了。周邊一圈吧，都是三分之一人餓死了。後來我到西峽，兩個老伯伯叫我到南邊看看，死人更多了，我說我沒錢了，他們每人給我五塊錢，我到了光山、羅山，三分之二人餓死了。哎呀，我當時心情根本沒法平靜，每天問中國人為甚麼搞成這樣子，那些基層幹部私底下都罵，國民黨也不至於搞成這樣，說共產黨搞得山

河破碎。」

陳一諾所指，就是惡名昭彰的信陽事件，五八至六一年，大躍進運動期間，出現五九至六一年，「三年自然災害」或稱為「三年困難時期」。

五九年十月至六零年四月，河南信陽地區十八個縣市，有十五個，出現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就出在該區的遂平縣，但信陽也成為三年期間全國死人最多的地區。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楊繼繩父親，也在五九年活活餓死。他用十年時間調查，翻查當年氣象資料，發覺期間氣候都很正常，災害絕不「自然」，純為人禍，在《墓碑》一書，就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作了詳細記述。

另一位大家熟悉的九八年諾貝爾獎得主，旅美物理學家崔琦，就是河南農家出身，是許昌寶豐縣人，十二歲離鄉，是香港培正中學校友，後來拿獎學金到美國讀書，成就了光輝事業，可是當他接受名記者楊瀾提問：「如果你十二歲時不外出讀書，結果會怎麼樣？」崔琦回答：「如果我不出來，三年困難時期我的父母就不會死。」邊說邊難過得流下了眼淚。

為甚麼一個生產隊搞不好，個個生產隊都搞不好

六九至七九，十年農村生活對陳一諮有很大的啟發。

「我真正意識到一個問題：如果經是好經，只不過被和尚唸歪了，那為甚麼一個生產隊搞不好，個個生產隊都搞不好？為甚麼一個縣搞不好，個個縣都搞不好？我那時就全國各地跑，每年春節回到北京就跟胡耀邦聊天，跟他講農村被破壞情況。」

記：「那時胡耀邦在哪兒？」

陳：「胡耀邦，五七年第三次團大會我跟他認識，後來他也下放，文革捱鬥嘛，七一年就回到北京。我七一年回北京，跟他由下午兩點談到六點，談了四個多小時，他非常的興奮，就讓我每次到北京都跟他談，我就跟他講了一系列左的破壞，在各方面給中國帶來的傷害。」

陳一諮辦事能力高，河南最落後的兩個生產隊加起來五百人，三個月就把生產搞上去，後來就被縣書記看中，帶着他四處視察，辦農業學校、辦科技網、辦衛生網、搞赤腳醫生、創辦地區農業大學，讓他當校長，後

來又讓他當公社書記，最落後的公社陳一諮去了半年，就把公社搞得不錯，得了全地區的紅旗。

要改變中國這種制度，就是要影響決策

但是他發現一個問題。

「你花再大的力氣，你搞得不錯，上邊政策一變，就又都變了，説實話是毛澤東啟發了我，毛澤東説中美關係要正常化，就要跟尼克松打交道。雖然尼克松是右派，但他是決定政策的人，我就想，要改變中國要跟決定政策的人打交道，要改變中國這種制度，就是要影響決策，才能改變得了。」

七八年他寫了另一封改變命運的信，他寫信給胡耀邦，表明非常贊成黨的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但是中國要實行現代化，農村不現代化不成，他願意為改善農村落後面貌貢獻力量。

結果胡耀邦一個批示就把陳一諮調回北京。當時「四人幫」被粉碎不久，很多青年組織各樣團體討論中國往何處去，他經過二十個月討論，八零年九月組建了「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一個個按實際出發的報告送到北京，獲得萬里接見，趙紫陽也下批示認許，「中國農

村發展研究組」一個民間組織，成了影響中央決策的重要組織。

步向權力核心

八九時陳一諮已非常接近權力核心。

「跟胡趙是非常親密的，跟他們經常有接觸，而他們為甚麼能接受我呢？就是因我敢講別人不敢講的話。我經常能講出中國存在的問題，確確實實存在的，所以我們的中國農村發展組後來為甚麼被胡趙肯定？就是因為我們敢講別人不敢講的話。八零年我寫《農村的曙光，中國的希望》，胡耀邦就講，對中國的政策起了重大的作用。在農村改革中我們是起了衝鋒陷陣的作用，在大多數人，包括中央領導人都在反對包產到戶時，我們是堅決的支持農民衝破人民公社枷鎖，去進行農村改革。

「萬里他後來都跟我講，你當時說包產到戶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比我們都認識得清楚。萬里就在八一年元旦專門找我們農村組的一批人去座談，當時萬里就說了他在安徽說的那句話：『農民吃飽肚子、穿上褲子、住上房子，共產黨才對得起農民。』

「他說：『現在中國的老百姓，還沒有像波蘭老百姓那樣，把波蘭共產黨罵成賣國賊，我們對不起老百姓。』

「八一年農村發展研究組在安徽做了一個調查，回來之後趙紫陽就批示：『這個報告把農村包產到戶以後的情況，講得一清二楚，建議各省省委書記、省長宜閱。』」

「八一年的十二月廿五日，和八二年二月廿五日，兩次書記處會議，肯定了中國農村發展組。自此一個民間組織就變成了被官方認可的半官方組織，開了共產主義的先例，並且有能力影響決策方向。

「八四年底趙紫陽說：『農村改革你作出了重大貢獻，現在改革進入了城市，要進行全面的經濟體制改革，你們要把一批二、三十歲，上過山下過鄉，了解中國實際，又學過知識的年青人組織起來，為中國的開放改革服務，為國務院和中央的決策服務。』」

陳一諮就開始當體改所所長。趙紫陽又主張人才不應都放在同一個單位，陳一諮就組織了北京青年經濟研究學會。

八六年組建體改所的第一年，他覺得農村跟城市的

問題隔行不隔理，就組織了全國四百個大學生和研究生到四十個城市，四百個企業進行調查，用在農村調查的方法，調查城市經濟改革的問題。

主要問三個問題：

現狀是甚麼？

問題是甚麼？

解決問題的前景是甚麼？

因為一個人也好，家庭也好，一個區也好，一個國家也好，都面臨這三個問題。就好像醫生看脈，若看不清現狀，就看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為甚麼胡趙當政時期，中國出現了一個共產黨執政以後，從來沒有過的開明時期？叫胡趙新政時期。就在於他們經過了文革慘痛教訓以後，能夠面對中國的實際去解決問題。也才有農村改革的發動，有經濟改革的開展。」

陳一諮組織的四百人最後寫了一個報告：《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

報告引起了哄動，日本、美國、歐洲全都譯了。

走近黑太陽

八六年底趙紫陽決定調陳一諮到政治改革辦公室去當秘書長，趙說：「經濟改革深入了，不搞政治改革不成，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陳一諮被趙的精神感動了，加入政治改革辦公室。但其實當時政治改革的條件並未成熟。

趙紫陽給中央的報告，政治改革由中央管，趙紫陽是組長、書記處是胡啟立參加、人大是彭冲參加、國務院是田紀雲參加、中顧委是薄一波參加。這五個人組成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討小組，下設辦公室，負責人是鮑彤，陳一諮是秘書長。

「當時客觀上有政治改革的要求，但是主觀上，特別是上層領導人大多數沒有改革的精神準備。所以八七中共十三大報告通過了政治改革的決定，但實際的推動是舉步維艱，特別八七年初胡耀邦的下台，給了極左派清算改革的一次機會。

「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有個理論局局長盧之超，我們政治改革辦公室在樓上，他們反自由化小組在樓下，他就到處講：『現在是批了說自由化的，沒有批幹自由化的。』『胡趙體制，批胡必批趙，不批趙批不了胡。』

「他說：『政治上自由化是經濟上自由化引起的。經濟上自由化是人民公社解體引起的。』」

說話是由與會者傳出來的。

所以當時局面、胡耀邦的下台，一一顯示中國改革受到很大阻力。

「到八八年政改一推出台，首先中央組織部系統是反對的，認為削弱了黨領導，而趙紫陽推出經濟改革、股份制，王震又拍着桌子大罵：『搞甚麼股份制？破壞社會主義公有制。』」

坐在洛杉磯小旅館憶述廿載往事，體弱多病的陳一諮仍然有點激動。

「那時陳雲、姚依林借着價格改革攻關造文章，實際上把趙紫陽給裝進去了。

「價格改革是鄧小平提出的，最後實行姚依林大放物價方案時，引起民眾搶購擠兑，罪名就落到趙紫陽的頭上，這是因為民間反腐敗呼聲很高，薄一波就講，因為頭一年陳元在北京市委書記選舉中被選掉，查康華時又查到鄧樸方，所以薄一波就說：『階級鬥爭煽動下，都衝着我們老人家的孩子來啦，去年有人整陳元，現在有人整鄧樸方。』意思是衝着陳雲和鄧小平來了。

「實際上就是政治角力，矛頭開始對準趙紫陽來，八八年下半年就開始這樣。

「因為經濟改革受阻，物價又上漲，民眾反腐敗反官倒呼聲又很高，而且大家覺得政改提出來實際又沒有甚麼效果，胡耀邦一死就成為導火線，人民認為胡的下台是委曲的，大家都同情他支持他，所以學生起來，接着市民也起來了。」

八九事件，是以鄧小平、李鵬為代表的中共既得利益者發動的清算改革的軍事政變

提到八九民運，回憶就變成了連綿的感嘆。

「它由一場學運發展為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有它很深刻的原因，但是共產黨的鎮壓也有它的原因。

「很多人說為甚麼有那麼多學生、市民，反腐敗反官倒爭自由爭民主的和平請願會被鎮壓呢？其實是共產黨陳腐的意識型態，和現實的既得利益所導致的結果。自四九以後，只要對共產黨不滿意、批評共產黨的人，誰在位批評主要當權者的，都被當作階級敵人整肅。毛澤東的時候，批評毛澤東的人，不是被殺頭就是坐牢，同樣鄧小平主政以後實際上也是這種邏輯，共產黨從來

沒有一種民主素養和觀念，所以一有民間或黨內的不同意見，就被認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反黨反社會主義，到現在這種歷史慣性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

「陳腐的意識型態背後，是現實的既得利益。現實的既得利益是幾十年形成了一批共產黨權貴，他們為了維護他們的生命利益，甚至於子孫後代的利益，不惜動用一切手段來維護它。

「八九事件發生，當時我就講，那是以鄧小平、李鵬為代表的中共既得利益者，發動的清算改革的軍事政變。二十年前我的退黨聲明就講了這句話。出來時我講了這句話，二十年後我仍然認為如此。」

幾十年黨齡，飽受政治磨煉，讓陳一諮在八九年四月就嗅到了硝煙的氣味。

四月一日，陳一諮開會時意外跌傷腿部入院，十五日胡耀邦一死，大字報就出來了，他就跟體改所的骨幹說：

「一、要支持學生和民眾悼念胡耀邦的行為，因為胡耀邦為改革作出重大貢獻，最後又含冤而死。

「二、要支持民眾提出的合理要求，如深化經濟改革、開展政治改革，解除報禁、言論自由、改善學校生

活條件最初也是這樣鬧出來的，但是也要勸阻他們勿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要勸導他們不要提過激的口號。

「第三、要盡可能說服中央領導人跟學生對話，聽取他們的聲音緩解矛盾。」

沒有政治現實的妥協，那就不可能出現民主

但情況到四月十八日發生變化，人民大學貼出一張關係圖，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罵了，特別在李鐵映名字下面寫了「鄧小平之私生子，竊據中共中央委員會要職」。李鐵映是鄧小平前妻金維映所生的，後來金維映嫁給李維漢，所以他叫李鐵映，但是老百姓裏有傳說他是鄧小平的私生子。

關係圖把所有政治局委員都罵了，當時陳一諮仍留醫，有人抄了關係圖給他看。

「我一看就覺得糟了，因為這等於平民和貴族的鬥爭了，因為你把共產黨所有官員都罵了，那他們怎能接受呢？

「八七年學生運動導致胡耀邦下台，我當時就在所裏講，沒有一個國家的民主化是靠學生運動實現的，民主首先不是知識分子理念的產物，它是現實政治力量妥

協的結果。英國的光榮革命怎產生？英國的百年戰爭今天你殺我明天我殺你，誰也殺不了誰。我們妥協吧，最後才出現光榮革命。你沒有政治現實的妥協，那就不可能出現民主。

「我當時跟所裏的骨幹講：『鄧小平這個人在光榮的情況下可能讓步，在恥辱的情況下絕不妥協。』

「在淮海戰役二野時，鄧小平這個人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污辱到他的頭上他能讓步嗎？搞不好這次又是個悲劇了！」

四月十八日嗅到氣味不對勁，接着四二六社論發表，陳一諮就覺得完了。因為社論跟當年四五運動對學生鎮壓的社論沒甚區別，還都是那些老話，八七年反自由化胡耀邦下台，學生們根本就不服氣，因為社論說一小撮壞人操縱，學生會覺得自己都成年了，都是愛國的、為了國家的，怎把我們說成是一小撮壞人操縱呢？他們不服氣，當然會進一步抗爭，矛盾進一步加劇，陳一諮一看這個社論就覺得糟透了。

老陳不好了

「四月廿八日的夜裏我一個老朋友慌慌張張的跑來

醫院找我，其實這個人也是個高官，他說：『老陳不好了。』

「我說：『怎麼啦？』

「他說：『李錫銘和陳希同在北京市召開北京高級幹部擴大會議，說學生運動有三個黑手：政改辦、體改所、發展所。』

「他說：『你要有精神準備，可能要有大的事情發生了。』我當時就想來想去睡不着覺，發展所的所長陳錫文，我提拔的，現在是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後來溫家寶用了他。陳錫文他不可能操縱學生運動。鮑彤也是，他在黨內懂這個規矩，也不可能操縱學生運動。到夜裏五點我想明白了，發展所是誰呢？就是我們農村組後來組建的，因為我們農村發展組一部分到了體改所，一部分還留在搞農村問題，等於發展所在國務院搞了農村改革，被保守派認為破壞人民公社，而體改所搞經濟改革，被認為破壞公有經濟，政改辦呢，被認為破壞黨的領導。他們所說三個黑手呢，實際上就是來清算農村改革、清算經濟改革、清算政治改革。這看得很清楚了，這是他們要對改革進行反攻倒算了。」

四月廿九日一大清早，醫生還未來，陳一諮就在護

士長反對、石膏還沒打開的情況下要求出院，護士長不允許，後來要和醫生交涉，強行出院。

「那時趙紫陽正從朝鮮回來，我跟他講：『如果按照這個方針，中國的改革至少要倒退二十年。』

「趙紫陽說：『二十年不一定，十年總會有。』」

記：「可以看出他這個人是比較樂觀，還是……」

陳：「他比較豁達。非常開明。」

記：「也怎麼講呢，比較天真，現在看來。」

陳：「也不是，豁達就是看得開的意思。後來他就在亞銀講話。」

記：「那個講話寫得很好，誰寫的？他自己寫的？」

陳：「鮑彤寫的，但是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是趙紫陽提出來的，他這個講話提出以後，社會上反應都非常好，大家反應都非常好，而且大部分的學校都開始復課。但是趙紫陽亞銀講話之後，當天晚上，李先念和王震，先後跑到鄧小平家裏，特別是李先念大家都沒注意到，他是從改革一開始就反對的。

「他跑到鄧小平家裏說：『第二個司令部出來了，還能退嗎？再退就把政權讓給他們了。』

「王震也跑去叫喊。因為鄧小平講了嘛，出現反黨

反社會主義動亂嘛，而趙紫陽在亞銀講話說沒有出現動亂嘛。

「所以他認為兩個司令部，兩種聲音，就是和鄧小平唱對台戲。其實從這你也可以看到，這些老人決策，他根本不是從民間、民情、趨勢，而是從自己固有觀念出發，就是陳腐的觀念，當然陳腐觀念的背後實際上就是他們的既得利益，不願意放下既得利益。

「所以我到海外來，很多人問我胡耀邦下台、趙紫陽下台啦，李鵬當總理反而挺穩定。我說胡耀邦、趙紫陽要改掉這個體系呀，而李鵬是跟這個體系如魚得水呀，他們是一體的呀。胡耀邦、趙紫陽之所以下台，表面上的原因是胡耀邦支持、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趙紫陽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們表面的原因是要維護社會主義，實際上他們也不懂甚麼叫社會主義，他就是早年學那點ABC、史太林主義那點東西，背後的根本原因，就是這些改革進一步推行的話，就會損害他們本人的功業、利益和子女的利益。

「現在我跟你講個故事，一九八五年我跟鄧樸方談起來，他說：『一諮，你說改革開放是甚麼？』

「我說：『那是權力利益再分配呀，改革就要使那些

窮苦的大多數老百姓富裕起來。』

「他說：『我不這麼看， 改革是甚麼？誰有本事誰就從國家那兒撈一塊。』

「他這個話一語道出了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本質。後來實際就這樣，所有跟權力金錢接觸最接近的權貴，都從國家那兒撈了一塊。」

學生有錯，政府有罪

「所以八九年，學生如果懂民主就不會不懂妥協，共產黨如果稍為有一點民主的素養，也不會去殺人。所以王丹講：『學生有錯，政府有罪。』是有道理的，王丹講這句話很多人批評但是我很欣賞，學生肯定是愛國的，但他們年青嘛，不懂得策略這個不奇怪嘛，但你政府就是個家長，孩子犯了錯你也不是用槍把他們打死，對不對，顯然這是個很大的悲劇嘛。」

民主規律：溫和力量結合

分析八九年事件，陳一諮引述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所講，第三波民主化，廿八個國家走向民主化過程中，有一條基本的經驗，就是社會要求變革的力量，他們中

間的溫和力量，和政府中間改革的力量結合，民主化就前進；相反，社會激進的力量，和政府的強硬力量對抗，民主化就倒退。第三波民主化，廿八個國家都是呈現出這個規律。

「所以天安門事件血的教訓，就給我們看出了一點。九一年我在普林斯頓大學講『八九』，實際上是共產黨裏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絕情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上極端的民主主義者，共同扼殺了中國的改革，因為他們想一步解決問題，問題不可能一步解決，這裏面又牽涉第三個大問題，就是共產黨文化對中國人影響的問題。共產黨文化有一個最大致命弱點，就是用目標代替過程，用理想取代現實，幾十年所有共產黨國家犯了這個錯，總是想很快實現共產主義，總是給出一個目標強行要達到，結果帶來很多災難。是文化上的問題，為甚麼我說右翼的極端民主主義者，也犯這個錯，因他們總是想一天在中國實現民主，一步解決問題。」

記：「我想把這個經驗跳到今天的中國，你看到有沒有這個危機，還是中國人都願意在經濟上得利，體制上就不願意去碰它？」

陳：「對，這是另一個問題，你要知道，可以這樣

說，六四發生前大多數中國人誰也沒有想到，共產黨會用機槍坦克，這麼兇殘的去鎮壓。

「第二，誰也沒有想到，六四後還進行那樣的整肅、抓捕。當時北京的大新聞機構、大報紙，凡是支持學生的、同情民運的，幾乎都被下放，被整肅了。黨政軍內，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幾乎沒有人沒受到整肅，各領域全面倒退，特別是八九年，李鵬在經濟上倒行逆施。九零、九一中國就出現了經濟負增長。

「當時李鵬經濟措施五條：一、要發展集體經濟，在北京大興，和四川廣漢，試驗種田大戶，把沿海漁民漁船，分出去的又重新合起來，引起農業生產倒退。

「二、要取締個體經濟，江澤民當時不是講，要讓那些不法的個體戶傾家蕩產，這是八九年十月講的。

「三、是壓縮鄉鎮經濟，因為姚依林一直認為鄉鎮經濟是和國營經濟爭資源、爭資金、爭勞動的，要壓縮鄉鎮經濟百分之四十。

「四、強調發展國營大中型經濟，可是國營大中型經濟，從來都是投資規模大，投資周期長，經濟效益低的。

「五、收回下放給地方的經濟權力。結果這五條經濟

上的作法，全部失敗，引起地方抵制，引起農民抵制，所以才在九零、九一出現經濟負增長。

「所以鄧小平九二年南巡，強調第一條就是堅持家庭聯產承包制，就是包產到戶。為甚麼要堅持，就是李鵬他們反對，接着要開表彰個體戶的大會，壓縮鄉鎮經濟壓縮不了，因為鄉鎮經濟容納很多勞動力而且給地方政府帶來很多財源，地方政府反對壓縮。所以鄧小平九二南巡又一次掀起了經濟改革，新的一輪。但這時候鄧小平強調的改革，因為沒有政治改革作為配合，所以這次的經濟改革就變成了權貴的掠奪。而江澤民和李鵬他們當時提出穩定壓倒一切，國內人又叫『用錢買穩定』。怎叫『用錢買穩定』呢？它實現了兩個傾斜政策：一、犧牲農村保障城市。二、犧牲平民保障權貴。城市裏不出亂子就好，所以經濟政策上保障城市，犧牲農民利益，所以農民生活這些年為甚麼越來越差呢？為甚麼城鄉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呢？就是這個原因。」

取消隔離城鄉制度的戶口制

陳一諾認為近年胡溫努力搞三農問題只是表面現象。

「你不要上當，胡溫表面上要搞一些親民，真正要解決農民問題，一、首先要取消城鄉隔離制度的戶口制，這條不取消，農民永遠是二等公民。

「二、要把土地還給農民。

「三、要解決農村內民少相公多的問題。食之者眾，生之者寡，就是吃的人多，生產的人少。中國在漢代，三千農民養一個官員，清代一千個百姓養一個官員，四九年時是五百人養一個官員，現在呢？是十五人養一個官員。所以農民負擔不堪其重，那些表面的措施沒有用。取消農業稅，農業稅佔多少呢？有甚麼用呢？它只要生產資料價格不斷上漲，它就把農民財富都拿走了。所謂兩個傾斜就是用各種手法剝奪農民保障城市，而在城市裏又是犧牲平民，保障權貴，所以現在為甚麼八成以上財富都是被少數權貴掌握呢？為甚麼貧富懸殊，中國是世界上最差的呢？就是這個原因造成的。

「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是強者肆意掠奪，弱勢者不堪忍受，就發生大的事端。」

陳一諮認為容許土地流轉是非走不行的一步，世界上各個走向現代化國家，私有化首先是土地私有權。

「英國哲學家洛克講過，沒有私有財產制度，就沒

有民主制度，私有財產制度的建立，表面上是有利有錢人，實際上是有利於全民，因為保障私有財產制度以後，富人就不怕窮人來搶，就會對窮人用更好的態度，而窮人積累財富，也可以成為有產者，也不怕富人來掠奪。社會慢慢中產階級增加，政府再用所得稅、累進稅、遺產稅來平衡，就慢慢走向平等合理社會。」

中國人為了金錢可以不顧道德不顧一切

記：「金融海嘯前的中國經濟蓬勃得不得了，經濟的穩定會不會帶來政治的穩定？」

陳：「文革時毛澤東利用人民的獸性，殘酷的進行鬥爭，江澤民是利用人的貪婪，人民在高壓下的恐懼，變成不講道德的貪婪，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八十年代的思想活躍、進取振奮的精神不見了，但是為了金錢可以不顧道德不顧一切。

「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既有過去中國經濟存量，原來儲存的能力，在發揮作用，因為過去中國潛力沒發揮出來，基數小，一旦調動起來增長速度就比較快。原來土地都沒有價格，它賣一部分土地，就能獲得很多收益，當然現在中國如果繼續賣土地的話，經濟增長速度

仍然會很快，但是不可能，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中國現在的發展，應該說是吃祖宗飯，做兒孫孽的發展，因為它是耗盡資源、生態破壞、掠奪性發展、破壞式的發展。

「中國現在雖然經濟發展很快，但環境污染破壞更快，中國已經沒有合格的水可以喝，已經沒有不污染的河流，這種發展很難持續下去，而且這幾年很多是靠廉價的勞工、農民工，用他們的廉價勞動力出口換匯，來保持經濟發展速度。」

六四後陳一諮也是由黃雀行動的六哥救出。

「五月廿一日李鵬就想抓我，五月廿八日鮑彤被抓了，但沒有抓到我。六月三日夜裏開始了殺人，夜裏三點我就寫了辭職和退黨聲明，一點從木墀地回來的同事，滿身鮮血的告訴我殺人了，到兩點多鐘從人民大會堂過來的人也說殺人了。」

六月五日深夜，陳一諮黯然告別奮鬥半生的北京，七月五日深夜，告別立志奉獻一生的祖國，由海南島坐貨船離開，在船上坐了五十三個小時到了香港，七月九日到了法國。

「過程非常精采，就跟偵探小說一樣，我的回憶錄

會寫。」

裏面涉及有人派出幹將持AK47沿途護送，陳一諮乘貨船過了公海一段再轉駁快艇，他也問過一句：「請問你是誰？」對方只拋下一句：「你別問，我是負責你的人。」

本來很希望聽下去，但陳一諮文革期間捱鬥百多場的所有後患，現在都出來了，患淋巴癌多年，零八年又患了胰腺炎，每次只能談不多於一小時。過久他就會感到腹脹不適。我們斷斷續續已談了兩天。

「逃亡過程起碼要談個半小時。」這對一個六十九歲患病老人來說，實在困難。逃亡過程唯有留待他的回憶錄細說了。

王 軍 濤



政府的強勢、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我最早介入是統戰部長閻明復先生邀請，他受中共中央委託處理學潮，他希望跟知識分子、學生對話。後來有些知識分子講了我的名字，有人就坐了閻明復的車來找我，我原來不願參與，但他們說服了我。」

一九七六年，文革烈焰仍燒得張狂，人民已受夠了十年運動鬥爭之苦，四月四日清明節，約二百萬北京市民、學生，集合在天安門廣場，悼念一月八日逝世的周恩來總理，當中有一個十七歲的學生——王軍濤。

四月五日晚上，悼念人羣遭受武力棍棒血腥驅散。四月七日，毛澤東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政府即開始逮捕和迫害組織者。四月十六日，王軍濤被捕下獄，並在獄中渡過十八歲生日。

在未進入社會大學之前，他已經進入了政治大學。和陳一諮一樣，八九民運，他深感勢頭不對，學生爭取方式，也和他的策略迴異，所以刻意保持距離，但在統戰部長閻明復派人請托下，五月中終於介入說服學生。媒人被捉了上轎。

六四後，媒人被捉了進秦城監獄。

跟毛澤東分道揚鑣，十七歲坐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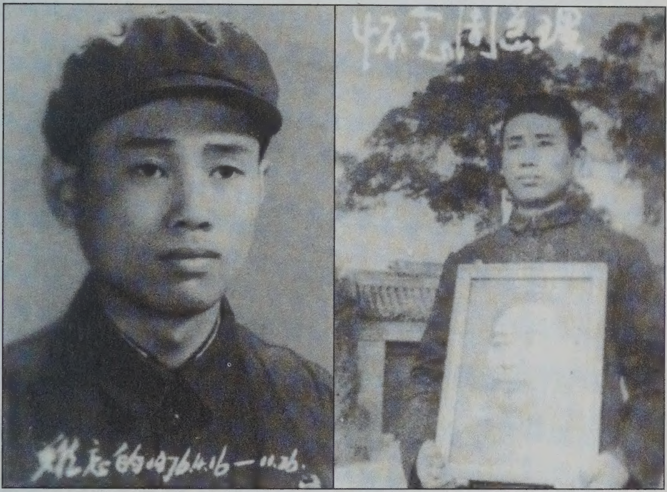
「七六年文革搞了十年，到林彪事件結束，中國老百姓就不想再搞了，特別是跟着毛澤東的年青人開始有獨立思想。大家發現革命搞那麼久，經濟跟專業都給耽誤了，大家就比較喜歡周恩來搞的四個現代化。正好七四年鄧小平出來工作，他接周恩來嘛，抓治理整頓，結束政治運動，搞現代化建設大家都比較支持。但是毛澤東發現了，想再搞政治運動，把鄧踢下來，繼續搞文化大革命，中國老百姓就不願意了，包括跟着他的年青人，也包括我們在內，開始要跟毛分道揚鑣。於是我們在七六年走上天安門廣場抗議毛澤東，那時還是有生命危險的，因為文革對反革命的迫害要比現在厲害得多，沒有法治限制。」

七六年四月五日運動達到高潮，在天安門廣場以流血清場告終。

四月七日中共中央作出兩個決議：一、把鄧小平撤職，二、定性天安門事件為反革命事件。

一九七六年是中國近代史上多事的一年，七月廿八日唐山大地震，就把案子審查往後推了。但實際上第一批被判死刑已出來了十個人，仍未宣佈和執行。九月九

日，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粉碎，被判死刑的人，從鬼門關逃出，當中沒有軍濤，可是北京市公安局抓了三百八十個人，他就是其中之一，中間放了一些人，但還剩三類人要重點打擊的：一類是幕後策劃者、一類是現場指揮者、一類是反動和謠言製造者，王軍濤三樣都佔



難忘的一九七六，十七歲下獄，十八歲出獄，馬上往八寶山悼念周總理。

了，進監獄時十七歲，在那裏過了十八歲的生日。最後還關了一百多人。

那年代，小學生叫紅小兵，中學生叫紅衛兵。軍濤就是其中之一。

由於父親工作關係，王軍濤從小閱讀學習機會都比

別人多。

記：「那你爸爸其實是軍方的高層？」

王：「中國的軍隊很大，他在北京的級別不算很高，但是在中國一般的老百姓心中他算是個高級軍官，我們家當時在解放軍政治學院，訊息比較發達，而且這批人是相對有比較獨立思想的人，我父親主持過黨史研究，就因為這原因我能知道一般中國老百姓不知道的，還在封鎖的訊息我都能知道。這些對我思想形成有很大幫助。」

記：「那進監之後有沒有後悔過，哎呀，為甚麼我要混上這個事呢？」

王：「我沒有，但是思想壓力比較大，因為我們從小都知道從事政治活動鬥爭可能風險比較大，少時有坐牢的思想準備，想過如果有天中國變修了上山打游擊呀。所以四月十六日把我抓到北京海淀區看守所，我看到鐵門鐵窗還有種興奮的感覺。我想：『真的有這個機會。』因為你想在中國做點事情的話，你必須要過這一關，必須要上這一課。

「進監獄別人都覺得很受罪，但我還是在裏頭讀書，在那裏能接觸到所謂江湖的三教九流，有很多刑事

犯，但很多都是一念之差就打架呀甚麼的，其實能量都很大，能力都很強，閱歷很豐富。在裏面我基本上做社會調查，培養毅力，還有鍛煉跟各種各樣人打交道的能力，等於在監獄上課。」

十八歲，換了是今天，很多青少年還在唸中學，忙於唱K打機，王軍濤已讀透了馬列主義，決心為國家幹一番事業。

王：「可是我已經算是比較晚的，我們上面老三屆的學生一般十三歲就自己到農村去了，就要開始造反、組戰鬥隊、要寫文章油印傳單到處張貼，還要拿着槍棍到處武鬥，到農村養活自己，父母在外工作的還要帶着弟妹，我們上一代的人更早熟一點。

「七六年我們走上天安門廣場就是要結束政治運動，開始抓經濟搞四個現代化。但天安門運動，上百萬人政治運動一下子被鎮壓了，我們也覺得很難受。我被關後就想，我們從小受教育，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人民只要起來，人民要甚麼都能實現。但為甚麼上百萬人的運動就能被一小撮人鎮壓呢？當時得出的結論就是中國的政治制度有問題，一個是政治專制，一個是思想迷信，上面說甚麼就相信甚麼。中國要真正解決政治問

題，避免發生四五運動、人民被少數人鎮壓，就要搞政治改革。」

坐了二百多天牢，出獄以後，本來有機會走後門參軍，也可以到十一軍的寫作組，呆一段時間就可以保送工農兵學院。因為王軍濤喜歡寫作，家人就覺得可以讓他去當職業作家。那時沒有招大學生，都是保送的。但王軍濤拒絕，從小在軍隊大院裏長大的軍濤，在封閉的年代，各種條件都比人優勝，入獄後才知道，社會的溫度原來跟他長大的溫室距離很大，於是決心到農村插隊，認識社會。

中國缺少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化和自由化

記：「你為甚麼覺得下鄉比上大學重要呢？」

王：「那時大學的東西都是可以自學的，我上初中時已把馬列主義全都通讀了，因為我爸爸是做這個東西的嘛，所以家裏書都很全。上大學如果是工農兵學員我覺得我學不了太多東西，我在監獄發覺整個世界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中國多數的人是農民，而農業又很重要，所以就想到農村去。但是在七八年，民主牆的興起，我就想到中國不是缺少四個現代化，而是缺少第五

個現代化——民主化和自由化，因為有了民主化、自由化，自然抓現代化就得到貫徹。所以七八年我就跟王雷、李勝平、呂嘉民、周為民和陳子明等人辦了《北京之春》，是當時最大民間刊物，後來又有想法，把高校、大學變成民主中心。當時我和胡平、張偉合作，就把北大變成民主中心。一九八零年發動競選活動，十四間高校競選，其中八所的第一個候選人是我們推薦出來的，胡平、陳子明都當選了，我是北大第一個站出來競選的。」

告別接班快道

王軍濤七八年考進北大，自負的他想到文科可以自學，因為讀的基本上都是馬列著作，比較難自學的是理工，就報考北大的核子物理專業，最好的大學，最好的專業，作為「四五」英雄，還獲選為共青團的十大主席團成員，成為團中央最年青的候補委員，按資歷比胡錦濤、王兆國都早進入團中央這個接班的快道，王軍濤是十大進去的，胡錦濤、王兆國是十一大才進去的。

但他終究選了一條難走百倍的路。

「民主牆魏京生案審判，我就覺得很痛苦，怎麼又

搞政治運動了？就決定走獨立的路，不在體制內發展了。」

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把整個政治上，想講自由民主的人給打下去了，王軍濤就想辦一個獨立的實體，有自己的獨立資源，不受政治影響，因為當時如果中央不讓搞，就完全沒資源可搞，只能清談。

八六年，王軍濤和陳子明等人辦了中國最大的獨立民間實體，有兩個獨立智庫，兩間函授學校，二萬多學員，還有自己的印刷廠，搞了十來套叢書、上百本書，通過這個方法來推銷思想，規模很大。

共產黨八七年成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所，還把王軍濤的智庫，列為合同研究單位。

他們一邊和北大歷次學潮領袖、八五、八六年的領袖，建立固定關係。這個策略叫「一體兩翼」，體是王軍濤他們自己搞的研究組，一翼是伸到體制裏，影響政府決策，另一翼是整合北大歷次學潮領袖，對學生進行影響。

到八九年運動爆發，因為感到學生不成熟，他們也沒想到學潮能對民主運動起多大作用。

當時胡耀邦、趙紫陽都先後擺出政治改革的架勢，

王軍濤、陳子明希望通過辦研討會，通過民間知識界專業界討論，形成社會風氣和壓力。情況有點像香港八十年代的壓力團體。

另一方面就通過新華社的內參、《人民日報》的內參與決策層交流。因為那時那些人思想都很解放，非常開明。通過像陳一諮他們的經濟改革研究所交流，影響政府政策。外面有輿論壓力，政府政策制定拿出一個方案來回應。他們想用這種良性互動方法推動中國變化。

公安部門一直在注視着我們

「那時真有點呼風喚雨的感覺。沒想到學潮就爆發了。其實學潮爆發我們的態度也挺矛盾的，一方面學生的熱情、精神，你在其中如果不被感動你會覺得你這人沒良心；但另一方面拉開距離，我們覺得如果介入學潮，我們的路徑圖就可能會受影響，所以在前期我們是若即若離的。因為我們是第一代的學潮領袖，學生們都來找我，當我是老資格職業革命家，徵求我們意見，我給他們出主意，做一些顧問，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進去；還有另外一點，就是當局，特別是公安部門一直在注視着我們，如果我們一進去，到它不是學生運動之

後，當局就會鎮壓了。

「你可以看出來，當時在如何解讀學潮上，中央各派在角力，當中像何東昌極力指一小撮人，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地在煽動反革命事件。但另一方面還是有很多開明思想、改革思想的人指出，應借學潮提出的問題，就是民氣可用，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來解決問題。我們也比較希望向着這個方向發展。

「我最早介入是統戰部長閻明復先生邀請，他受中共中央委託處理學潮，他希望跟知識分子、學生對話。後來有些知識分子講了我的名字，有人就坐了閻明復的車來找我，我原來不願參與，但他們説服了我。我們的團隊還投了票。」

記：「多少人呢？」

王：「十來個人吧，大概是七比二還是七比三，支持我介入。陳子明是不同意的，認為我們搞得很好，介入會被犧牲掉，我開始也是這樣説的。我覺得這學潮挺難弄的，但是朋友就覺得應有責任心，後來我們就決定介入。介入是要説服學生和政府對話，幫助政府找出學生領袖對話。可是後來沒有和平解決嘛。

「第一輪那天晚上對話我在，閻明復還是非常誠懇

的，還是感動了學生，撤不撤出呢？當時戈爾巴喬夫來，學生領袖都同意說願意做點工作。

「然後四二六社論呢，閻明復說：『四二六社論現在就是這樣了，可是我們能不能給中央一些時間，中央也從來沒否定學生的熱情。』學生說還是不成，要有一個公道的說法比較好。 閻明復說：『《人民日報》也有權說他的觀點，學生也有權堅持你們的觀點。六月二十日萬里原來要召開人大會議，那個時候你們去反映，讓人大做決定，來審查學潮過程。』

「學生同意了，但我就發言：『學生如接受就代表不了學生，回到廣場肯定代表不了學生。』因為我對學潮是比較瞭解的。後來閻明復就沒有再來找我，可能他覺得我唯恐天下不亂，幹嗎都談好了，又發出一個不和諧的聲音，但那是我經驗之談。

「所以劉曉波跟他們談完，開始要說服學生，廣場學生就開始對他起哄，他就說：『那我跟你們坐在一起絕食吧！』」

記：「我不明白，既然學生同意戈爾巴喬夫來他們便撤出廣場，為何你又提反對意見？」

王：「他們說服不了學生，他們當時在廣場上說服

學生但學生不幹嘛，我當時不在，有人說他們差點說服學生，但天津一批人聲援來了，他們又撤不下來。

「五月十五日鄧小平接待戈爾巴喬夫晚宴，筷子夾不住食物，明顯的他已非常震怒了。

「其實趙紫陽五四講話不錯，但五月十三日學生開始絕食，閻明復調解失敗，全國都非常牽心掛肺。」

王軍濤指出，像他們這些長年研究中國進步的人，八八年做了個研究，就是第三世界多軍事政變，一般這個情況，軍管在甚麼時候發生，他們就判斷中國可能有軍管。希望說服學生停止絕食。

「十七日晚，我和陳子明一大批人聊，覺得我們必須做工作，如果學生不能停止絕食的話，中國可能出現很大的倒退。因為八六年學潮已經搞掉了胡耀邦，我們很擔心這個學潮再搞倒一個，我們決定開首都愛國維憲社會協商聯繫會議，把各方面人搞到一起來，準備十八日開會。

「但在十八日，我主持會議，一看會上各人情緒都很激昂，要說服大家停止絕食不太可能，就改為整頓廣場秩序，多設糾察隊。

「十八日開完會子明就問：『說好了要商量停止絕

食，為甚麼你不說呢？』我說：『他們不會接受的。第二天你試吧！』

「十九日他們開會爭論得很厲害，他們到廣場時，已經太晚了，戒嚴的決定已作出來了。」

沒想到兩個小時內北京市民奇蹟地把十多萬大軍全部堵在城外

戒嚴令一出來，王軍濤說成了，學潮到此為止了，因為這個世界沒有人能頂住正規軍，而且還調那麼多軍隊。沒想到兩個小時內北京市民奇蹟地把十多萬大軍全部堵在城外。

過了一天，王軍濤和朋友們還是覺得有和平解決的機會，五月二十日就成立首都愛國維憲社會協商聯繫會議。通過圓桌會議，學生的三大團體，高自聯、絕食團、對話團、工自聯、工人糾察隊、市自聯、市民敢死隊、知識分子聯合會、記者、教師的代表、體改所全到了，討論運動接着應怎麼做。

第二是成立廣場指揮部，防止出現分裂和內鬥。

第三本來還想討論運動下一步該怎辦，訴求和目標是甚麼，才能跟政府談判。

最大的問題是鄧小平聽信了北京市的報告

「我一直覺得『八九』最大的問題不是該不該堅守廣場，最重要你沒有提出明確訴求作為談判條件，中國政府看不到我做甚麼問題才能解決，我是不是能夠接受這個東西。當時不同的學生提不同的要求，隨着老百姓的想法每天都在變。

「後來很多朋友覺得我們可以做得更多，但如果政府決心鎮壓，我們是沒有辦法令它有個正面結果的。我覺得中國的事情該有理性互動，當時最大的問題是鄧小平聽信了北京市的報告，因為他歲數大了，也沒有到一線，沒有親自調查，就認定學生是要推翻他的，使得他決心用兵鎮壓。如果鄧小平想鎮壓，運動理性不理性，結果都一樣。」

王軍濤為學生辯護，指八九民運其實是理性的，後來香港台灣很多人問，當時是不是太激進，他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第一、政治訴求，在開槍前沒有人提出推翻共產黨口號，你找不到一個口號會這麼溫和，百萬人參加。

「第二、方式上幾次百萬人集會，沒有一次暴力事件，連小偷都罷偷，世界上的歷史你找不出一次這樣的

事件，如果這樣叫激進，全世界還有溫和運動嗎？

「台灣有人問是不是當時你們不策略，我說比民進黨不知策略多少倍，比起中壢事件，比香港六、七十年代運動，包括現在長毛的方式上，要溫和得多。」

五月底之前不能解決，那我們的人全部撤掉，這個運動我沒法對它負責

記：「可是絕食不算激進嗎？」

王：「當然不算，他不是絕對的，他們希望得到一個回應，有回應就可以停止，他們要求不過分呀，只是要求與領導人對話，進行直播，這個我不認為激進，關鍵是你領導人連起碼的要求都沒答應，而且學生絕食沒有打砸搶。

「但回過頭說呢，我當時跟子明也說，如果五月三十日前不能和平解決，運動可能流血結局，會被鎮壓掉。」

記：「為甚麼？」

王：「鄧小平呀，我們是長年研究政治的，知道這個事不會長年拖下去，一定有個結果，鄧小平不會讓它繼續。我也問過部隊，軍隊認為控制局面沒有問題的，假如他們出手肯定能控制，我也跟子明講如果五月底之

前不能解決，那我們的人全部撤掉，這個運動我沒法對它負責。

「五月三十日我就把劉剛、張倫撤下來。他們一個是發動成立高自聯的，一個是聯合糾察隊長，把他們送到郊區。」

記：「那你有沒有向學生發出非常嚴重的警告，哎，不是說笑的，你們要快走了！」

王：「學生天天都有不同的聲音，一會兒說我們撤出廣場，過了他們還在，一個新的宣言甚麼我們要堅守到底，一會兒說空校運動，明兒看學校都是滿的，後天說我們要到外地發動老百姓，但主要人還是在廣場呆着呢。學生是非常認真的想做好事情，但因為精神高度緊張，時刻決定都在變化，你只要一天不在廣場，他們好幾個決定做完了，最後你發現他們還在那個地方呆着呢！」

如果總統今天說，國會不許討論總統的問題，媒體不許討論我的問題，美國人能革命的呀！

記：「反正後來能不能說是失控，根本沒有辦法控

制？」

王：「這個道理很簡單，如果中國政府不給你回應，它就是個沒結果的事情，它沒有失控，學生沒有砸、搶、燒，他一開始呆着要求，他後來還是這樣子。學生的秩序最多就是把天安門廣場弄髒了，然後開始時很嚴肅，憂國憂民，後來就經常是笑聲、打鬧聲音、玩的聲音，有點像公園了，你能說學生只是這個問題，你還能說甚麼？有人說美國白宮能讓你呆嗎？我說如果美國總統把國會關掉，媒體不許講問題，如果總統今天說，國會不許討論總統的問題，媒體不許討論我的問題，美國人能革命的呀！甚麼佔白宮呀？他們馬上就革命了，他們有幾百萬支槍，馬上就上街了。」

他指出，中國之所以發生學潮是因為八八年出現搶購、擠兌、物價上漲、腐敗、失業那麼多問題，八九年初人大不許討論，政協不許討論，媒體不許討論，把所有合法討論都堵死了，才有青年學生率先走上街頭為民請命。

「為甚麼八八年以前學潮，老百姓沒有同情？包括八六年學潮？為甚麼八八年學潮，老百姓那麼同情？就是因為當時的領導人把合法的、講理的、理性的渠道全

堵死了。

「我們當時辦媒體的，千家駒、徐四民八八年講話，大家都鼓掌，八九不讓他們講，知道徐四民要放炮，不讓他講。

「克林頓、布殊若敢說美國媒體不許批評我了，國會不許批評我了，你看美國人會去佔白宮嗎？美國人革命了，你違憲，肯定推翻政府了。

「英國大憲章，老講甚麼妥協，英國貴族怎麼妥協？英國貴族帶着劍，國王打敗之後才妥協，就是不把國王廢掉，然後我們找個兩全其美的方案。那叫妥協，光榮革命其實也是貴族帶着軍隊，其實國王跑掉了。」

六月七日，媒人也要調整人生路徑圖——跑掉了

「我是六月七日在北京市，知道所有人都安全之後，帶着包遵信、王丹走的，臨走前我打了個電話給(當時的妻子)侯曉天，說我八日要出發去哪兒，侯曉天帶着家裏二百多元到車站，公安早已在那裏埋伏，其實我七日晚已在永定門上了車，當時也不知去哪裏，買到哪裏的票就去哪裏，結果我買了票到哈爾濱，坐飛機到

了上海，上海坐船到安徽，把公安甩掉得乾乾淨淨的。」

王軍濤笑說自己是職業革命家，還化了裝，用早已辦好的假證上路。但職業革命家最後掉了招牌。

「所有糊裏糊塗沒準備好的都跑掉了，跑到香港了，我們不想出國，準備周密但反而跟我的都被抓了，沒準備的反倒都跑了。」

記：「對呀，那你拆招牌了！」

王：「因為還是沒想到他會打擊得那麼厲害，我們都不想出國，王丹還想回北京，我們就約定躲起來靜待形勢。

「王丹回京就被抓了。我到了武漢，公安已埋伏，布下天羅地網把我抓了，保護我的人還包括以往反對運動的人，和我談過就認為中國不應再有政治迫害，觀點如何不同也要保護我，結果他們十六個人也被捕了。」

九零年十一月被捕，王軍濤跟陳子明一樣，被指為學運黑手，因「陰謀顛覆政府、反革命陰謀煽動罪」，判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九四年以檢查身體名義到了美國。

八九的事的確和他們期待的中國政治變化路徑圖不一樣，王軍濤、陳子明已建立了獨立實體，能影響朝野

互動，民間輿論和政府改革方案、政策制定是可以互動的，他們本來很希望走這條路，十三大趙紫陽已經宣佈要搞政治改革，要搞社會協商對話機制，新華社請他們去座談，文化部、《人民日報》請他們去座談，徐四民也找他們談，談了之後很感動，覺得中國有希望。老先生後來還寫了篇文章，高瑜也寫了篇東西。

「那時智庫已有能力影響港臺輿論，影響朝野互動。我們幹嗎非要走那條路？八六學潮打掉一個胡耀邦，所以我們特別擔心，但運動就是這樣子，我們特別尊重人民權利，開槍前我們還是猶豫的，是不是要進去，進去多深？

「我現在也想如果我們再多做一點，責任心再強一點，可能結果是不是一樣？可是只要你和鄧小平沒直接對話機會，就不能讓他放棄鎮壓想法。

「現在你不要批評學生不理智，當時誰都不理智，而且喊打倒鄧小平的不是學生，是社會上首先喊的。

「現在很多人對學生批評不客觀，學生就是不成熟，他們和平理性非暴力做得非常好，在全世界你找不出來，除了香港五十萬人遊行，能比『八九』更文明之外，古今中外沒有一個比『八九』更文明的了。政治就是

政治，沒有政治風潮就沒有轉型。而政治風潮最文明的就是八九民運。」

記：「當然當時沒有太多人會有這個智慧，知道會開槍會流血，現在來看會不會是學生沒有學好妥協？」

王：「那也不是，學生怎麼妥協，他還是有這種鎮壓。」

記：「會嗎？」

王：「當然啦，我們當年搞學生競選也遭報復，選舉法講明可以的，問了黨委，黨委説可以的。共產黨甚麼時候不算帳？」

報復——包括畢業後不分配工作，不准考研究生。

哪有中國那樣，和平請願者被打了，還要指責請願者你是不是把打人的人惹火了？

「如果人民憲法規定他有權利，有人去實踐自己的權利你就不能説他幼稚，你只能説搞憲法的人不按憲法做的人應指責他們。到後來中國人過度保守心態已經到了對統治者太遷就。我再問一個問題，八九年如果你説激進導致開槍，八九年後沒有再上街，考慮統治者承受能力，中國人少流血嗎？共產黨不開槍嗎？現在村官、

城管和民警都可以開槍殺人，城裏照樣，孫志剛是被城裏民警殺的，老百姓放棄抵抗的權利，只會把當官的攢得更壞。中國政府沒有因為九十年代知識分子講道理之後，收斂暴力，相反更厲害了，人民受的苦更多了。

「只要你不建立民主政體，這個政權最後一定要濫用暴力的，一定會出暴政，這是必然的，不是說八九年誰激怒鄧小平，只要他是威權的結構，他最後一定要殺人的。」

王軍濤認為，所謂良性互動，未必能達成知識分子的良好願望。

「八九以後知識分子很注意，寫個文章連措詞都怕把他迫到牆角，首先街頭運動誰也不搞了，不要惹惱統治者，連所有行文都非常注意，最後怎樣，政府文明了嗎？跟你良性互動了嗎？就不殺人了嗎？甚麼都沒有，政府越變越壞，一九八九年鄧小平殺人都猶豫再三，現在底層一個民警都可以隨便殺人。你不要以為你講理他就講理，不是這樣子的。

「最後是知識分子解脫自己的良知和社會責任，該出來的不出來，該做政治領袖的不做政治領袖，該領導人民發動和平抗議示威的不發動，去年我寫了幾篇文

章，為違法反對運動辯護，甘地、馬丁路德金都採取過違法方式的，他們堅守和平理性非暴力時他們沒有迴避暴力鎮壓，甘地當時導致多少人流血？馬丁路德金導致多少黑人流血？誰譴責他們了？譴責的都是統治者，然後迫統治者改革，哪有中國那樣，和平請願者被打了，還要指責請願者你是不是把打人的人惹火了？人家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運動，沒有說你要算過民警打人就別上街了，那樣社會還會有進步嗎？

「所以我覺得八九之後的這種反思，導致中國的威權，導致中國的暴政，這就是因為人民解除了反抗的權力。」

八九的開槍和中國的知識界保守的反思，導致絕對的國家權利膨脹

他認為，反映在中國社會、民生各方面，出現三個問題。

「第一、八九之後中國政府為強化絕對優勢，發展是不公平的，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最先嘗到果實的是窮人，在農村廣大的農民得到承包土地，享受了開放改革成果，城裏是甚麼人先呢？是待業青年，從農村回來

的知識青年，他沒有工作，容許他搞個體戶，他們是最早的萬元戶。

「所以八十年代的改革是比較平等的改革，中間沒那麼多腐敗，腐敗一出來就出現的八九運動，老百姓強烈反對。鄧小平、趙紫陽都說，從我們的孩子查起，你現在看共產黨有誰說這個話，為甚麼？因為那時人民有和平請願，可以上街，大家有共識只要你搞腐敗我就可以上街抗議，所以才有八九風潮，但是到我們把這個權利放棄怎麼樣？就是政府的強勢，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少數權貴壟斷發展機會，新增加的機會和財富給他們壟斷了，政府的、社會財產被他們瓜分了，他們又往前走一步，擠壓留給人民不多的財產、土地，還有拆遷。你已經把發展的機會給佔走了，後來又把國營財產瓜分了，又讓工人下崗，農民的土地徵收了，城裏人房產拆了，擠壓他的生存資源，後果就是八九的開槍和中國的知識界保守的反思，導致絕對的國家權力膨脹，有了不公正的發展，權貴有了很大的機會發展自己的利益。

「第二是人民大眾由於沒有比較文明的抗議方式，面臨壓迫就會在底層暴力抵抗，暴力抗暴，如果有文明方式的話，不至於惡化到老百姓要暴力抗暴。不光農

村，後來包括拆遷戶呀，集體抗議，都是非常暴力的，這應該誰負責呢？也是八九後中國的精英，解脱自己發動政治風潮，舉行各種各樣抗議活動，不怕激怒政府、得罪政府的反抗方式，維護社會正義，社會良心義務解脱了之後，導致了政府變本加厲，大眾要用更大的代價，而且還不能解決問題。

「第三是全社會道德文化淪喪，犬儒主義泛濫，為將來的改革造成很大困境。

「八十年代你出來為老百姓伸張正義的時候，大家都會給你喝采，現在的人會不關心，覺得你神經病，賺錢去，搞政治幹嗎，幫着政府的人會說你是不是太激進了？像最近《零八憲章》出來之後呢，很多人就來批評，你是不是太激進了？你要搞革命呢？《零八憲章》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沒有人會覺得是搞革命，你要搞憲政，立憲，怎能説是搞革命？但跑到中國來就變成你要發動革命，為甚麼呢？它是面向社會，改革都只能向政府上奏摺，不能面向社會動員。

「指責八十年代精英太浪漫不切實際的人，我說其實你們的改良夢才是一個玫瑰夢。全世界沒有這樣的民主化改革，沒有一個統治者會自動將權力這樣交出來。」

公安局長管司法　唯靠政改尋出路

他認為維權並不是最好的討價還價方法，現時老百姓遇政府施政缺失或不公，要申訴，第一是上訪，上訪不行就找律師，但關鍵是近年中國越來越多地方，政法委書記是由公安局長兼任。架構上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應該是互相監督互相制衡的，由公安局長當政法委書記，等於由他管檢察院和法院，司法能公正嗎？

政法委書記賭博貪污下獄

這裏補充一下，廣東省紀委，零九年一月向媒體通報了雲浮市委原副書記、政法委書記伍星葵貪污受賄和參與賭博案。還有肇慶市委原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黃平方受賄和參與賭博案。伍星葵已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黃平方已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案情指出，雲浮市委原副書記、政法委書記伍星葵，零四年，在香港某集團董事長張某陪同下，與肇慶市委原副書記黃平方等人乘遊船，在香港公海上豪賭一夜，輸贏多達數十萬元。零三、零四兩年伍星葵又通過高要市原體育局局長馮某，利用網路賭球，先後下注一百五十多萬元，共輸掉五十二萬元。

期間他還分別在廣東多處地方和北京，打麻將賭博，共輸公款七萬多元。結果因貪污受賄和參與賭博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肇慶市委原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黃平方，九七至零六，九年間多次與他人前往香港賭船和澳門的葡京酒店、假日酒店、回力娛樂場所等地，玩百家樂、大小，每次輸贏數額在十萬至三十萬元不等。

零三至零四年間，他還利用到縣市檢查工作機會，與相關人員在轄區內打麻將賭博，涉及金額上萬元。擔任肇慶市委副書記期間收受賄賂人民幣近三百萬、港幣五十萬，有的就是用於參與境內外賭博。

就是這樣質素的人管政法，管司法公正。

所以王軍濤認為，唯有政治改革，走憲政民主才能改變目前困局。

他希望中國的精英分子能早日重拾責任感和社會良心，在有需要時領導有序抗爭，否則人民抗爭只會淪為暴力流血衝突。

「你能逃避流血嗎？今年(零八)老百姓燒了九個縣政府大樓，『六四』十五年後，全國暴力泛濫，每年八萬七千幾起羣體事件，平均五分鐘一起，一般都有暴力衝

突，少流血了嗎？而且這種流血沒結果。八九年如果鄧小平不開槍就沒有流血，結果我們不去指責開槍的，要指責說你當時是不是有話得罪他，好了，九十年代沒有話得罪他吧，大家在屋裏寫個信，都叫激進，只要統治者不高興不接受就叫激進，荒唐！

「好了，你就考慮他能接受，能解決嗎？」

談論國家大事，王軍濤心裏的一團火就燒了起來。

八九年要解決的所有問題更惡化了

零七年包遵信先生病逝，軍濤和海外民運人士在紐約開了一個座談會，國內來了一個學者，他很感慨說：「我今天看到一批歷史人物，八十年代都是我非常神往的一批歷史人物，我今天聽了你們發言後我非常感觸，我在中國搞維權搞了十年，每年都寫一份非常漂亮的報告，十年下來我們這些人房子有了、車有了、維權的好名聲都有了，問題是十年下來他們想解決的問題都更惡化了，沒解決一個問題。」

王軍濤指出，腐敗問題更惡化了，八九年要解決的所有問題更惡化了，當中國的學者知識界想注意和平理性非暴力，想汲取「八九」教訓說以為能做得更好，結果

比「八九」糟得多。

「『八九』被鎮壓之後，至少統治者馬上要搞信訪，你看統治者還幹這個事嗎？他不幹了，那時朱鎔基講我抬一百台棺材，九十九台留給貪官，一口留給自己，今天還有人說這個話嗎？八九年就是被鎮壓，他的結果也比今天好得多。好了，你知識分子不流血，你老百姓流多少血，每年八萬七千多羣體事件，上訪路上多少人，就是一輩子勞教，出來到北京，再送去勞教，一輩子就這麼過了。

「不是說我王軍濤，因為我是反對派才說這個話，我想當官，條件比他們都好，我是七八年北大核子物理專業的學生，團中央十大主席團成員，父親是解放軍高級幹部，七六年保鄧小平坐過二百天牢，甚麼條件不該我當第三梯隊，那時真是改革的黃金時期，我把這些放棄掉，就是因為魏京生審判案，我就知道這種制度會越走越遠，所以決心在民間推動運動解決中國問題。

「不是我當了反對派跟共產黨有仇，我們在那個時候，廣大人民開始享受改革開放的好處的時候，我就知道這個制度要是不改革政治體制，就要出大事的。

「那些一天到晚考慮當權者能接受甚麼的，他們雖

然成功，但他們甚麼都解決不了，所有問題都更惡化了，就講對腐敗的衝擊，是現在的方式對統治者衝擊大，還是八九年對腐敗衝擊大，八九被鎮壓了，對統治者的課上得很深的，後來他們真的採取好多措施反腐敗，但只要政治體制不改革，它就不可能解決，今天統治者還會下甚麼力氣解決甚麼腐敗問題嗎？不會，他沒壓力。他沒有生死存亡的壓力。

「一年兩千兩百萬起信訪，還不包括不許上訪的，法輪功是不許上訪的，只要你說你是法輪功馬上抓起來，也不包括縣以下的，兩千兩百萬起這麼大的數字，八萬五千宗羣體事件，平均五分鐘一件。

「回頭看八九年的意義，十周年時保守主義甚囂塵上，迫學生去檢查，向社會道歉，學生做錯些甚麼？就算學生退一步又怎樣？中國結果怎麼樣？

「你要是講你講道理政府會更講道理，那是瞎扯，因為學生不是不講道理，你不僅要講道理，還一定要講統治者能接受的道理，要這是一個條件的話，統治者要越變越壞，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他批評現在的精英都太保守，包括發起《零八憲章》的人，都不敢發動風潮，就沒有辦法推動轉型，零七年

開始他做了一件事，為革命辯護、為運動辯護、為暴力辯護。

「我不是說這些東西好，我是說從政治進步的角度，這都是無法迴避的課題，你可以不喜歡它但是你沒法繞過它，你繞過它代價更大，但中國精英看不到，因為老百姓是受苦最重的人，他們始終沒有表現出來。零七年六月我提出給很多人罵，說軍濤你完蛋了，你離開中國太久不瞭解中國問題，你看楊佳事件出來，人們才知道，我談的話題。

「其實貧富懸殊，包括老百姓吃不飽飯還不是最大問題，政府濫用暴力才是老百姓最深惡痛絕的，而反抗暴力，尋求安全會是中國追求民主自由的一個很大動力來源。上海楊佳襲警事件和甕安事件就說明這點，我就是要讓受苦最重的人把苦說出來，讓中國有識有志之士知道中國的問題太多，不解決人民不能容忍。下一步就要精英在危機意識下提出方案，《零八憲章》就是做這件事。我現在就寫文章推動《零八憲章》討論。

「我為暴力辯護是為老百姓抗暴權辯護，假如老百姓一直退讓只會把政府攢得越來越壞。」

甕安事件：縣政府沒有做到公共權力為民所用

王軍濤所指的甕安事件，發生於零八年六月廿八日，貧窮落後的貴州省甕安縣城大批居民，因不滿政府處理一名十七歲溺斃少女手法，懷疑別有內情，包圍縣委、縣人民政府和縣公安機關大樓打、砸、燒，上萬羣眾圍觀。結果一百五十人受傷，二百多人被捕，事件受中央高度關注。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也承認地方政府施政有問題，要求汲取教訓。

山東工商學院政治與社會發展學院講師李默海就事件作了詳細分析：「具體說來，甕安六二八事件的『深層次因素』主要表現在：在礦產資源開發、移民搬遷安置、違章建築拆遷、國企改革等工作中，甕安縣政府並沒有做到公共權力為民所用，反而屢屢使部分羣眾合法權益受到侵犯。對此，羣眾心中有怨氣、對政府部門工作表示不滿意也在情理之中，幹羣關係緊張、產生諸多人民內部矛盾就事出必然。而在處置這些人民內部矛盾的過程中，甕安縣的一些幹部，正如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所說：『不僅工作不作為、不到位，而且作風粗暴、工作方法簡單，一出事，就隨意動用警力。』這樣做，

不但導致幹羣關係緊張，而且促使警民關係緊張。這些行政行為表明，甕安縣政府行使公共權力的方式偏重於『消極』方面，熱衷於『懲罰』。不止如此，甕安縣政府在行使公共權力的時候，也沒有貫徹社會交易原則。按照社會交易的原理，甕安縣的民眾向政府繳納稅收，以此換取政府為他們提供人身安全、教育、福利等公共物品和服務。甕安縣政府收了民眾的錢(稅收)，並沒有提供令甕安縣民眾滿意的公共物品和服務。社會治安狀況差就是對此最好的說明：在甕安縣，刑事發案率很高，年發案率在六百至八百起，伴隨着高發案率的卻又是低破案率，僅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甕安縣政府習慣於以『消極』方式行使公共權力，事實上，這種行使方式很難被民眾認為是正當的。也可以說，這種公共權力很難獲得政治學意義上的合法性。由於得不到民眾的認可，暴力所實現的穩定只是一種表面現象，社會猶如一個巨大的火藥桶，一點火星就可能引起爆炸。甕安六二八事件之所以釀成一次有一定規模且行為激烈的羣體性事件，根本原因就在於甕安縣政府合法性資源嚴重不足。不具有合法性的政治統治和政府管理，就很難實現政權的穩固，也很難達到社會的穩定與

和諧。」

問題說得不能更清楚了。

王軍濤指出在金融風暴前的中國房市股市已破產了，而楊佳事件和甕安事件都是在金融風暴之前，甚至在奧運之前，老百姓的憤怒心情，早就和北京想奧運開一個大派對的想法不一樣。

解決社會不穩定因素，先要解決民工身分戶籍問題

每年春節前新聞都可以看到廣東火車站，擠着大批急待回鄉渡歲的民工。東莞大批港、台資工廠關閉，馬上失業的也是他們，王軍濤指出，民工在國內沒身分、沒政治、福利地位的狀況，是中國的亂源。

「中國的一些體制內的學者都說，現在是百分之九十二對百分之八，十三億人中的百分之八，也有一億零四百萬，小半個美國、小半個俄國，小半個日本，你在一億零四百萬人中看當然形勢很好，再看百分之九十二對百分之八的話，是多大的比例呀。」

記：「可是經濟上還是處於一個舒適的狀況。」

王：「那是你看到的一億人嘛，你看那些民工，北

京上海統計它的人口是不算農民工的，城市人口不算這些外來幹粗活的、髒活的、找不到工的，他們都不算，只算大城市固定的，所以才有自我感覺很好的感覺。

「像美國的演算法，允許他們登記失業，容許救濟，像香港他在一個地方住就容許他享受福利、社會保障，上海北京哪有那麼好，它就是兩個階層嘛，當你在北京上海轉，覺得北京上海很好時，你肯定沒有看到那些農民工，幾十萬上百萬農民工對他們視而不見，你把他們算進來的話，你的感覺肯定不是這樣的。就是因為中國有身分制，學者侯文卓在哈佛做訪問學者，研究城鄉差別，比較南非的種族隔離和印度的制度，就認為身分制早就超過這兩種制度，包括我們香港的記者同胞，他們根本沒有看到成千上萬的農民工、流動人口的悲慘生活狀況和水平，沒有把他們當作人來考慮。那些人反正沒有權利，所以他們不能興風作浪，你要接受一個這樣標準的話，對這些人來說他們就永遠是賤民，永遠不是人，我就想香港的記者，你們看上海看北京，除了看街上拿着甚麼皮包，五顏六色那些女孩，也看一看那些農民工，把他們當作一個地方平等來看，你就會知道，在經濟上差距多大，在政治上更是無權，無權到你不把

他們當人看，連狗都不如。

「除了身分制度，我們無形中接受了共產黨很多東西，通過它的宣傳，你別以為你的思想是自由的，只要你願意把農民工，當作跟城裏人平等的中國人，馬上你頭腦上所有中國城市的圖像都變了。

「要是你在美國，人們馬上會非常敏感的問，這個羣體為甚麼你沒有當人看？我們都已經習慣了，從大陸到台灣到香港，甚至到中國訪問的美國人都習慣了，在他們的鏡頭中間那些人是不算人的。

「不管怎樣，是不合理的，最後你要付代價的，他們是人他們最後會反抗的，珠三角倒了那麼多企業，幾十萬的往家鄉走，回到家鄉地已經被分了，靠甚麼維生？城裏又沒就業機會。

「農民工退休歲數是多大？城裏有工作也不給他們了，一般是三十五歲，他們十多廿多歲到城裏來工作，三十五歲離開城裏，沒有勞保、沒有社保，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長期這樣把人分成兩等的話，社會將來能穩定嗎？

「這些人很多幹活之後被挑斷腳根、被打，經常有，就可以不給錢，他們上法庭沒人理，你計算社會穩定，你肯定沒有算這些人流了多少血。」

控告胡錦濤

零六年拿了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現在從事政治學研究。

零五年，附屬《人民日報》的《環球時報》，指王軍濤是台灣特務，王軍濤在美國法院入稟控告《人民日報》，及《人民日報》最高領導人——黨總書記胡錦濤。

馬上北美就有人跟他聯繫，解釋報社收到匿名信，沒查證就發了稿，並謂願意和解，找份北美僑報發一份比較正面的稿，再由國內轉載，算是平反，王軍濤不允，堅持要告。

結果美國法院表示，胡錦濤作為國家領導人獲得豁免，但就受理他對《人民日報》的控告。軍濤這個動作目的是要為自己洗刷污名。在美國打官司需時需錢，目的已達他就收兵而回。

這個動作也讓他回國之路，由不可能變為更不可能。在軍方工作的父親因身分及健康理由不能出來，父子已十五年沒見，媽媽來過美國但不習慣，也放不下在國內其他兒孫，和王軍濤也八年沒見了。

「想也是沒辦法呀！」

軍濤有難我共赴

王軍濤下獄期間，妻子侯曉天也被牽連，先後三次被關進監獄，吃盡苦頭，出來之後還繼續奮勇作戰，不斷向海外發聲，王軍濤就在監內多次絕食，裏應外合，爭取改善獄中待遇，早日獲釋。九四年終於以保外就醫名義赴美。

九七年採訪香港回歸，時間剛好踏入農曆新年，就跟他們夫婦在波士頓唐人街吃了一頓飯。滿桌波士頓龍蝦，大吃大喝之餘，侯曉天平靜的憶述獄中境況，在幾平方米監倉，幾個婦女就這樣擠着，吃喝拉撒睡全在同一範圍，生活條件惡劣，結果很多女性都得了婦女病。

兩個人的事往往一言難盡。



她還開玩笑透露，被監視期間很「識做」，懂得和跟蹤的安全人員充分合作，行着等，走着等，要拐個彎更要等，務必讓人家跟得上，交到差，相反有些學生領袖年少氣盛，不好好合作，讓跟蹤人員吃了苦頭，雙方關係也就緊張起來。

十二年前的歲末寒冬，在異邦的唐人街聽到這樣的笑話，嘴在笑，心是悲酸的。

沒多久這對患難夫妻的婚姻也無法維持。王軍濤已再婚多時，女兒也八歲了。

「兩個人的事往往一言難盡。我們關係還是挺好的。」

為免細節錯漏，文稿寫好後傳給軍濤看了一遍，細心的他替我逐字逐句看了，回郵還補上一句：「希望三十周年時還能見面，但應該在北京，不要再在海外做三十周年採訪了。」

大家祝福。

浦 志 強



我把我的職業和人生理想結合，我很快樂。

「誰都不願意失去自由，但我得儘量做喜歡做和應該做的事，不能為了所謂的『自由』就放棄心靈的堅守，在六四問題上尤其不能隱瞞觀點，哪怕說了真話就可能會『出事』，我也不能太委曲自己。」

浦志強，河北省唐山人，南開大學歷史系畢業，八九民運時是中國政法大學古代法律文獻專業的研究生，是前文吳仁華的學生。從悼念胡耀邦開始直到六四清場，他全程參與八九民運，是最後撤離廣場的幾個學生之一。屠城在即，他許願說只要能活着離開，以後每年的這一天都會來還願。二十年來，除去近兩三年被公安事先控制，每到六月三日他都會如約前來還願。

在六四鎮壓後的清查中，浦志強沒能「提高認識」。他「不自量力」地想承擔責任，「總覺得這麼大事總要有人負責才對，數百萬人異口同聲說上了趙紫陽的當，這不是事實。如果沒人肯為六四負責任，那中國人就太可悲了。」畢業前他寫了一篇「向黨交心」交給學校的組織部門，把自己的幾件事情說清楚，自認為從此跟共產黨再沒任何關係了。運動中的「錯誤」和「反思」後的堅守，讓他畢業時同時得到一紙嚴重警告，也沒能及時找到正式工作。只能到蔬菜批發市場打工，業餘為學校的出版社校對書稿，還短期做過廣告拉贊助。在張祖樺的手下四年期間，他開始一邊自學法律，一邊幫祖樺的朋友們

作些諮詢，一九九五年通過全國律師資格考試後，從一九九七年起註冊成為執業律師。

張祖樺曾是中共中央機關團委書記及共青團中央委員，六四期間因支持學生而被捕撤職。多年來研究中國憲政民主。

說回浦志強，捍衛言論自由成為了他近年來主要做的事。陳桂棣、吳春桃夫婦的著名作品《中國農民調查》，透過對安徽農村的調查敘述了幾件「涉農大案」，暴露了農民的苦難和官員的黑惡，出版後風靡一時。二零零四年一月，作家被曾任臨泉縣委書記的張西德控告誹謗，浦志強義務為他們抗辯，但阜陽中級法院至今還沒有作出判決。

在上海幫助很多老百姓打拆遷官司的鄭恩寵律師，因「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零三年十月被當地法院判刑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一審宣判後，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和《文匯報》上刊出「『桂冠』背後的真相——鄭恩寵其人其事」一文，稱「大庭廣眾面前，鄭恩寵以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樣招搖撞騙；在陰暗角落裏，他卻從事着坑、蒙、騙的勾當」，鄭恩寵認為名譽受損，也委托浦志強幫忙追究責任，但這場官司至今還沒有能立案。

像縣委書記這樣的官員，輕易不敢再告媒體了，因為一旦告了他可能就會很麻煩

知道陳桂棣吃了官司，浦志強主動上門幫忙。

「雖然官司現在還沒能贏下來，但我們畢竟沒有輸啊！不管怎麼說，你看到此後像縣委書記這樣的官員，輕易不敢再告媒體了，因為一旦告了他可能就會很麻煩。作官應當接受老百姓的監督，批評縣委書記的公共政策，書記是不可以告作家誹謗的。」

記：「案子可以這樣拖着不判嗎？」

浦：「官司拖五年當然不應該了，法律規定六個月就該判下來。但這場官司過於引人矚目，法院想必遇到了難處，他們也有苦衷：判我們輸國家很丟臉，人家會問難道老百姓批評書記不可以嗎？可判我們贏黨又不情願，今天你批評縣委書記不算犯法，明天他要是批評總書記該怎麼辦呢？從上到下的書記很多，共同點是都怕老百姓批評。法官居中裁判應當是中立的，但所有書記都能管法院，法院又管着法官，一遇到書記的官司，只要這位書記還沒被抓起來，本地法官就只能判書記贏，要不就只好拖着。我現在覺得張西德不是臨泉最壞的書記，他前後的書記裏一定有比他壞的。問題是他當了原

告出名了，別的書記比他壞但外邊人不知道。你知道阜陽好多出名的書記後來出事了，張西德這麼出名還沒出事，說明他真不一定太壞。話又說回來，如果不是張西德告陳桂棣誹謗，我們想告他也告不成。」

記：「為甚麼？」

浦：「賀衛方說過共產黨沒有取得法人身分，各級黨委沒有一個在民政部門註冊過，黨委沒資格當被告，想告書記也就告不成了。張西德是臨泉的書記，全縣數他官大，但好多命令通過政府出台，有人想告官只能告政府和縣長，沒機會告縣委和書記。說到陳桂棣的作品，我覺得寫書印出來都要給人看，得允許大家發表意見，不符合事實甚至誹謗了別人，張西德還是胡錦濤都可以批判，受害人也可以告狀。但是縣委書記因為政策受到批評涉及到自己，個人便打官司告人家侵犯名譽，這就成問題了。不過張西德告陳桂棣夫婦誹謗，我們就有機會探討書記能不能告別人誹謗了。」

哪怕是十年我也要把他告下來

鄭恩寵被冤枉判刑之日，還被《解放日報》和《文匯報》辱罵為敗類，浦志強受托告對方誹謗。如今鄭恩寵

坐滿刑期出獄兩三年了，還經常被警方監視、騷擾和控制，沒有真正獲得自由。

「他讓我幫他處理這件官司，但我至今還沒有見過他。他那邊電話老打不通，我的電話又總被監聽，常常是他好不容易打通了，沒過多久北京警察就來問我是不是跟上海甚麼人通電話啦？有一回他悄悄告訴我最近要來北京，但後來沒來成是因為被堵在家裏。比較起來上海比北京做得過份，他們控制得比北京要嚴。記得前年我還跟沙葉新先生開玩笑，說你們上海學者要想聚一塊兒吃頓飯談事兒，得分頭跑到北京操辦，因為在上海聚不成，吃頓飯人多了都會有人管。」

浦志強幫鄭恩寵，主要控告《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及文章作者，但至今仍未立案。

「這兩家報紙在鄭恩寵定罪當天發表文章，『「桂冠」背後的真相——鄭恩寵其人其事』，文章由楊金志和陳斌兩位記者聯合署名，他們供職於新華社上海分社和解放日報社，文章中的事實不少是虛假的，評論口氣也很霸道，多處使用了侮辱鄭律師人格的語言。鄭律師坐牢一年多，中間讓夫人來北京找我，要我幫他起訴報社和記者侵害名譽權。我受理後派人到國家圖書館把報紙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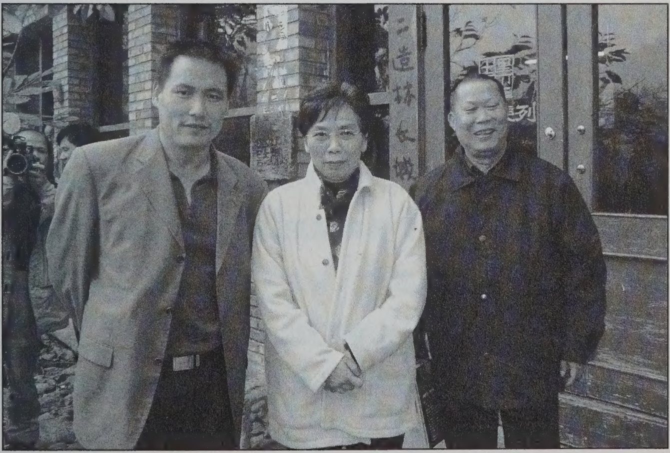
印下來，準備好起訴證據，寫好狀子拿到北京海淀法院。但法院要我們去上海告，理由是原被告都在上海，其實按最高法院司法解釋，向侵權結果發生地法院起訴是可以的。最後我沒去上海告狀，而是每隔兩年發一次公證給報社和記者，催促他們賠禮道歉，這樣就能保住訴訟時效。我不去上海是因為鄭恩寵告《解放日報》上海法院不會受理，再說上海按訴訟請求數額收訴訟費，北京則不論告多少都只收八十元，在北京打官司還不用跑上海花旅費。我相信社會正變得開放起來，法治環境會越來越好，只要保住訴訟時效，過十年我也能把他們告下來。我這麼做是為了讓記者知道，亂寫文章哪怕是奉黨的命令，白紙黑字留在那裏，你自己最終是要付代價的。」

反右五十年，幫章詒和跟戴煌打官司收五十元，一年一塊

二零零七年是中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浦志強再度出擊控告新聞出版總署，因為他們把章詒和的《伶人往事》和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經歷》兩書查禁，但訴訟同樣沒能獲法院受理。

「行政機關禁書決定損害作者權利，本身是一個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但法院無力審理公民就憲法權利受損提起的訴訟。

「為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打官司沒哪家法院敢受理，在黨的領導下它們無法審理。但我們迴避了訴請保護憲法權利這個角度，沒有告出版自由受損，而是告作家的著作權受禁書決定侵害。著作權是公民的民事權利，包括人身權和財產權，比方說我寫書出版這總是個榮譽吧，出版了我能取得版稅又是一項財產權利。新聞出版總署禁止戴煌和章詒和先生的書出版，顯然讓作者既無法出書也無從收取版稅。所以禁書令從憲法角



浦志強與章詒和、包遵信合照：總署官員此後禁書氣焰不那麼囂張了。

度看侵犯了公民的創作自由和出版自由，從民法角度說則損害了作者的著作權。」

記：「就拐一個彎去告？」

浦：「對呀，我們這樣設計案法院就應該受理。但法院知道我的目的，反右和文革對知識分子摧殘至深，這個話題在內地諱莫如深。我是一個學歷史出身的律師，這些年來最上心的就是這類案子，早就想找機會圍繞紀念反右做事，所以官司來得正是時候。當時我決定每件官司只收五十元律師費，反右五十周年了我索性每年收一塊錢！我還真跟兩位先生簽了合同，按照司法局要求辦齊所有手續，章詒和先生真把五十塊錢付給了我。雖然官司沒有受理，但總署官員此後禁書氣焰不那麼囂張了。圈內人都有印象，以前禁書恨不得敲鑼打鼓好像自己很有理，編輯和出版社經理被罵得狗血淋頭服服貼貼，但章詒和先生發難『單挑』鄔書林，禁書事件一捅就鬧大了，結果鄔書林聲名狼藉，往後禁書就悄悄地禁了。」

記：「因為道理不在他？」

浦：「更主要是做壞事形象太壞，有空缺也輪不上髒人升官，龍新民下台了，但禁書有功的鄔書林沒當上

署長。至於禁書沒道理和違反憲法，相信總署裏上班的誰都比我清楚。現在官場太市儈了，沒人願意為原則犧牲前程，也沒人樂意為陋規砸掉飯碗，除非出賣良知能馬上升官，或者拒絕作惡會被立即罷官，損人不利己的事沒人肯做。惹惱士林臭名遠揚連累祖宗丟臉，還讓上邊兒覺得名聲太臭不能提拔。總署禁書一改從前敲鑼打鼓，變得悄無聲息不敢聲張，有官場邏輯主導——胡溫不會因為鄔書林出賣良心幹髒活兒，就不顧形象讓他當署長，這局面大家都看透了。我記得《南華早報》最早披露了禁書醜聞，隨後港台和西方媒體跟上，國內網站上羣情激憤。一個星期五的晚上聲明發到網上，立即就鋪天蓋地不可收拾，星期一就已經覆水難收了。」

記：「你是策略性做這個事吧？」

浦：「有時候我是一個會做事的律師。」

保障公民創作自由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二日，浦志強又因電影《蘋果》被禁映，代理製片單位起訴了國家廣電總局。

「你知道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吧？我認為《蘋果》比《色戒》好得多也深刻得多。電影的製片人叫方勵，導演

名叫李玉。廣電總局禁得沒道理又沒規矩，連個書面文件都沒有，打電話就把正在公映的電影斃了，搞得製片人要上網查閱總局處罰決定。我受理這個案件，是考慮到電影作為文化產品本身是商品，對這個領域的管理涉及公民創作自由的維護，既要保障創作自由，又必須對生產和發行進行管理，必須保護特定人羣的權益，避免對某些人構成傷害。所以，政府不僅需要有規矩，而且得有章法。」

作為法律工作者，他希望把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法律化，用法律手段處理，而法律問題又尚待專業化，有提高水準的空間。

「把職業和人生理想結合在一起，我很快樂。」

劉曉波被捕早有先兆

作為《零八憲章》首批簽署人之一，浦志強跟被捕的劉曉波亦師亦友，大家平時經常聚會，他透露抓捕劉曉波早有先兆。

「抓劉曉波是因為他太有影響力了，不僅有感召力還能牽頭做事，《零八憲章》沒有劉曉波就沒有可能搞得起來，官方擔心『六四』二十周年還有系列紀念，局面一

旦出現便難以控制。聽說警方曾跟他打過招呼，說寫寫時評說點兒甚麼都沒問題，但不要搞羣體活動，《零八憲章》上那麼多人聯署，當局當然不會容忍劉曉波。官方也許覺得既然早晚要抓，只要一抓總會被人批評，還不如早點下手以免出更多事，這個不要臉的政權就是一切以實用為宗旨。」

浦志強零六年也曾與安全部官員談話，對方問他：「你能不能透過正常渠道發表意見？」

浦志強答：「我的正當渠道就是有話直說，言論自由本身包括尊重人胡說的權利，當然我會對我的話負責。

「我和當局相處得還算和諧，彼此瞭解話早已說盡了。我要考慮某些事做還是不做，有些話說還是不說，對方也會考慮對我到底抓還是不抓。再跟我溝通思想沒必要了，大家都沒這個工夫。」

我聽到了槍聲，我也看到了血，我不是小孩子，別跟我說六四不是屠殺。

浦志強於天津南開大學讀歷史系，喜歡司馬遷的《史記》，一九八三年反精神污染運動開始時，學校對學

生不能讀甚麼書都有規定，大家非常反感，逐漸地他決定自己不入黨，性格使他走上了偏執的路。

「讀歷史的人本能地反感信口雌黃，我作律師最反感虛假陳述。我可以不說真話，因為真話可能對委托人不利，但不能有意講假話。」

南開大學畢業後，浦志強教過兩年書，一九八八年考上中國政法大學主修古代漢語。南開大學歷史系三位老師王連升、劉澤華和張國剛，分別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和隋唐史，對學生影響很大。

「一年級，王連升老師就告訴我們，對老師講的不必全信，也要經過懷疑和論證，結論才是你自己的；書上的也不能全信，要經過分析和思考，因為那是編者和作者的觀點。想學懂歷史就要看原著，比如《史記》和《資治通鑒》，從史料出發得出結論。老師的和書上的都可以懷疑，這對剛升入大學的學生來說太新鮮了，作學問要學會懷疑和不能盲從，這種觀念讓我受益匪淺。我天性遇事不輕易低頭，不容易放棄想法，但是只要能說服自己，心服之後便能口服，心服口服後就會認帳。一個觀點讓我接受，得讓我自己考慮清楚。六四後公安局來大學調查，言語間說六四死人不多，是『平暴』不是屠

殺。我當場說你們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小孩子不需要告訴我發生了甚麼，六四怎麼回事我經歷了我知道，我聽到了槍聲也看到了鮮血，再跟我探討這個沒意義，還是直說到底要甚麼吧。事實上，無論對學校還是對公安我都沒低頭，沒打算按要求寫反思蒙混過關，我的底氣主要來自南開讀書期間王連升等老師的教誨。當然，校方的保護和警方人士的寬容，也使我有信心堅持底線，那時各界對六四參與者很同情，大家都參與了，事情過去還不久。

「八四年反精神污染後，我在系學生會裏作一個小幹部，有一天系裏團總支書記建議我寫一份入黨申請書『積極要求進步』，參加入黨積極分子的小組活動。他其實是對我好，因為歷史系學生黨員少，黨票到手畢業分配時就容易找到好工作。我請這位老師給我一個星期時間考慮，隨後真就去圖書館東看西看，過後告訴這位徐老師實在對不起，我覺得共產主義不可能實現，那個學說是騙人的，我這輩子不打算入黨。」

豐衣足食的豬圈

「對我來講我沒有甚麼可以失去的。我一直都一無

所有。」

記：「自由呢？」

浦：「自由本來就不屬於我們，誰能說清楚我們有甚麼自由？因報道孫志剛和非典被廣州當局陷害的《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出獄後寫道，我們所謂的自由不過是一間『豐衣足食的豬圈』，我覺得這句話相當到位，現實就是這麼回事。

「八六年我畢業後分配到一家中專學校任教，平常天馬行空學生反映講課效果不錯。半年後就到了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中共又開始反對自由化了，學校的上級單位河北省物資局要組織系統內各單位搞一場演講比賽。校長讓我代表學校參加比賽，我說好啊但題目呢？他說主題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說：『對不起了，我反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主張反對自由化，我講不了這個題目，還是另找別人吧。』

「六四期間我的認識水準不能跟吳仁華等老師們相比，但與本科生還是有所不同，因為年齡比他們大兩三歲，唸大學有過一番思考。現在看來當時還是幼稚和淺薄的，我們只是籠統意識到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再深問



八九運動時的浦志強

究竟甚麼是民主，我並不清楚。為說清六四期間幾件事，我在九零年十月份寫了篇『向黨交心』，交給學校黨委組織部，自己馬上覺得渾身清爽，認為此生總算跟共產黨說清楚了，再沒甚麼關係了。」

我通過這種行為實踐和維護自己的權利

九七年當律師至今，浦志強有興趣承辦與言論自由有關的案件，除天性好說，「嘴上沒有把門的」，主要是受到胡平先生著作的影響。七十年代初胡平寫的「論言論自由」，發表在民主時期的民刊《沃土》雜誌上，一九八六年分兩次刊登在湖北省辦的雜誌《青年論壇》上，九六年浦志強認真讀了，啟發和衝擊非常強，此後便自覺地去做跟言論自由有關的事。

「如果要問六四經歷對我有甚麼影響，結論就是：言論自由是基本人權，溫飽問題解決了，但文章不能正常發表，有關採訪常常無法刊登，言論自由受限制。代

理維護言論自由的案件，既是保護委托人的權利，也是實現自己的權利，性格決定了我不可能在保障陳桂棣、章詒和等人創作自由時，自己突然不敢説話，辦案不過是我的表達方式，公開説案件同樣也是，我目的在於實踐和維護自己的表達自由權利。

「現在的共產黨不好意思説就沒有出版自由，那就要通過個案來明確和落實這種憲法權利。我在法庭上講過，法院應當用判決告訴世人中國憲法裏有關保護言論自由的條文，究竟是寫在紙上還是寫在衞生紙上。假如真有言論自由那再好不過了，要是真的沒有那有種你就直截了當説沒有，否則就依法好好判案，這既是法官的本分，也是法律對公民的承諾。哪怕憲法就是一張空頭支票，我今天也要認真要求兑付！」

要是沒有六四經歷，他對言論自由和人權意識可能不會那麼強烈，因為六四之後對人權、言論自由侵害壓制得非常嚴重，很多人去賺錢了，不願意再想這個問題。

我們所有人對今天中國成為這樣子都有責任

「最近幾年來我更多想到應該懺悔。二十周年過去

了，原來我們要求民主自由和法治，要推進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要實現現代化的同時也實現民主化，但當時很多概念是模糊的。二十年來，政治體制改革被偷換成人事制度改革，改來改去庸官多如牛毛腐敗積重難返，這種局面令人憂慮。鄧小平讓大家都去賺錢其他事少想，不受監督的政府發育得無比強大，民間社會卻極度萎縮。當年我們才二十多歲風華正茂，不欠這個社會甚麼，可以說醜惡源於共產黨的腐敗和專制，但現在六四時的學生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和中堅，從廣場上走到今天大都小有成就，做學問的當上了博導和校長，做生意的成了億萬富翁，做官的做到了市長，作法官的做到了高級法院的院長，同行裏成功律師賺得腦滿腸肥，五十歲出頭的政治局常委，其實比我們也大不了幾歲。」

記：「李克強。」

浦：「六四這代人正逐漸掌控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命脈，我突然發現自己失去了批評的資格——血氣方剛時可以講腐敗是共產黨造成的，但現在的腐敗我們其實也有份，我們都在推波助瀾都在設法腐敗，觸目驚心的貪贓枉法、買官賣官、行賄受賄、傷風敗俗，有哪件沒有這代人的身影？還能心安理得地都栽到

共產黨頭上嗎？所以，我們應該懺悔！」

對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和國內很多知識分子，他同樣作出了尖刻批評。

「二十年來，流亡海外的朋友們做了些甚麼？曾經坐擁巨大的道義資源，但除了勾心鬥角聲名狼藉，基本上一事無成！問題是我們這些苟活在國內的弟兄們，也沒能為底層的老百姓做過甚麼——除了專研究底層人士的詩人廖亦武，和他的同道！當年那麼多普通人捲入八九民運，是他們在十里長街以血肉之軀抵擋了槍林彈雨。在他們中間有遇難的有坐牢的，只為扔幾塊磚頭燒兩輛軍車，便被判重刑甚至死刑，僥倖活下來終於出來了，但沒受到過系統教育不少人妻離子散，除了頭上一頂『暴徒』的帽子，就業無路、賺錢無門大多窮困潦倒，心中充滿悔恨和對社會的敵意與無奈。現實是政府不管精英不顧，就連當年受他們錯愛的學生，也常常將其當成社會包袱。遍尋連篇累牘那麼多的反思與回味，妙語連珠除了給自己塗脂抹粉，有幾人想起過這些人該怎麼度過餘生！崔健在一首歌裏曾經唱道，『過去的理想如今變成工具了』，真真是入木三分令人無地自容！以前說知難行易，現在是知易行難！簡單道理誰都清楚，但

未必有人身體力行。明知道官方兜售那一套全是假的，但機關裏衙門內，多少人在為五斗米折腰，天天落實三個代表，天天貫徹科學發展觀，一方面瘋狂加強執政能力，一方面南轅北轍構建和諧！思想上的強人不少，行動上的懦夫更多，具有批判意識的知識分子，實在是少得可憐！我有時候想，當年少不更事誤以為有經天緯地之才，幻想民主會在某一個早上光照神州，現在人到中年了，早已不那麼好高騖遠，既然除了謀生沒機會驚天動地，也不再指望真能感天動地，我倒願意始於足下把蠅頭小事一件件做來——索性放下身段去找那些『暴徒』，低頭跟這些兄弟姐妹們說一聲對不起了，告訴他們我們早就該來，乞求他們接受這羣人遲到的歉意，再幫他們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我相信這能為化解瀰漫的戾氣貢獻綿薄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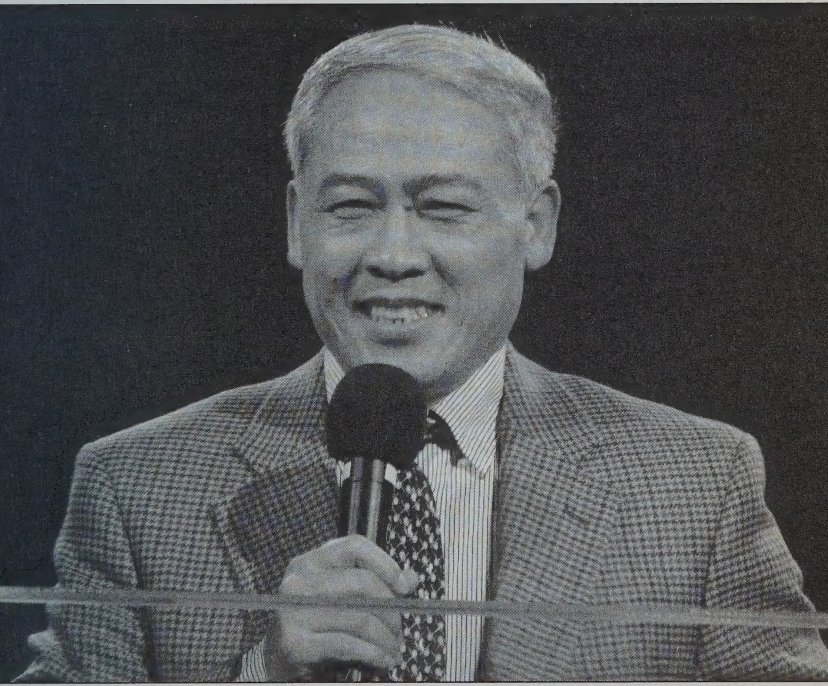
隆胸產品奧美定PAAG事件，有受害人委托浦志強代表她維權，後來產品被取締了，但受害者權利卻沒有受到實際保護，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因受賄被判死刑，但維權行動受到法院、衛生局、藥監局、工商局多方掣肘，律師努力極為艱難，實際成果少之又少。

「三鹿毒奶粉的事情也是一樣，公共利益沒人關

心，所以我認為改變社會的努力要慢慢來，一步一步紮紮實實往前走。二十周年後的今天，除了回顧過去還要反思能做甚麼。」

浦志強是一九六五年生的，有意思的是，搜集資料過程中，跟一位比他小一年，由國內出來，也目擊過六四的留美知識分子談，他主動提出的觀點，幾乎和浦志強一模一樣。這位朋友指出，大批留美精英回國，有很多還是因六四事件取得居留權的，現在都在國內商界馳騁，當行政總裁的大有人在，國內人才不缺，但誰要指責體制貪污腐敗的，都應先看看鏡子，每個人都是社會的組成部分，無法獨善其身。

遠 志 明



中國的發達崛起，沒有信仰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個人的心靈不好，他一生都好不了，同樣，一個民族心靈不好，那個民族也好不了。不管他有多少錢，不管他多強大。」

遠志明，五十四歲，北京人，中央電視台製作六集紀錄片《河殤》第六集撰稿人，六四時是人民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六四後躲藏了個半月，經香港出逃，九一年在美國受洗成為基督徒，信仰令這位無神論的共產黨員、跟太太一吵架就摔東西剪東西的脾氣男，變成全職傳道人，現時是美國三藩市「神州傳播協會」總編導，以心救國。

八八年，中央電視台製作六集紀錄片《河殤》，引起國內外巨大迴響，第一集《尋夢》，以黃土文明為題探討中國政治、文化局限性，到最後一集《蔚藍色》，指黃河終於流入大海，和西方文明匯流。紀錄片表達了對西方民主文明的嚮往，被認為是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導。

第六集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黃河來到了偉大而痛苦的入海口，滾滾千里泥沙，將在這裏沉積為新大陸。洶湧澎湃的海浪，將在這裏同黃河相碰撞。黃河必須消除它對大海的恐懼。黃河必須保持來自高原的百折不撓的意志與衝動。生命之水來自大海，流歸大海。千年孤獨之後的黃河，終於看到了蔚藍色的大海。」

撰稿人遠志明沒想到，一年後的自己，也要和黃河一樣，奔流入海。

八十年代初一舉成名

遠志明一九五五年出生於北京，但七、八歲就回到河北農村老家生活了差不多十年，後來又回到北京參軍，前後當了十二年兵，從戰士班長、排長、副指導員然後當師部的副幹事。當兵期間自學馬列主義，自學高考，八三年就考上了人民大學哲學系研究生。

「我很關心改革開放，發表了很多文章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文匯報》，探討改革問題，一年之內發了幾十篇，都是在中國最好的報刊雜誌，第一流的報刊雜誌連續發表了幾十篇文章，算是一舉成名，八一、八二年就發表了。八三年上人民大學，一直參加改革開放研究工作，包括跟國家體改所，為陳一諮承擔他們一些研究項目。當時我們人民大學也有一個國家體制改革研究會，我好像是副會長，然後跟體改所有一些聯繫。後來參與《河殤》創作，其實我參與不多，只參與最後一集，第六集《蔚藍色》的寫作。但是也感謝上帝的啟示，因為是最後一集，黃河要流入大海，中國要走向世界，我執筆的也是最後一段，好像有象徵性的，象徵我們後來真的要走出中國，走入世界。」

八九民運，開始時遠志明也沒想到會捲入，只是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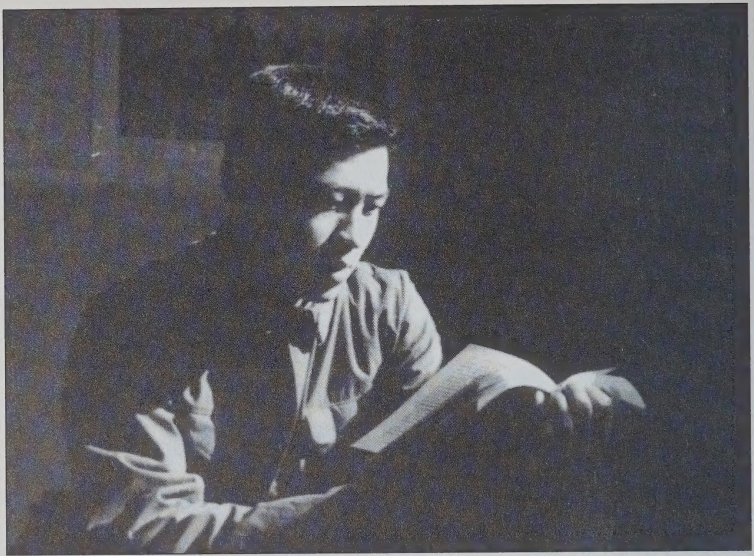
着一股感動，愛國的熱情，覺得應把心裏話說出來，所以支持學生們上街。

當時他正在讀博士研究生，之前讀了兩年碩士，沒經過考試就提前一年轉成博士生，八九年應該答辯即將畢業，論文都寫得差不多了，結果發生了六四事件。人生路向徹底改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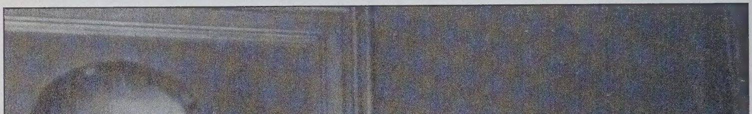
六四前他還有一個職務，就是在中央團校，也叫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做老師。

記：「你是黨員嗎？」

遠：「那當然啦，我還是黨支部副書記呢。我也是哲學系研究生班的黨支部副書記。你知道中央團校的名譽校長就是胡耀邦。我在團校時就發生六四，其實我本人就是憑着道義上的感動去支持，我不是搞政治的人，我不想搞政治，也不會搞政治，我們是文化人，只是出於對國家關心，受同學赤子之心的感動，絕食嘛，我們就更同情他們。我們很對不起他們，自己沒有到前線去，有人說是黑手，其實連黑手都說不上，就是一份同情。我們成立了北京知識界聯合會，主要發起人嚴家祺、包遵信，事過之後我被通緝，六月五日離開北京，在國內東躲西藏差不多兩個月，之後逃到香港。」



從軍自學，八三年考上人民大學哲學系研究生。



《河殤》時期的遠志明，已文名滿京城了。

《河殤》這些觀點，中國都接納了，而且比《河殤》更要前進

其實民運中遠志明角色並不算重，但仍被列入通緝名單，主要因為他是北京知識界聯合會骨幹分子，連他在內，《河殤》幾個作者都被通緝了，其他的還有主要撰稿人蘇曉康、王魯湘、謝選駿、張鋼，共五人。

「這和《河殤》也有關係，不光是六四。現在我們四個都出來了，在美國。王魯湘在國內，在鳳凰衛視。可能政府認為我們是黑手，因為《河殤》是宣傳改革開放批判中國文化的，對現實有很大挑戰，當然現在回過頭看，《河殤》這些觀點，中國都接納了，而且比《河殤》更要前進，起碼在經濟上吧。」

殺人啦，殺人啦

記：「你能不能談六四當天晚上的事？」

遠：「我當天晚上不在廣場，我在家聽到槍聲，我家離公主墳不遠，離軍事博物館那邊不遠，在中央團校院子裏聽到了槍聲、喊叫聲，聽到了學生們尖叫聲。我就跟我一個同學騎自行車趕去看，我女兒那時很小，太太留在家看女兒，她不知道，都睡覺了，我們到了長安

街看到了那個場面，一些市民在擋軍車，但是擋不住，軍車已經過去了，地上也有屍體，反正就慘不忍睹吧，我們特別震驚，好像做噩夢一樣，我們就騎着自行車回來。我那個同學本來是個沉默寡言、特別安靜的一個人，可是那天他一邊騎自行車，一邊大聲喊：『殺人了，殺人了！』我印象很深。回到家一夜都沒睡覺，把我太太叫醒，她開始不相信，說：『不會吧，不會吧。』站到院子還能偶然聽到槍聲，她才相信。第二天我就藏起來了。

你們別鬧了，別鬧了，他們會動真的

記：「你那麼快就覺得自己會有危險？」

遠：「對，我們這些人有個共識，只要軍隊一開槍，我們必須逃走，如果不開槍，表示可以和平解決問題，如果開槍，就表示不和平了，開始抓，一定要抓，所以要跑。」

記：「其實你當過軍人，以你的網絡、你的直覺，在之前有沒有想過會要走這一步？」

遠：「沒有嘛，我們兄弟都想得比較善良，我們都覺得政府不會開槍，打自己的學生，我們在軍隊受的教

育也是要愛民，都沒有想到。那時我爸爸倒是到北京來勸我們說：『你們別鬧了，別鬧了，他們會動真的！』他是老人家嘛，我們年青人都不聽他的，還說：『你都是老腦筋的，這是甚麼時代了？不會那樣幹了。』後來真的，我爸爸是對的。人的罪呀，都是罪呀。」

逃亡過程有驚沒險，事後看來，遠志明仍很感謝神的保守，一步一步都有人幫助，細節他不方便談，反正到哪個地方都有人幫助，都是素不相識的人。

「都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們都很熱心，其實人心所向嘛，大家都同情這些學生，我藏了幾個地方，最後從南方的廣州坐船到香港。」

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

流亡生涯，令幾位學生、學者，成為了基督徒，包括絕食團副總指揮張伯笠，當了牧師，他寫了一本書，叫《逃離中國》，十分好看。遠志明也當了全職傳道人。

信主的經過，遠志明在網站chinasoul有很詳細的敘述。

「我講道的十二個系列，第一個『從流亡到故鄉』，講我信主的經過，故鄉就是心靈的故鄉。其實出來流亡最

辛苦的不是身體的流亡，最痛苦的是心靈的流亡，沒有家，中國不要我們了，而其他國家又不是自己的國家，總有飄流的心態，很苦呀。當時我說了一句話：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雖然我們自由了，像鳥一樣，但是卻沒有落腳的地方，你說多累多苦。當時我拿的是法國難民護照，有些地方不接受，在日本機場就曾被扣了很久，因為他們沒見過這種法國護照，所以當時心裏特別酸痛，覺得本來是中國人但變成了沒人要的人，那種感覺。」

「然後我在巴黎難民營遇到一位台灣牧師，當時我跟他辯論，我不同意有上帝。我說：『如果有上帝，怎麼有六四這種事情發生呢？祂的公義在哪裏？』雖然我們辯論，但他留給我《聖經》，我回家還是開始看，看的時候挺受震撼的。在巴黎沒信，到普林斯頓做訪問學者才真正信。當時我周圍有些基督徒，他們有團契，有教會，我跟他們生活在一起，慢慢的，發現他們真的有上帝的愛在中間，生命不一樣。」

熱淚不洗家國怨

流亡亦讓他失去了父親，九零年四、五月間，在紐約打電話回家才知道，患肺癌的父親已經過世。

「太太說：『爸爸臨死之前也說不讓你知道。』我當時非常非常難過，因為我是長子嘛，長子在我們農村的風俗，就是要打幡送終的，但是我卻不能回去，我也沒有向政府提要求。那時已經過去了，我父親已經埋了，他們都瞞着我，後來給我寄來照片，我的一個堂兄，端了一個盤子，盤子上放了我應該穿的孝服，我應該戴的白帽子，說明我還在送葬。哎，反正當時很痛苦，夜裏睡不着覺，那時我還不是基督徒，我到紐約一個天主教堂，買了一個蠟燭，點着了跪着禱告，不知甚麼是禱告，默默的唸着，然後宿舍同事還給我送了一大綑白花，我就把爸爸的照片，和在巴黎買的一幅耶穌掛十字架像，放在壇上，我又寫了四句：『熱淚不洗家國怨，至情如斯哀幾堪，縱然古今無孝子，當有長歌天外來。』然後哭呀哭呀。那時就預示有一首歌會由天上來，那時我還未受洗，但已『通神』了。那時是九零年的五、六月份，我爸爸是四月廿八日去世的。」

遠志明相信，父親的病情，是因長子六四後出逃擔驚受怕而加劇的，流亡又令他被迫和妻女分離，真的是國仇家恨集心頭。

但禱告和信仰讓他慢慢開始接受了自己驕傲、人人

有罪的本相。

「人類的驕傲導致瞎眼，瞎眼導致仇恨，仇恨導致災難。」

當他學會慢慢將仇恨的鐵鍊放下時，很奇妙地，跟「鄧小平、李鵬就一下子擺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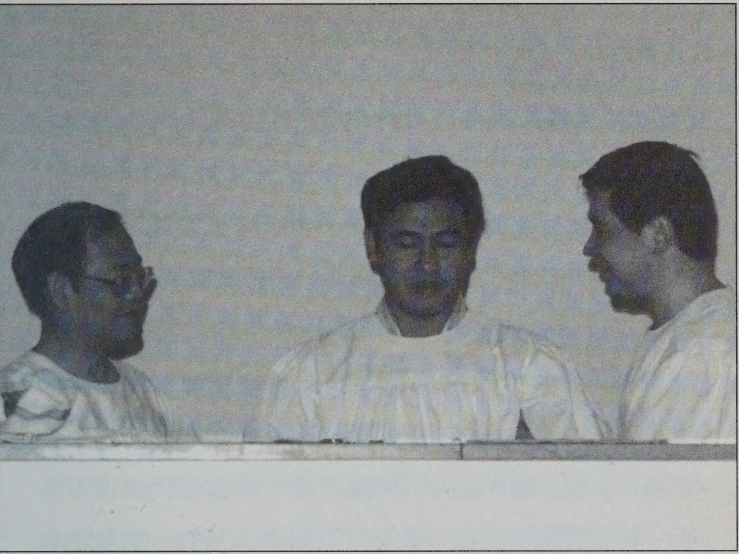
「更奇妙的是甚麼呢，九一年的四月廿八日，同一天，我爸的忌日，我受洗了，是神蹟了，因為普林斯頓的教會，每年只有兩次施洗，牧師問我要不要春天受洗，我說好，他就通知我四月廿八日，這件事好神奇呀。」

我差點就妻離女散，女兒就會在單親家庭長大了

幾經辛苦太太和女兒九一年九月來到美國團聚。兩口子同樣好強，以往在北京吵得天昏地暗，瀕臨離婚，大家心裏也明白，太太來美國之後，長輩不在身邊，離婚就更理所必然。但到了美國之後，太太發現以前這個兇惡男有了很大改變，慢慢受感動也信了主。

「我差點就妻離女散，女兒就會在單親家庭長大了，但六四讓我看到人的本相，讓我變成新的人。」

信仰讓倦飛的麻雀找到了心靈落腳地，找到了踏實



父親逝世一年後，遠志明受洗。



我差點就妻離女散，女兒就會在單親家庭長大。

的感覺，遠志明當回了老本行，以福音紀錄片影響神州大地。

「從流亡到故鄉是第一講，介紹信主經過，第二、第三講就介紹我為甚麼唸神學院，為甚麼拍福音電視紀錄片，福音電視紀錄片第一個是《神州》，有點像《河殤》的續集，《河殤》是講五千年歷史，從政治文化角度來講，而《神州》是從信仰角度講。《河殤》結尾是黃河流向大海，yellow進入blue，兩種文明。蔚藍色代表西方文明，後來我到了美國，我做了基督徒才發現，蔚藍色其實不是大海的顏色，蔚藍色是天空的顏色，如果天上有烏雲的時候，大海就不是藍的，是灰色的，我才意識到真正的文明是來自天上，來自基督教。我最初寫了一本書，《神州懺悔錄》，之後改編成了紀錄片，最後一集還是用《蔚藍色》，用《河殤》最後一集的名字。」

記：「那你侵犯自己的版權呀！」

遠：「沒有問題，哈哈。但蔚藍色就不一樣，是指天上的光。出來之後影響很大，在國內不能公開放，但翻製非常多，私底下的流傳。因為VCD在國內翻製非常方便，在國內沒版權，也沒有辦法有版權。我們也樂意這樣，就是為了傳播，感謝神，傳得非常廣，那一代的

知識分子都看了，基督徒都看了。我記得當年《河殤》的導演跟我講，這片子能改變我們中國人的價值觀，就是我們以前以為對的，現在發現是錯的，以前以為是美的，現在發現是醜的，原來以為是義，現在發現是罪。比方說關公、諸葛亮，我們以為是英雄，現在才知道是自相殘殺，中國人殺中國人是甚麼英雄呀？

「我們佩服諸葛亮有智慧，現在叫詭詐。還有《孫子兵法》，我們說《孫子兵法》太偉大了，其實《孫子兵法》內容全是怎去殺人，怎去坑人、騙人，全是那套東西。現在中國人還用那套東西來做他們的價值觀，很可憐。沒有誠信，沒有愛，沒有饒恕。《神州》這個片子就是用上帝的愛，來看中國五千年歷史，發覺這五千年歷史中，充滿了罪惡，我們是需要懺悔的。光反省還不夠，懺悔跟反省有很大不同，反省就是我哪裏很錯了，我以後要做對，要做好，策略上的考慮。懺悔是說，我是個罪人，我很壞，不是我做錯了，而是我本性很壞。中國人沒有懺悔過，劉再復寫過一篇文章，說中國人不懂懺悔，總是把壞事推給別人，我是好的，我大不了是糊塗，做錯點事，但我是好人，他們是壞人。我信了耶穌才知道人人都有罪，都不配上帝的榮耀、上帝的愛。」

遠志明拍的第二部福音紀錄片叫《十字架》，共四集，每集一小時，影響也很大，已翻成十六國語言，還剛獲選為耶魯大學宗教與全球化課程教材。上耶魯網站也能看到《十字架》的片段，片子真實紀錄了中國基督徒五十年來的發展，所受的逼迫、在逼迫中的和平忍耐和不放棄、如何活出基督的愛，為中國禱告。

開始講道，就被發現，送上飛機

為拍這個片子，遠志明前後冒險回過中國差不多十次。

「感謝上帝，中國政府沒發現我，我用美國護照，用了一個新名字，但是最後一次被他們發現，在上海他們把我送上飛機，送回來，是零三年，好像是。就再回不去了。」

在祖國剛開始時他很少講道，只是探訪 ，後來有點放鬆，開始講道，就被發現，送上飛機，至今都沒法再回去了。

最近兩三年他開始拍第三部，叫《福音》的紀錄片，講述福音內容。第四部現在拍的叫《彼岸》，講海外中國人對信仰探索追求，十集準備零九年拍好。

不用別人說，他們自己都知道自己的心不好

「我做這些目標觀眾都是華人，當然重點是中國大陸，因為他們不能接觸到信仰真實內容，現在整個環境基本上還是無神論的。

「寫《神州》是我自己的感動，我不管是誰，就是要把中國五千年歷史弄清楚，中國為甚麼那麼多苦難，為甚麼那麼多罪惡。後來拍《十字架》也是出於一種感動，因為我讀到國內基督徒有血有淚的故事，我就有感動要把它拍出來，《福音》目標就比較明確了，要讓中國人知道信仰是甚麼，不要再誤解了，不要再有成見，要讓他們真實認識信仰，而且要他們得到最好的東西，心靈的歸宿。如果一個人的心靈不好，他一生都好不了。同樣，一個民族心靈不好，那個民族也好不了，不管他有多少錢，不管他多強大。」

引伸到今天中國，他認為例子觸目皆是。

「這個不用我講了，大家都知道中國人的人心，自己都知道不好，不用別人說，他們自己都知道自己的心不好，就是向錢看、投機取巧、爾虞我詐、貪污腐敗、沒有公平、欺強凌弱，每天報紙上都有。假的這個，假的那個，沒有甚麼可靠的東西，這些事情太多了。我想

中國的強大不能光看蓋了多少高樓大廈，經濟增長了百分之幾，關鍵是你的心靈是否強壯，是否可以靠得住。新加坡李光耀說過一句話：『廿一世紀的中國要成為世界大國，甚麼條件都不欠缺，就是缺少一樣，缺少大國人的心態。』我們還是沒有自信心、沒有真誠、沒有寬容、沒有信仰、沒有上帝，這樣不成。」

祂如果給我開門讓我回去，那誰也關不了的

母親仍在廣州，對多年無法回國，遠志明認為是神的安排。

「沒有遺憾，只有我在海外，才能做我現在做的事，在國內根本做不了的。第一、國內環境太浮躁，根本不能安下心來，大家都在向錢看，都在賺錢，整個中國像在熱鍋上的螞蟻，每個人都瘋了一樣，投機取巧。為甚麼現在中國產生不了偉大的作品，不可能的，因為誰的心都不踏實，內心沒有平安，不能深入下去，我要在國內根本做不了這些事情，我會寫東西去賺錢。像張藝謀，他拍電影都是拍賺錢的東西，他早年的電影他再也拍不出來的。

「第二、在國內的政治環境也不容許我拍這些東

西。

「所以在海外我才能對五千年歷史做一個反省，我可以非常客觀的，說我心裏的話，對大陸的家庭教會可以這樣廣泛的佈道。

「如果我不在海外的話，身在廬山嘛，不知廬山真面貌。如果我身在中國就失去了一個角度，從遠處看中國的角度，我就看得不清楚，我現在看到中國哪方面在崛起，哪方面在墮落，看得很清楚。我真的沒有遺憾，我覺得是上帝安排，讓我做只能在海外才能做的事，如果上帝需要我回去，我相信我很快能回去，政府擋不住我的。你知道我們有信仰的人，相信上帝掌管一切，祂如果給我開門讓我回去，那誰也關不了的。但是我現在回不去是上帝不讓我回去，讓我在海外做這些事情，這些事情影響很大的，這些DVD回去，馬上遍地開花，像《福音》前年出來，在溫州生產了一萬套作為母帶，然後分到各個省的家庭教會，然後各個省的家庭教會再分到各個城市、各個村子，半個月內我想變成一百萬套都不止，因為每個家庭教會都有翻錄機。一比四、一比六、一比八的，幾分鐘出來八個，幾分鐘出來八個，不得了，所以真是上帝祂的辦法。」

遠志明拍的紀錄片，充分利用了國內翻版盛行的風氣。

遠：「我們拍影片，怎麼傳呢？就是靠進去的人帶進去，帶進去就像種籽一樣翻錄得很厲害。估計《神州》發行量至少幾百萬套。」

記：「你怎麼知道？」

遠：「因為每個基督徒都看了，中國基督徒至少八千萬，官方公布的三自教會兩千萬吧，但家庭教會至少多三倍。看北京吧，官方教堂有六個，家庭教會至少有幾千個，就在家裏關起門來聚會，加起來要比他們多好幾倍。這是大城市，農村就更不得了，農村家庭教會更多。其實國內教會跟海外聯絡很廣，收到聽到的電郵都告訴我們：『我們看了。』然後官方三自教會都看，他們來美國探親旅遊公幹的，都告訴我看了，我說不是不容許的嗎？他們說：『越是不容許越是要看，我們越翻錄得多。』有一次有人到北京崇文門，很大的教堂，門口就賣光盤，上面寫『一個弟兄的見證』，他拿回家一看，就是我。你看，官方教會都在賣，所以我最保守估計，有幾百萬套。海外我們就賣了幾十萬套。英文比中文賣得多。」

中國的發達崛起，如果沒有信仰是不可能的

零八年十二月遠志明在三藩市開了一個大會，叫「一代人的見證」，請了三百多個從大陸出來，在美國或世界各國的，信了上帝，而且做了牧師、傳教士的。他們來自各大學，包括北大、清華、復旦、人民大學，還有中共中央黨校，都請來了。三天兩個晚上，對外開放給灣區，他們租了專業劇場，每晚三千多人來聽見證，三百六十多個神職人員後來起草了《舊金山共識》。

共識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我們信甚麼，我們的信仰。第二部分我們看到了甚麼，從基督徒牧師的角度，看到中國現代化現在這個光景。最後一部分向上帝禱告，向中國政府呼籲，很短，就一頁紙。

「但是我們討論了很久很久，每天討論到半夜兩三點，最後才達成共識。」

神呀，你為甚麼不讓我知道呢，為甚麼瞞着我呢？

周日晚開完大會，周一回家上網，網上一則消息讓他嚇了一驚：劉曉波在國內也搞了個《零八憲章》，而且也是三百多人簽字，也是公開的。

「唷！我當時心裏特別害怕，我說上帝你怎麼安排這麼巧，我們在海外也是三百多人簽一個共識，他們也是三百多人簽《零八憲章》，同一個時間，中國政府一定會以為我們裏應外合，我心裏一冷，我擔心的不是我個人，是擔心簽了字國內來的一大批人。後來我就禱告，我說：『神呀，你為甚麼不讓我知道呢，為甚麼瞞着我呢？』你知道上帝怎樣告訴我呢？在我的意念裏，就告訴我說，你如果提前知道《零八憲章》的事，你還敢做這個共識嗎？因為祂知道我膽子小，知道我很軟弱，我突然就明白了，上帝是為了讓我不懼怕，讓我們一起來通過這個共識，我知道我自己膽子小，如果我提前知道國內在搞《零八憲章》這個事，我真的不敢了，怕連累那些牧師們，但是上帝認為我們應做這個共識，我們完全是從信仰角度，我們認為中國的發達崛起，如果沒有信仰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和諧的。」

記：「為甚麼呢？」

遠：「因為沒有愛、沒有真誠、沒有人的尊嚴，這都是從神來的。美國《獨立宣言》，美國的憲法，一開始都講了，IN GOD，在上帝的愛裏我們彼此相愛，在上帝的信心裏我們彼此相信，人的尊嚴權力，都是上帝賦予的。上帝創造的都是平等的，人人受造平等，每個人

平等的創造，上帝賜予政府，讓政府來管理人民，但是如果違背上帝旨意，人民有權改變政府。」

記：「那就糟糕了！」

遠：「沒辦法，否則的話就會產生獨裁專制了。」

記：「所以中國到今天都不接受基督教呀。」

遠：「這就是為甚麼，對呀，因為有了上帝一定有平等，因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記：「那共產黨怎麼能夠接受呢？」

遠：「所以本質上有神論跟無神論是衝突的，這就是為甚麼中國共產黨那麼害怕信仰，逼迫基督徒，對梵蒂岡教皇怕得要命，因為他心裏很清楚，到底誰是神，上帝是神還是我是神，很簡單嘛，誰是the highest？最高的，但另一方面反過來講他們傻，雖然基督教信仰跟他們理念不一樣，但是唯有這個信仰能讓中國平安穩定的轉型，在和平和諧和睦情況下轉型，前提中國必須轉型，中國已經開始了轉型。第二，關鍵是怎麼轉型才能平安，不出亂子，必須有信仰，否則人心詭詐，沒有敬畏之心，你培養十三億人全是刁民。所以我們的共識都寫了，說中國這場變革是有十字架的變革，否則就很痛苦了。所以在大變革時基督徒要發出聲音，讓執政掌權官方的眼界更寬廣一點。」

上帝會知道

「按信仰的角度，六四發生，還是人的罪，《聖經》講人人都犯了罪，沒有一個人沒有罪，只是那個罪表現在人人身上不同。發生在執政官員身上、掌權者身上，他們的罪在於只會維護自己利益，對青年學生來說我們的罪表現於驕傲，不識時務，當然這是個優點，勇敢，勇敢的驕傲，還有各種各樣的人有他的動機，集團的、政黨的、個人的、不同階層的，都有自己動機、利益，都是罪，各種罪匯合在一起就造成了悲劇，要是將來為六四平反，應該是一個認罪懺悔。台灣不是有個二二八事件嗎？最後也是在教會裏點蠟燭，大家還是彼此饒恕，彼此接納。美國南北戰爭你知道最後，雙方死的人都是烈士，大家一塊紀念，將來不管死的是學生還是軍人，要一塊來紀念他們，都是受害者。盼望有那麼一天在天安門廣場，能夠有個燭光晚會，沒有憤怒，沒有復仇心態，而是平和懺悔的心態，我們一塊來認罪，承認我們是罪人，承認我們缺乏愛。面向明天，能讓中華民族更加和諧。作為我個人基督徒，過去就過去，上帝會知道。最重要每個人要懺悔自己的罪，中華民族要懺悔自己的罪。」

附錄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人民日報》社論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動中，廣大共產黨員、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幹部、解放軍和青年學生，以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哀思，並表示要化悲痛為力量，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貢獻力量。

在悼念活動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情況。極少數人借機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蠱惑羣眾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在西安、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

考慮到廣大羣眾的悲痛心情，對於青年學生感情激動時某些不妥當的言行，黨和政府採取了容忍和克制態度。在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召開前，對於先前到達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學生並沒有按照慣例清場，而是要求他們遵守紀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於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證了追悼大會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順利進行。

但是，在追悼大會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製造種種謠言，蠱惑人心，利用大小字報污蔑、謾罵、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公然違反憲法，鼓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學校中成立非法組織，向學生會「奪權」，有的甚至搶佔學校廣播室；在有的高等學校中鼓動學生罷課、教師罷教，甚至強行阻止同學上課；盜用工人組織的名義，散發反動傳單；並且四處串聯，企圖製造更大的事端。

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着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搗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全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所希望的改革開放，治理整頓，建設發展，控制物價，改善生活，反對腐敗現象，建設民主與法制，都將化為泡影；

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全民族振興中華的宏偉願望也難以實現。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堅決維護得來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維護憲法，維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決不允許成立任何非法組織；對以任何藉口侵犯合法學生組織權益的行為要堅決制止；對蓄意造謠進行誣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禁止非法遊行示威，禁止到工廠、農村、學校進行串聯；對於搞打、砸、搶、燒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護學生上課學習的正當權利。廣大同學真誠地希望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這也是黨和政府的要求，這些要求只能在黨的領導下，加強治理整頓，積極推進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來實現。

全黨同志、全國人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堅決地制止這場動亂，將國無寧日。這場鬥爭事關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成敗，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要明辨是非，積極行動起來，為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而鬥爭！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趙紫陽會見「亞銀」代表談話

趙紫陽在會見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二十二屆年會的亞行成員代表團團長及亞行高級官員時向客人們分析了當前中國國內形勢。他說，各位到中國來，大概都知道中國最近有一部分學生上街遊行。這是不是意味着中國政局不穩定呢？我想強調指出，學生遊行的基本口號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擁護改革」，「推進民主」，「反對腐敗」。我認為，這就反映了遊行隊伍中的絕大多數學生對共產黨和政府的基本態度：又滿意，又不滿意。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們對十年來改革和建設的成績，對我們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是很滿意的，但對我們工作中的失誤是很不滿意的。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而肯定成績，糾正失誤，繼續前進，也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有沒有人企圖利用並且正在利用學生的行動呢？中國這麼大，

當然難免，總有人希望看到我們出現動亂，總有人會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像的。這樣的人極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絕大多數學生是會懂得這一點的。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份信心。

趙紫陽在談到如何解決學生的合理要求時說：我想，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應該通過改革來解決，應該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辦法來解決。分析一下具體情況就清楚了：現在學生最不滿意的是貪污腐敗現象。這本來是黨和政府近幾年來一直在解決的問題，但為甚麼有這麼多的人有意見，而且意見這麼大？兩條原因。一是由於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監督，以致某些確實存在的腐敗現象，不能及時地得到舉報和處理；二是由於公開化不夠，透明度不夠，有些傳言，或是張冠李戴，或是無限擴大，或是無中生有。其實，我們絕大多數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不僅是低工資，而且除了工資以外並沒有甚麼其他收入，更沒有甚麼法定的特殊權利。違法亂紀，搞特權、特殊化的人，有，但並不像人們傳聞的那麼多，那麼嚴重。當然，腐敗問題是一定

要解決的，但這個問題必須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監督、擴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結合進行。去年以來，我們在幾個城鄉地區公開政府的辦事制度，公開辦事結果，鼓勵羣眾監督，並建立羣眾舉報中心，作了一些試驗。這樣，就把懲治腐敗同民主、法制初步結合起來了。現在正在繼續總結經驗，準備在較大的範圍和較高的層次上一步一步推開。

在談到如何處理學生遊行這一事件時，趙紫陽說：我認為，也同樣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分子對話，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趙紫陽指出，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他說：黨和政府準備這樣做，我相信，學生會贊成這樣做，各界人士也都會贊成這樣做。大家都這樣做，我們就一定能夠達到維護穩定的目的。我相信，這將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團結。在穩定和團結的基礎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和經濟制改革，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一定會進行得更加順利。我對中國的政局的穩定和改革的前途持樂觀態度，中國的投資環境將繼續改善。我希望我介紹的這些情況能夠有助於你們對中國的瞭解。

據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新華社電訊

＊本文是趙紫陽會見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二十二屆年會的亞洲開發銀行成員代表團團長及亞洲開發銀行高級官員時的談話。

絕食宣言

「我宣誓：為了促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國家的繁榮，我自願絕食，堅決服從絕食團紀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在前幾次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之後，今天我們又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鬥爭。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的報道。

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學生代表團進行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民主愛國的學生運動。

絕食時間：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時出發到天安門廣場。」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我的聲明和態度

章詒和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一日，在全國圖書定貨會開幕當日，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召集了一個「通風會」。會上，副署長鄔書林先生以宣讀方式公佈了一份「2006出版違規書選」，被點名的書裏，《伶人往事》列於三。鄔先生對出版此書的湖南文藝出版社說（大意）：「這個人已經反覆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出，……你們還真敢出……對這本書是因人廢書。」接着，自然是對該社的嚴厲懲處。

鄔先生說的「這個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誰？我是從事戲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員，是中國民主同盟的老盟員，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婦。六十歲的時候，我拿起了筆，寫起了往事。先說的是父輩故事，後講的是伶人傳奇。第一本書被禁（即「賣完了，就別再版了」）。雖說這是應中央統戰部的要求，但權力機關已經對我的權益有所侵害。這次，鄔先生沒有對《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評價，卻對我本人的個人權利進行了直接的侵害。我們的憲法有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

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廢書」，直指我本人，直接剝奪我的出版權，而這是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

我知道——在鄔先生的眼裏，章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麼，我要問：右派是不是公民？在當代中國，一個右派就既不能說，也不能寫了嗎？誰都知道，只要是個社會，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遠是少數。我們這個國家是不是只許左派講話、出書？廣大的中間派和右派只有閉嘴。果真如此的話，我們的憲法應當立即修改，寫明容許哪些人出書，享有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容許哪些人出書，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權利（其實，現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員出書之難，並不在我之下）。鄔先生，您是甚麼派？您代表誰？就在前不久，溫家寶總理在公開場合表示——希望並要求中國的作家和藝術家能講真話。言猶在耳吶！通風會就發出了這樣的聲音，宣佈了這樣的措施。新聞總署是國家行政機構，是國務院的下級。這不是和國務院對着幹嗎？鄔先生，您到底想要幹甚麼？

借此機會，我想說明這樣一個態度：從提筆的那一刻起，我就沒想當甚麼社會精英，更沒想去寫甚麼「大」歷史。我只是敘述了與個人經驗、家族生活相關的瑣

事，內裏有苦難，有溫馨，還有換代之際的世態人情。我的寫作衝動也很明確：一個從地獄中出來的人對天堂的追求和嚮往。因為第一本書裏的張伯駒、羅隆基，第二本書裏的馬連良，第三本書裏的葉盛蘭、葉盛長連同我的父母，都在那裏呢——「他們在天國遠遠望着我，目光憐憫又慈祥」。

再鄭重地重複一遍：我不會放棄對公民基本權利的維護，因為它維繫着一個人的尊嚴和良知。鄔先生的行為是違反憲法的！從精神到程式，他都沒有遵守。官場可以盛行「一致通過」，面對領導人可以做到「聆聽教誨」；與此同時，是否也可以給草民騰出一點兒空間：給他們留下一張嘴，叫他們説説；給他們留下一隻筆，讓他們寫寫。和諧社會的搭建不是靠勒緊，它需要的恰恰是鬆動。

前兩本書的被封殺，我均以「不在乎」應之。但事不過三。這次，我在乎，很在乎！鄔先生，告訴您：我將以生命面對你的嚴重違法行為。祝英台能以生命維護她的愛情，我就能以生命維護我的文字。

遵守憲法的首先該是政府。您是高官，這點應當比我清楚。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九日

我沒有了退路

——關於「聲明」的說明

章詒和

私下裏聊天，人們都愛提起我的父親，認為我的性格與父親有點兒像，我常為此辯解。我說：不能看表面，我和我父親有着質的差異。他是職業政治家、社會活動家；而我呢，是一個毫無政治抱負的人，既沒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的現實盤算，也沒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焦憂。父親的政治頭腦，特別是他的組織才幹（長期擔任中國民主同盟的秘書長和組織部長），都沒有遺傳給我。我一生的興趣和一點點小聰明，都在藝術上。我敏感於人的內心情感，敏感於色彩，敏感於細節，敏感於韻律，即使在監獄裏，我還是那麼喜歡天空，喜歡飛鳥，喜歡薄霧……看着看着，甚至能忘了自己是囚徒。我這輩子唯一的本事就是講故事，講細節，講往事。由於專業的緣故，我還特別喜歡梨園行，伶人美麗，動人，幾乎每個人都很獨特。所以，這本書就是這種興趣和熱情的表達。但是，就是這樣一本寫梨園行的書也被禁了。而鄔先生卻說：「這個

人的書不能出！」這話是甚麼意思？用「文革」的語言講，就是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是「你章詒和這輩子別給我寫東西」。所以，是鄔先生把我逼到死角裏，我沒有了退路。

「聲明」發表以後，很多人關切我的生活情狀。從香港、臺灣、美國、日本、西班牙、沙特、利比亞等地來電詢問。網上議論熱烈。而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和朋友則異常擔憂。他們要組織一個送飯組，說：「愚愚(我的小名)，你若被抓了，我們排着隊給你送牢飯。」我聽了很傷心，事情不會鬧到這一步的，畢竟現在中國的法制狀況，比我坐牢的時候進步多了。但是他們準備這樣做說明甚麼呢？——說明了長期以來，對知識份子的打擊迫害，在他們心頭堆積的陰影並沒有消失，人們仍然有所恐懼。我深感悲哀。為了這個悲哀，我也要站起來。

我的「聲明」是極其鄭重的，希望鄔先生能給我一個鄭重的答覆。請鄔先生答覆我：

一、您是否在會上點了我？

二、您是否說了「這個人的書不能出」這句話？

三、無論是封殺我，還是封殺書，您能否啟動法律程式通知我，我隨時恭候。

十多天過去了，毫無音信。這不由得使我想起《往

事並不如煙》。據可靠消息，為了《往事》，李長春先生主持了一個會議。會上，前新聞署負責人表態，說（大意）：自己這個部門只能管出版社，管不了作者。事情推到了文化部，文化部一位副部長說（大意）：章詒和已經退休，再說寫書屬於業餘之事，不好管。既然事情是由中央統戰部提出的——當時一位統戰部副部長是把《往事》定性為「反黨宣言」的，於是，李長春先生決定這爛攤子還是由統戰部來收拾。最後，統戰部托人找到我哥哥（時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請他轉告我這個妹妹：今後就不要再寫了——這就是《往事》的結局。我想：這次新聞署該出面了吧？好漢做事好漢當，鄔先生會登場吧？

查禁書刊，不是不可以，但要有法可依，這種依法不是某領導人的一句話，不是某個上級機關給下屬單位打個匿名通知電話，也不是給雜誌社或出版社下個簡單粗野的書面指示。它應該是一個法的程式，這個程式應該是嚴格依據公開法律的，應該是一個獨立、公開、公正的司法程式，這是最基本的程式正義。如果是按着這種嚴密的法定程式查禁《伶人往事》，即使查禁錯了，我也可以尊重司法。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事態的變化和我不變的立場

——兼告鄔書林先生

章詒和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十四時許，我在家中接到一位同事的電話，說(大意)：鄔書林同志是個好人，你們之間有誤會……那個會上，他沒點你的名。其實，不用托人帶話，我早就知道鄔先生是甚麼樣的人。

二零零六年，鄔先生在出版社總編培訓會上說：「我是黑白兩道都有人。我剛才接了一個電話，就是□□□打來的……」隨後又說：「你們要讓我不舒服，我就先讓你們不舒服。」當下我被侵害，是不舒服了，但你也未必舒服。至於「黑白兩道」的話，別忘了我是坐了十年大牢的。您能嚇唬總編們，對我可不靈。

「我沒有點你的名」，這是鄔先生私下帶話的重點。看來，我需要再重複一遍您的講話(某些字句比我一月二十日的「聲明」有所補充)：「這個人的思想有問題。我們已經反覆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出，稿子走了好幾家出版社，都沒敢出，你們(指湖南文藝出版社)還真敢

出，膽子也太大了（一說太猖狂）……對這本書是因人廢書。」接着便是對該社的懲處（摘去優秀出版社稱號，削減百分之二十書號配額等）。在那樣一個場合，用那樣的話語，又針對那樣一個出版社，您所說的「這個人」不是我是誰？那本書不是《伶人往事》又是哪一本？用我從事的戲劇專業術語來解釋，就叫「規定場合、規定情景中的規定人物」。即鑼鼓一響，胡琴一拉，梨園行的人就知道：這是一齣甚麼戲，角兒是誰了。您是政府高官，已經亮相，就別賴賬。

鄔先生若問這些話，我是怎麼知道的？「朝廷小，江湖大」這是從前的話；「政府小，社會大」乃是今日之現實。「進得衙門是官員，出了衙門是百姓」——這是現在很多官員的行為特點，您該知道吧。衙門裏剛剛發生的事兒，他們能當資訊、當聊天、當談資都說了出來，其中還隱含着自己的感受與判斷。這是常識，也是人性。您要明白，為了升官發財、胡作非為，卻能密不透風、一手遮天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您還說：「這個人的思想有問題。」請問：您是不是要搞文字獄？我的思想有問題與你何干？犯法，有國家的法律、法院管。犯錯，有我所在單位過問。您管得着

我嗎？憲法給你甚麼權力來管我的思想？這是侵犯我的基本人權，所以您應當公開道歉，並承擔法律責任。

最後，再來說「查禁」。根據我的切身經歷，現在實施的查禁分速禁、緩禁兩種方法。我的第二本書（《一陣風》）剛印完，即封在庫房，這屬於速禁。我的第一本書（《往事》）則是緩禁，即「賣完了就別再印了」。其實，緩禁的同時也在速禁。我這裏就有一張浙江某市查繳《往事》的收據。這第三本（《伶人》），上邊專門發了個通知，說（大意）：網上流傳的查禁八本書的說法嚴重失實。偏偏就在剛才（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六點三十分），一位姓戴的先生從張家港市打來電話，告訴我：他們那裏的一家民營書店已接到通知，要收繳幾本書，其中就有《伶人》。香港一位資深記者一月十七日給上海某大報寫了篇文章，裏面提到我去年十二月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演講。很快，上海某大報打來電話說（大意）：《伶人》剛剛被禁，「章詒和的名字不能見報」。看來，我真個是書被禁、人被封。您的上級發通知說沒查禁書，您卻要查禁。您這不是扇他們的耳光嗎？

一切都很明瞭。您——是您個人將我看成思想犯，剝奪我作為一個公民的言論出版權利，您在公然蔑視憲

法。否則為甚麼不按照法律程式，而是像現在這樣幹些雞鳴狗盜之事，連自己說了的話都不敢承認？還是「聲明」裏的那句老話：查禁我的書需要公開、公正、獨立的司法程式。我特聘請一個法律顧問團。首席顧問張思之先生，另有浦志強律師、付可心律師，其他律師暫略其名。他們會依法盡力維護我的權利。

鄔先生，我講了這麼多，我與您之間有誤會嗎？基於我對您的瞭解，事態還可能會起變化，但我的立場不會變化。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行政起訴狀

原告：章詒和　女　1942年出生，漢族

被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

法定代表人：龍新民　職務　署長

地址：北京市東城區東四南大街85號

訴訟請求：

請求判決撤銷被告在2007年1月11日「出版工作專題情況通報會」上作出的查禁原告作品《伶人往事》的具體行政行為。

事實與理由：

原告長期從事戲曲文學理論的研究和教學工作，退休後於2001年開始寫作。在完成《往事並不如煙》和《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兩書後，原告描寫尚小雲、言慧珠、楊寶忠、葉盛蘭、葉盛長、奚嘯伯、馬連良、程硯秋等八位京劇藝術家的《伶人往事》一書，在經過有關部

門嚴格審定和多次刪改後，於2006年10月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首次印行十萬冊。作為一部「寫給不看戲的人看」的作品，原告筆下的一個個人物遭逢鼎革，其悲劇人生的興衰寵辱和點滴「往事」，甚至在與「韶樂」已幾乎很少謀面的當代讀者羣中，所引起的反響據知也屬良好。

2007年1月11日，在中宣部副部長李東生主持召開的「出版工作專題情況通報會」上（以下簡稱「通報會」），被告新聞出版總署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副署長鄔書林「就當前宣傳工作發表了講話」，他批評了湖南文藝出版社和檔案出版社等八家出版單位出版了「違規」作品，而所謂「違規作品」，居然包括廣受讀者認可的《伶人往事》在內，其根據則是：該書作者「這個人思想有問題。我們（請注意：此處不是『我』而是『我們』——原告按）已經反覆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出，稿子走了好幾家出版社，都沒敢出，你們還真敢出，膽子也太大了（一說太猖狂）。……對這本書是因人廢書。」堂堂的新聞出版總署下令禁出好書，縱非奇聞，亦屬奇冤！為此，原告曾三度嚴正聲明抗議，鄔書林迫於海內外輿論壓力，企圖抵賴，然而原告手中握有證據，舉其要者有三：

一、1月12日上午，也就是鄔書林講話的次日，在

國家廣電總局辦公大樓二層會議室，該局宣傳管理司副司長王丹彥主持召開了「新聞通氣會」(以下簡稱「通氣會」)以傳達「通報會」的會議精神，還印發了2007年第1期《廣電總局宣傳管理司新聞通氣會紀要》。「通氣會紀要」證實：鄔書林在講話中「對目前出版界出現的一些『闖紅燈』問題提出了嚴肅批評」，指出上述問題「屬於嚴重政治錯誤，已經闖了禁行的『紅燈』」，並聲稱「新聞出版總署將對違規出版社做出取消出版書號等處理。」鄔氏所稱犯有「嚴重政治錯誤」、「已經闖了禁行的『紅燈』」的作品，計有《滄桑》、《風雲側記》、《八個京劇演員的生涯》等八部。該「通氣會」紀要在《八個京劇演員的生涯》後特地注明「章詒和作」。

二、1月31日，《風雲側記》作者袁鷹先生，記述了鄔書林在人民日報社文藝部主任郭運德陪同下，於1月30日登門向其「説明情況」的經過，並整理出「紀要」公之於眾。該「紀要」旋於一周後公之於眾。袁氏證實：鄔書林自認在「通報會」上批評了出版《伶人往事》和《風雲側記》等「違規」作品的五家出版社；「紀要」還證實，鄔書林在講話中確實對《伶人往事》的出版作出了「屬於嚴重的政治錯誤」的認定，至於曾將該書單獨註明「章詒和作」並

加以強調，更是無可辯駁，廣電總局的《新聞通氣會紀要》也可相互印證。鄔書林對袁鷹承認，他的講話是職務行為而非個人行為，他只是代表新聞出版總署「宣讀」了「原文」，他還表白說，這「不是我個人的事」、「我是執行署裏的決定」，他說「我處在（副署長）這個崗位上，當然必須嚴格執行（中央『關於出版』的『好幾個』檔）」，「現在只能這麼執行」，「真是有苦說不出」。

三、被告新聞出版總署對上述八家出版社的處理決定，諸如取消湖南文藝出版社的榮譽稱號、削減各出版社來年一定比例的出版書號、撤銷特定責任編輯的在編選題、甚至打發某些責任編輯去充任「校對」等等，在「通報會」會之後即已下達並陸續執行。

鑒於自2004年以來，原告已有《往事並不如煙》被勒令不得加印再版，15萬冊《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印好後至今仍封存在庫不得銷售，其合法的民事權利本已受到行政機關不法行為的嚴重損害。此次經鄔書林副署長一語道破，原來上述這一切蹊蹺都是出自被告「因人廢書」的玄機——既然《伶人往事》的出版已經闖了「紅燈」，再版當然更是絕無可能！處罰出版社的行為本身對於原告而言，直接後果便是其作品的正版不得再印，

盜版卻得以大行其道，原告依法享有的包括人身權和財產權在內的民事權利，乃至創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憲法權利，均已受到被告違法禁書行為的嚴重損害。換言之，原告與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係。據此，被告的違法行政行為理當依法撤銷並予以糾正。

無可爭議的事實是，被告新聞出版總署負責人鄔書林在「通報會」上針對原告及其作品《伶人往事》的「因人廢書」言行，是代表被告實施的職務行為，鄔書林對袁鷹的說明係對被告「禁書」行為的自認；廣電總局新聞「通氣會」紀要中披露的鄔書林講話要點、涉案出版社已蒙受被告及其各地下屬機構行政處理的基本事實，乃至眾多知情人和「受害人」對被告此次查禁行為的已有敘述，均足以證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客觀存在；鄔書林雖聲稱處罰措施針對的僅僅是「違規」出版社而非作者，但如前所述，其處罰出版社的行為，當然直接造成了《伶人往事》的無緣加印和再版，該具體行政行為自然與原告構成法律上的利害關係，即該行政行為已對原告的民事權利造成了實際損害。謹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40條「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沒有製作或者沒有送

達法律文書，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訴的，只要能證明具體行政行為存在，人民法院依法應當受理」的規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2條和上述司法解釋第12條的規定，為保護自身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有權提起行政訴訟，原告特訴至貴院，請求依法判如所請。

此致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具狀人：章詒和

委託代理人：張思之　浦志強　律師

2007年4月18日

附件：

1、《行政起訴狀》副本1份；

2、章詒和被禁作品《伶人往事》封面及版權頁複印件；

3、《廣電總局宣傳管理司新聞通氣會紀要》複印件；

4、袁鷹：《鄔書林先生來訪談話紀要》；

5、章詒和所撰寫的三份聲明複印件。

舊金山共識

2008年12月8日

我們是一羣來自中國的基督徒，聚集在美國舊金山，參加一代人的見證大會。為這一時刻，我們向上帝獻上感恩。我們本是不配的人，卻蒙了神的恩典，可以一起來見證上帝在我們身上奇妙的作為，一起承擔上帝賦予我們的福音使命。

第一部分

我們相信，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獨一上帝，創造了宇宙和人類，並以他榮耀的權能，掌管着人類包括中國的歷史、現在和未來。

我們相信，我們和世人一樣，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且不能藉自身的道德、智慧、能力和財富，將自己從墮落與滅亡中拯救出來。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人贖罪捨命，第三天從死裏復活，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我們相信，若沒有聖靈的光照和引導，任何人都無法領受救恩，認罪悔改，成為新造的人。

我們相信，《聖經》是來自上帝的全備無誤的特殊啟示，是基督徒在信仰上的最高權威。

我們相信，普天下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兒女，教會是我們在地上屬靈的家，耶穌基督是普世教會、包括華人教會的唯一元首。

第二部分

我們看見，中國大陸正處於前所未有的變革中，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面臨着全面轉型。

我們看見，在這場變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着更巨大的挑戰。由於缺乏神聖的信仰資源可供國人汲取，導致道德淪喪、誠信匱乏、社會脱序。

我們看見，人們試圖在世間各種文化、哲學、宗教中尋找心靈的支點，結果仍是沒有出路。

我們看見，中國這一場變革與以往三千年所有變革不同，這是一場有十字架的變革。上帝拯救的大能已經臨到中國人，福音日益廣傳，教會紛紛建立。在中國走向更加自由、文明的公民社會的進程中，基督徒羣體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建設性作用。在上帝的恩典中獲得新

生的大批基督徒，在中國當前最為需要的仁愛、信實、公義、和平、饒恕等方面，活出了有目共睹的生命見證。

第三部分

我們祈禱，願上帝賜下愛和饒恕，使中國在和諧、和睦、和平中完成社會轉型，重建信用，得享平安，使公義如大水滔滔，使公平如江河滾滾。

我們祈禱，願上帝多多地恩待中國人，使更多的骨肉同胞聽到福音，認罪悔改，領受耶穌基督豐盛、永遠的生命。

我們祈禱，願上帝賜下教會在中國的復興，願聖靈大大做工，興起更多的基督徒，背起十字架跟隨主，使眾教會在神的道上同被建造，傳揚福音，直到地極。

我們祈禱，願上帝帶領教會承擔起自己的文化使命和社會責任，成為世上的光，世上的鹽。

我們祈禱，願上帝賜福中國的執政掌權者，使他們更有治國的智慧與能力，看見福音於國於民都是有益的，依照憲法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

我們祈禱，願全能的上帝，賜福他的兒女，以百般的忍耐、溫柔、謙卑，順服上帝賜予執政掌權者秉公行

義的權柄。願全能的上帝，特別記念與主一同受苦一同得榮耀的眾教會。

我們祈禱，願全能的上帝以他的慈愛，恩待中國人，得着中國人，使用中國人，使中國人成為全人類的祝福。

願榮耀歸給至高神，平安歸給他所喜悅的人。

附錄：《舊金山共識》的產生過程

鑒於中國教會所面對的新形勢，一些大會倡議者認為，大會應當以文字形式表達我們的信仰、我們的看見和我們的祈禱。於是幾位傳道人在會前草擬了初稿，寄發給部分與會者徵求意見。大會報到日下午，遠志明、劉同蘇、洪予健、張伯笠、張路加、張志剛、祝建、周小安、范學德、李亞丁、趙莉等北美傳道人，會同來自中國大陸的趙曉、王怡、余杰、金明日、崔權、黃磊、楊萬里等嘉賓，深入討論了文本的形式、內容與結構。據此，幾位同工當晚完成了文本的文字核定與潤飾。次日，徵詢了晚到的馮秉誠等人的意見。下午，文本交給三百多位與會傳道人和同工，分別在七個專題組討論，獲得絕大多數人的贊同。大會第三天上午，洪予健在大會上宣讀了正式文本，與會者報以熱烈且持久的掌聲。

零八憲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布六十周年，「民主牆」誕生三十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十周年。在經歷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爭歷程之後，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廿一世紀的中國將走向何方，是繼續這種威權統治下的「現代化」，還是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這是一個不容迴避的抉擇。

十九世紀中期的歷史巨變，暴露了中國傳統專制制度的腐朽，揭開了中華大地上「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序幕。洋務運動追求器物層面的進良，甲午戰敗再次暴

露了體制的過時；戊戌變法觸及到制度層面的革新，終因頑固派的殘酷鎮壓而歸於失敗；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續二千多年的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囿於當時內憂外患的特定歷史條件，共和政體只是曇花一現，專制主義旋即捲土重來。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敗，推動國人深入到對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學與民主」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因內戰頻仍和外敵入侵，中國政治民主化歷程被迫中斷。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中國再次開啟了憲政歷程，然而國共內戰的結果使中國陷入了現代極權主義的深淵。一九四九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致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慘重的代價。

二十世紀後期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普遍貧困和絕對極權，民間財富和民眾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權利得到部分恢復，公民社會開始生長，民間對人權和政治自由的呼聲日益高漲。執政者也在進行走向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經

濟改革的同時，開始了從拒絕人權到逐漸承認人權的轉變。一九九八年中國政府簽署了兩個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全國人大於二零零四年通過修憲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今年又承諾制訂和推行《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但是，這些政治進步迄今為止大多停留在紙面上；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繫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由此導致官場腐敗，法治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畸形發展，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不滿情緒持續高漲，特別是官民對立激化和羣體事件激增，正在顯示着災難性的失控趨勢，現行體制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們的基本理念

當此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歷史關頭，有必要反思百年來的現代化歷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

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

人權：人權不是國家的賜予，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的權利。保障人權，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標和公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以人為本」的內在要求。中國的歷次政治災難都與執政當局對人權的無視密切相關。人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服務於人民，政府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個個體的人，不論社會地位、職業、性別、經濟狀況、種族、膚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須落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落實公民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權利平等的原則。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權制衡與利益平衡，就是多種利益成份、不同社會集團、多元文化與信仰追求的羣體，在平等參與、公平競爭、共同議政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

民主：最基本的涵義是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點：(1) 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政治權力來源於人民；(2) 政治統治經過人民選擇；(3) 公民享有真正的選舉權，各級政府的主要政務官員必須通過

定期的競選產生；(4) 尊重多數人的決定，同時保護少數人的基本人權。一句話，民主使政府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公器。

憲政：憲政是通過法律規定和法治來保障憲法確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權利的原則，限制並劃定政府權力和行為的邊界，並提供相應的制度設施。

在中國，帝國皇權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在世界範圍內，威權體制也日近黃昏；公民應該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祛除依賴「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識，張揚權利為本、參與為責的公民意識，實踐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國的根本出路。

三、我們的基本主張

藉此，我們本着負責任與建設性的公民精神對國家政制、公民權利與社會發展諸方面提出如下具體主張：

1、修改憲法：根據前述價值理念修改憲法，刪除現行憲法中不符合主權在民原則的條文，使憲法真正成為人權的保證書和公共權力的許可狀，成為任何個人、團體和黨派不得違反的可以實施的最高法律，中國民主化奠定法權基礎。

2、分權制衡：構建分權制衡的現代政府，保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確立法定行政和責任政府的原則，防止行政權力過分擴張；政府應對納稅人負責；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建立分權與制衡制度，中央權力須由憲法明確界定授權，地方實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級立法機構由直選產生，立法秉持公平正義原則，實行立法民主。

4、司法獨立：司法應超越黨派、不受任何干預，實行司法獨立，保障司法公正；設立憲法法院，建立違憲審查制度，維護憲法權威。儘早撤銷嚴重危害國家法治的各級黨的政法委員會，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實現軍隊國家化，軍人應效忠於憲法，效忠於國家，政黨組織應從軍隊中退出，提高軍隊職業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內的所有公務員應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務員錄用的黨派歧視，應不分黨派平等錄用。

6、人權保障：切實保障人權，維護人的尊嚴。設立對最高民意機關負責的人權委員會，防止政府濫用公權侵犯人權，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傳訊、審問、處罰，廢除勞動教養制度。

7、公職選舉：全面推行民主選舉制度，落實一人一票的平等選舉權。各級行政首長的直接選舉應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競爭選舉和公民參選法定公共職務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

8、城鄉平等：廢除現行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落實公民一律平等的憲法權利，保障公民的自由遷徙權。

9、結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權，將現行的社團登記審批制改為備案制。開放黨禁，以憲法和法律規範政黨行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確立政黨活動自由和公平競爭的原則，實現政黨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會自由：和平集會、遊行、示威和表達自由，是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應受到執政黨和政府的非法干預與違憲限制。

11、言論自由：落實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學術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制訂《新聞法》和《出版法》，開放報禁，廢除現行《刑法》中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條款，杜絕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與信仰自由，實行政教分離，宗教信仰活動不受政府干預。審查並撤銷限制

或剝奪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地方性法規；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動。廢除宗教團體(包括宗教活動場所)必經登記始獲合法地位的事先許可制度，代之以無須任何審查的備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務於一黨統治、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政治教育與政治考試，推廣以普世價值和公民權利為本的公民教育，確立公民意識，倡導服務社會的公民美德。

14、財產保護：確立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實行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保障創業自由，消除行政壟斷；設立對最高民意機關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明晰產權歸屬和責任者；開展新土地運動，推進土地私有化，切實保障公民尤其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15、財稅改革：確立民主財政和保障納稅人的權利。建立權責明確的公共財政制度構架和運行機制，建立各級政府合理有效的財政分權體系；對賦稅制度進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稅率、簡化稅制、公平稅負。非經社會公共選擇過程，民意機關決議，行政部門不得隨意加稅、開徵新稅。通過產權改革，引進多元市場主體和競

爭機制，降低金融准入門檻，發展民間金融創造條件，使金融體系充分發揮活力。

16、社會保障：建立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體制，使國民在教育、醫療、養老和就業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環境保護：保護生態環境，提倡可持續發展，子孫後代和全人類負責；明確落實國家和各級官員必須為此承擔的相應責任；發揮民間組織在環境保護中的參與和監督作用。

18、聯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態度參與維持地區和平與發展，塑造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維護香港、澳門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過平等談判與合作互動的方式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可能途徑和制度設計，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19、轉型正義：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屬，恢復名譽，給予國家賠償；釋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釋放所有因信仰而獲罪的人員；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查清歷史事件的真相，釐清責任，伸張正義；在此基礎上尋求社會和解。

四、結語

中國作為世界大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和人權理事會的成員，理應為人類和平事業與人權進步做出自身的貢獻。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當今世界的所有大國裏，唯獨中國還處在威權主義政治生態中，並由此造成連綿不斷的人權災難和社會危機，束縛了中華民族的自身發展，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這種局面必須改變！政治民主化變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為此，我們本着勇於踐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憲章》。我們希望所有具有同樣危機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國公民，不分朝野，不論身份，求同存異，積極參與到公民運動中來，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以期早日建成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實現國人百餘年來鍥而不捨的追求與夢想。

六四日誌

4月15日　胡耀邦在清晨七時逝世，消息傳來，北大不斷有大字報及輓聯悼念他。

4月16日　數千名大學生往天安門悼胡。

4月17日　北京、上海數千學生上街遊行，藉悼念胡耀邦要求民主，打出了「不該死的死了，該死的卻不死！」的標語，矛頭指向鄧小平。

4月18日　三萬名大學生在天安門集會，部份人潮衝擊中南海。

4月19日　十萬學生在天安門集會，學生將一幅巨大的胡耀邦肖像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

4月20日　凌晨時份，約有兩千人衝擊黨中央所在地新華門，高呼「李鵬出來」，被守衛的士兵擋住。

4月21日　十多萬學生遊行往天安門，抗議武警鎮壓。六萬學生通宵在廣場靜坐，要求瞻仰胡遺容。

4月22日　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內舉行，五萬多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靜坐無果，揚言實行全面罷課。

4月23日　黨總書記趙紫陽赴北韓訪問。

北京臨時學生聯會呼籲全國罷課，力爭新聞言論自由。

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因要求對胡耀邦作出公正評價而被扣起不准發行。

長沙、西安兩地的學生悼胡遊行演變為騷動。

4月24日　北京廿多所高校開始無限期罷課，要求民主改革。

4月25日　國務院首次提出與學生對話。

4月26日　《人民日報》發表措辭強硬社論，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學生忿忿不平，要求當局撤回聲明。

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宣佈，《世界經濟導報》停業整頓，總編輯欽本立被革職。

4月27日　北京五十萬人環城大遊行，百萬市民夾道鼓掌吶喊，學生要求與政府平等對話。

4月28日　北京高校自治聯會正式成立，提出七項對話條件。

4月29日　北京市委與被邀學生首次對話，《人民日報》措辭見軟化。

4月30日　北京市委與被邀學生繼續對話。但因學生組織之合法性問題及認為官方對話無誠意，一些學生中途離席。

5月1日　北京高校自治聯會發出「告香港同胞書」，要求港澳人士聲援。

5月2日　北京高校自治聯會向政府提出十二點的對話要求。

5月3日　官方拒絕對話方案，學生決定五四舉行大遊行。

5月4日　北京十多萬學生及大批記者不理當局在天安門廣場戒嚴的禁令，在天安門集會並發表「新五四大宣言」，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及爭取新聞自由。

趙紫陽亞銀年會講話，肯定學生愛國熱情。

5月5日　北京卅間高校組成代表團，日內與政府對話。北京眾高校陸續復課，只有北大北師大繼續罷課。

5月6日　高校聯會出現分歧，在罷課與復課問題上互相指摘。

5月7日　北京新聞工作者與政府對話，商談解決學運方法。

5月8日　北京學生繼續要求與政府對話。

5月9日　數百名北京學生聲援新聞工作者爭取新聞自由。

5月10日　北京逾萬學生騎單車遊行，要求民主與對話。

5月11日　北京學生擬於十五日戈爾巴喬夫訪華時遊行。

5月12日　百多名北京大學生決定絕食以迫使政府與他們對話。

5月13日　近千名北京大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要求民主自由。

5月14日　三千名學生繼續絕食——學生代表與政府對話無結果。

5月15日　戈爾巴喬夫訪華，因天安門廣場有學生絕食，歡迎儀式改在機場舉行。

六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支援學生。
統戰部長閻明復肯定這次學生運動是愛國表現，並答應不會「秋後算賬」。

5月16日 趙紫陽向戈爾巴喬夫透露，國內重要問題仍由鄧小平掌舵。
絕食人數增至三千人，超過四百人暈倒送院。
上海、四川、湖北、江蘇、浙江、深圳、香港、澳門、海南及黑龍江均有聲援北京學生的遊行。

5月17日 趙紫陽發表聲明，肯定學運是愛國行為，絕不會秋後算賬。
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示威，北京三百萬人民環城遊行支援學生，要求政府從速對話。
一千五百名絕食學生暈倒，學生絕食已進入第五天。
全國各地均有絕食、遊行聲援北京學生。

5月18日 李鵬與學生對話，以文革比喻學運，他形容北京正處於無政府狀態——引起學生極度不滿。談話無結果。

5月19日 李鵬、趙紫陽凌晨到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趙紫陽承認學生運動乃愛國行動，並道歉謂自己來得太晚了。
學生宣佈停止絕食。
軍隊進駐北京城郊。

5月20日 李鵬凌晨宣佈將以強硬手段鎮壓「動亂」。
學生對李鵬之講話極表憤怒。
早上十時，北京宣佈局部戒嚴並實行新聞封鎖。
北京市民陸續湧至城郊，阻截軍隊入城。

5月21日 近百萬市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保護學生免為軍隊鎮壓，廣場上空不斷有直昇機盤桓。
軍隊從四方企圖入城，被阻於城外，與市民相持不下。
人大委員長萬里在美宣佈因病提前返國。
學生領袖要求學生若軍隊進襲，要「罵不還口，打不還手」。

香港百萬人大遊行，聲援北京學生，羣眾高呼「李鵬下台」。這次遊行是開埠以來規模最大的民眾活動。

5月22日 北京四千名知識分子遊行，反對戒嚴。

中央電視台播出徐向前、聶榮臻兩位老元帥的講話，表示軍隊決不對學生用武力。吾爾開希要求學生撤離廣場被罷免北高聯主席職務。

5月23日 北京一百萬人大遊行，「打倒李鵬」之聲響徹長安街。

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畫像被惡意塗污。

城郊的軍隊在凌晨奉命後撤一段距離，唯仍在候命戒嚴。

傍晚，北京中央電視台恢復傳送外國通訊衛星服務。

5月24日 衛星傳送恢復了二十四小時後，再度被禁。

大部份軍區及省、市表態，支持黨中央及中央軍委現行的措施。

5月25日 李鵬會見外賓，強調中國改革的大旗手是鄧小平。

萬里自美抵上海，據稱因病留滬治療而不返回北京。

百萬市民繼續遊行，要求李鵬下台。

保護天安門廣場守衛召集三百多間院校代表開會，討論未來的動向。

北京軍區表示支持中央的措施。

5月26日 陳雲召開中央顧問常務委員會，出席者一致擁護李鵬、楊尚昆五一九講話。

高校聯會決定堅守天安門廣場。

北京各大機關傳達中央有關趙紫陽問題的文件。

5月27日 高校聯會決定翌日全球華人大遊行後，撤離天安門廣場，但未獲廣場指揮部同意。

李先念、萬里表態擁護五一九講話。

5月28日 全球華人大遊行，香港有一百五十萬人參與，被大會形容為全球之冠。此外，上海、台北、高雄、大阪、雪梨、洛杉磯、三藩市及澳門均有遊行活動。

北京的遊行由於幹部、工人、新聞界未有響應，參加人數只有數萬人。

5月29日 喬石在一個內部講話中表示，要在適當時機將天安門廣場清場。而現行軍隊圍城目的是要起威懾的作用。

5月30日 北京美術學院的學生將一尊十米高的民主女神像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中央，「代表了所有中國人心目中的民主」。

北京當局拘捕了三名工人領袖，數千名工人到公安局要求放人。

5月31日 台灣約一百萬名學生冒雨聲援北京學生，手牽手築起一道四百公里長的人牆，以台北中正紀念堂為中心，北至基隆，南至高雄。

6月1日 北京學生領袖柴玲、封從德聲稱在夜間險遭綁架。

北京政府向中外記者作出七點説明，限制記者在戒嚴期間的採訪活動。

6月2日 四名知識分子台灣歌手侯德健、北師大講師劉曉波、四通集團綜合計劃部部長周舵、《師大周報》前主編高新，在天安門開始七十二小時的絕食，抗議戒嚴和軍管。

6月3日 淩晨，二十萬軍隊自東西兩方向天安門挺進，市民以人牆、卡車攔阻之。一輛高速警車撞倒四人，兩人死亡。有消息謂官方決意於當日清除廣場上一切學生。

6月4日 淩晨時份，數以萬計配備槍械的軍隊，駕裝甲車、坦克及徒步由東、南、西三方衝入天安門廣場，沿途開槍，死傷人數至今不明，軍隊於淩晨四時左右，完全控制廣場。學生撤離回校途中多人被坦克輾死。政府宣佈將事件定性為鎮壓反革命暴亂。

香港三十萬人舉行「黑色大靜坐」，追悼北京死難者並抗議北京政府血腥鎮壓，並呼籲於六月七日全市罷工罷課罷市。

四筆象

讀 者 服 務 卡

✤ 謝謝您購買四筆象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 六四二〇

購買地點： .... **區** ....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

姓名：＿＿＿＿＿＿＿＿ **年齡：**＿＿＿＿＿＿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

職業：＿＿＿＿＿＿＿＿＿＿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

＿＿＿＿＿＿＿＿＿＿＿＿＿＿＿＿＿＿＿＿＿＿＿＿＿

＿＿＿＿＿＿＿＿＿＿＿＿＿＿＿＿＿＿＿＿＿＿＿＿＿

＿＿＿＿＿＿＿＿＿＿＿＿＿＿＿＿＿＿＿＿＿＿＿＿＿

＿＿＿＿＿＿＿＿＿＿＿＿＿＿＿＿＿＿＿＿＿＿＿＿＿

＿＿＿＿＿＿＿＿＿＿＿＿＿＿＿＿＿＿＿＿＿＿＿＿＿

＿＿＿＿＿＿＿＿＿＿＿＿＿＿＿＿＿＿＿＿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四筆象出版社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四筆象

四筆象

歷史從不說話，卻永遠有跡可尋……

遠志明 鮑彤

王軍濤

吳仁華

陳達鉦

陳一諮 浦志強

王軍濤

程真 吳仁華

浦志強

陳達鉦

遠志明

鮑彤

陳一諮

二十年前，
他們以生命
追求的變革，
今天，
有沒有實現呢？

ISBN:978-962-7420-39-2

9 789627 420392 60

HK$60